

美国研究

季刊

1989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3卷

1月15日出版

世界和平与裁军	吴展(4)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经过	贾庆国(10)
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	
——兼议“精英舆论”	袁明(16)
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和平幻想	
——司徒雷登与中日和谈	何迪(23)
1948-1985年美国生产率增长试析	沈侠(33)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初探	袁韶莹(46)
美国城市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史明正(54)
“太平洋的东部首府”洛杉矶(一)	
——一个被低估了的美国城市	王受之(61)
从新政到里根经济学	
——读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	徐静之(68)
1987-1988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71)

本期责任编辑：金灿荣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1.75 元

国际版 2.5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1989

Vol. 3, No. 1

CONTENTS

WORLD PEACE AND DISARMAMENT

Wu Zhan (4)

The signing of the INF treaty signifies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detente between U.S. and U.S.S.R., which should be more stable than the first two owing to the chang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world and to the policy readjustments by both superpower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partial reduction of strategic nuclear arms within the next two years.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a will jo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are also discussed.

THE MAKING OF THE U.S.-TAIW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Jia Qingguo (10)

The U.S.-Taiw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of 1954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hip. Relying on newly released U.S. government documents, the author finds that suggestion for the Treaty originally came from Taiwan, that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t first hesitated at the idea and that the sudden change of ev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s after July 1954 facilitated the making of the Treaty.

A BRIEF LOOK AT CHINA'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Yuan Ming (16)

China'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hina itself,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The U.S. public view of China, whose formation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elite opinion, has become more realistic and mature since the 1970s, thus improving China's image.

AN AMERICAN MISSIONARY'S ILLUSION FOR PEACE: LEIGHTON STUART AND SINO-JAPANESE PEACE TALKS

He Di (23)

Driven by his idealism and non-violent religious belief, Leighton Stuart who saw China as his second home made unwearied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war, but his idealism based on American concepts was inept to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antagonizing countries. This failure foreshadowed the tragedy in his later years as the ambassador to China.

THE GROWTH OF U.S. PRODUCTIVITY BETWEEN 1948 AND 1985

Shen Xia (33)

Productivity growth accounte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for the U.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wo and half decade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ts slow-down was also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 economic stagnation between 1973-1981. The author explores a numbe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slow-dow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gan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poli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since 1981.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Yuan Shaoying (46)

Sophisticated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s both a sign of and a reason for the flourishing of higher educ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ystem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solid theoretical base,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private organizations, remarkable social benefits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evaluating institutions.

URBAN HISTORY IN U.S.: AN OVERVIEW

Shi Mingzheng (54)

Urban history is a relatively new social science in the U.S. Its subject matter covers the role of cities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ocial mobility, racial relations, city politics, suburbanization so on. For the methodology, it draws upon economics, geography, statistics,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LOS ANGELES: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PACIFIC

Wang Shouzhi (61)

Los Angeles has becom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enter of the U.S. west coast.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so led to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post-industrial style of work and life. The city's problems, though many, can be solved through decentralization. It is the author's view that Los Angeles could become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Pacific in the 21st century.

A REVIEW OF CHEN BAOSSEN'S NEW BOOK *AMERICAN ECONOMY AND GOVERNMENT POLICY*

Xu Jingzhi (68)

Chen's book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U.S. economy and government policy from Franklin Roosevelt to Ronald Reagan. It contains rich materials and powerful arguments, and provides special insight into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conflicts in U.S. societ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regulating the economy.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世界和平与裁军

吴 展

一、第三次缓和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但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多少和平的迹象，两伊的战火烧得很旺，其他热点地区也在流血，或处于紧张的局势中，美苏军备控制毫无进展。到了1987年美苏《中导条约》签订后，缓和才算真正开始。

缓和主要是美苏间的缓和，如果他们的关系紧张，世界就无缓和可言。缓和究竟有过几次，其说不一。大体可以说两次，第一次是60年代初苏联的赫鲁晓夫执政时发生的。即从古巴导弹危机解决到部分核试验条约签订那段时间，但持续时间不长。那时美国的力量占优势。第二次是70年代初，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出现的，以签订三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为特征。那时美国身陷侵越战争的泥潭，经济上也遇到了问题，而苏联则在军事实力上大致赶上了美国，并不断扩充其核和常规兵力，不断向第三世界扩张其势力，气势汹汹，形成了“苏攻美守”的态势。于是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不到10年，冷战又恢复了。

从70年代后期美国总统卡特开始至里根上台后，美国也不断增加经费，扩充武力，特别是核武器。80年代以来，美国在各个方面同苏联展开激烈的争夺，形成了“互有攻守”的局面。

目前的第三次缓和同前两次有明显的不同。

(一) 美苏在核裁军上进展较大。《中导条约》规定裁减的数量虽不大，但涉及一整类核武器的全部消除。削减50%战略核武器尚未达成协议，因为核查问题不易解决，不过看来双方决心很大，在一两年内签订条约颇有可能。过去的军备控制全是规定最高限额，实有数不减，而这次是真正裁减，特别是苏联减得较多，为不对等裁减开了一个先例。此外，禁止核试验和化学武器等谈判也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两年来，双方首脑频频会晤，外长面谈了20多次，军事领导人也互访并参观了绝密武器和设施。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 双方在地区争夺上开始妥协，热点地区普遍降温，并逐步实现政治解决。在以前的缓和中，地区争夺反而加剧，而这次双方似乎是在协调一致地消除各个热点。持续了八年的苏侵阿战争已因美苏巴阿四方签署了协议而得到政治解决，苏联已在撤军。两伊战争也打了八年，虽两国都已筋疲力尽打不下去，但如无美苏的背后努力，联合国秘书长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促使两伊停火。在美苏的协力下，即将达成南非和古巴从安哥拉内战中撤退的协议。越南侵柬问题，在越南已打得民穷财尽的条件下，和在美苏同意、中国督促和东南亚联盟的斡旋下，正朝着撤军和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这些划时代的发展都是几年前所无法想像的。

(三) 世界上其他大国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中美关系在平稳发展。中苏关系也有所

改善：相互贸易增加、三大障碍也趋向解决。美国一直把对华政策建立在共同对苏的战略关系上，现在已开始转向经济关系，并已开始不十分在乎中苏关系的改善了。西欧、东欧各国之间，特别是东西德之间的往来不断增加。欧洲共同体与东欧经互会间已建立了正式关系。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冷战已经结束，对话逐步取代对抗，合作正在超过争夺。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历了70年。它的领导人曾多次预言它在经济上将超越西方国家，但如今苏联的经济仍远远落后。沙皇时代俄国曾是粮食出口国，而现在年年大量进口。苏联工业产品不仅质量差，而且不丰富，市场经常处于匮乏状态。它的生产据称逐年增长，但近来速度不断减慢，前景不妙。其原因在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僵化，群众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下。苏联多年来为了同美国在军事上争霸，将大量资金投入国防（据西方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17%，而美国军费仅占6%），这也是苏联经济的巨大负担。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后，发现上述问题非常严重，如不及早处理，尽管军力再强，也将无法战胜美国。于是他要求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改革以挽回颓势。为此又必须争取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苏联在外交上正在逐步变咄咄逼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为比较缓和友善的路线；在对外经济中开始采取开放和引进外资及技术的做法。在军事上，他提出“核战争无胜败论”，强调大规模核冲突将毁灭世界文明；变国防优先为经济优先；变谋求军事全面优势为保持“合理的足够程度”；变强调进攻性为“绝对防御性”；变追求高水平的军力平衡为寻求“低水平的战略均势”；变不断加强前沿部署为主动部分撤军和收缩。

美国方面也有不少问题。它在50年代曾处于极盛时期。那时西欧和日本尚未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曾达到全世界总和的约50%，外贸占全世界的17.2%，军力处于绝对优势，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对外政策以扼制苏联为主。但是曾几何时，它的地位明显衰落。国民生产总值降到世界的23%，外贸降到10%。它在军事上虽仍与苏联并列为最强的国家，但不仅压不倒苏联，而且在参加几次局部战争后，发现军事解决不了问题，消耗不少，收获不大。

从经济上看，美国虽未停滞，但由于日本和西欧各国等发展速度很快，故美国相对地削弱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于上述国家，它的财政赤字一度达到2000多亿美元，现虽因采取措施而有所减少，但一时还难以消除。前些年由于美元汇率和生产成本高，美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形成了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现在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一时也难完全平衡。美国的财政赤字怎样弥补？多印钞票会引起通货膨胀，只好举债。但是国内借贷市场的资金也不足。美国人好花钱，平日消费多，储蓄少，经常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房屋、汽车等耐用品，实际上也在大量借债，搞“超前消费”。此外企业也要靠贷款来发展生产。因此政府只好借外债。外贸逆差也等于借外债。现在美国的公私债务累计起来已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看来还在不断增加。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付借款利息的钱已从1980年占财政支出的8.88%提高到1986年的14.56%，如这个比例继续增大，对美国是很不利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美国的繁荣是靠内外债务来维持的，这与日本等国每年有大量赢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万一哪一天外国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失去信心，开始抽走资金，美国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减少财政赤字和提高外贸竞争力。减少财政赤字的途径不外乎增税和削减开支。增税太多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外贸竞争力。削减开支也很难办。美国财政开支中，付利息约占15%，这是死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占42%，军事占30%，其他占13—14%。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减多了会引起社会动荡。剩下的只有军事开支是大头，非动不可，但要在这里开刀，必须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从以上分析看，美苏都由于国家利益而希望缓和，想到一起去了。这次缓和能否持久呢？过去缓和的寿命不长都是因为国家战略没有进行重大调整，因而缓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只

要一方认为缓和不再必要，冷战马上恢复，而这一次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70年代苏联没有看出它的根本弱点在于经济停滞不前，因而吹嘘80年代将赶上美国，并不断扩军备战，向外扩张。美国当时也未感到自己的经济问题很大，所以也要扩军备战，与苏联争霸。那种缓和局面是不稳定的。这一次双方都认识到国家的强大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没有健康的经济作后盾，军力再强也难维持。苏联的经济改革困难不小。要改革几十年来大家已习惯了的僵化经济体制，非有10年20年的努力不能见效。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再扩军备战，到处伸手了。美国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甚至于已有人提出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是苏联，而是经济蒸蒸日上的日本了。美国要对其经济做一番重大调整，解决其债务和赤字问题，没有10—20年的苦功也是办不到的。

如果第三次缓和能持续10—20年，那么在这之后两国是否又会故态复萌呢？现在对那样远的局势无法准确判断，但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测。苏联要改革经济，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既要对内搞活，又要对外开放。就是说必须引进外资和技术，加入国际市场。关门改革不会成功，而开了门必然会使经济国际化，加深国际相互依存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时打起仗来必定会失多得多，谁都经不起战争了。苏联的改革不是根据某个领导人个人的愿望决定的。它是苏联国内外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必然趋势。当然，要在已实行多年的体制上开刀不会没有困难。假如因内部阻力过大，戈尔巴乔夫被推翻，也只会出现一时的挫折。苏联无法再走老路，因为那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会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美国在经济调整过来之后是不是会再扩军备战，又去整苏联呢？可能性也不大。美国的政体是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在没有苏联的明显武力威胁时，即使哪一任美国总统想扩军备战，他必须说服国会拨款，但国会议员要代表他的选区，在说不出多少必须增加军费的理由时，舆论和老百姓都难以同意乱花纳税人的钱。因此要国会通过也不容易。何况在分配预算时，各种利益集团间一向矛盾很大，没有特殊理由，很难增加某种拨款。

第三次缓和虽已开始，但并不意味着美苏已经相互信任。美国前任国防部长温伯格和现任国防部长卡卢齐都认为苏联尽管高唱和平与裁军，却还看不出它在军力和武器的部署上有相应的变化。另外一些人也说，苏联的缓和姿态不过是一种策略，它的战略并无变化，等它喘过气之后又会威胁美国的。笔者认为一种新战略从提出到落实于具体部署，需要较长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苏联的变化究竟是策略性的还是战略性的，也需要时间来考验。不过既然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不大，既然双方的改革或调整涉及长远国家利益并是长期任务，那么将来也不太可能很快重新出现冷战或热战。

将来的世界可能有以下几个趋势。

(一) 世界多极化。美苏两国虽然仍将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们的影响在减弱，以它们来主宰世界越来越行不通了。一批国家正在赶上来，可能出现若干个地区性力量中心。

(二) 国际争端日益不能靠武力解决。战后发生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基本上都未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即使一部分目的实现，却引起了更多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争端将成为趋势。

(三) 经济国际化。资本主义国家间在金融、贸易、投资、生产上的相互渗透和结合不断加强。美国和加拿大已形成统一市场。欧洲共同体各国也将在1992年组成统一大市场。国与国，集团与集团虽有矛盾与摩擦，但国际化终究对大家都有好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无不积极谋求加强外向性，以振兴本国经济。经济国际化已逐渐成为世界性趋势。

(四) 意识形态淡化。各国都在逐步减少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的份量，而更多地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来对待相互间的矛盾。

在可预见的将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打不起来，世界大战也就不会发生。局部战争虽还无法避免，但剧烈程度将会降低，规模也将缩小，国际争端将趋向政治解决。经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相互依存性将不断增强。世界的主要潮流将是和平与发展。

二、核裁军谈判

美苏缓和之风虽很强劲，但这并不等于双方已化干戈为玉帛了。双方仍然相互猜疑，只是由于对抗不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所以要实行缓和。即使在缓和中，斗争还会相当尖锐。双方在谈判中会激烈地讨价还价，尽量争取对己方最有利的条件。

美苏每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议都很不容易。这不是双方首脑谈谈就行的，因为他们背后都有一帮想法不同的人和各种利益集团，要把这些人和集团协调起来是不容易的。

《中导条约》是一项比较好办的协定，但还是谈了七八年才签订。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双方在削减的原则上虽已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尚有一些难点。里根和戈尔巴乔夫1988年6月在莫斯科会晤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本来想要各自的代表团加紧谈判，在年底签订协议，但这行不通，因为一方面难点不好解决，另一方面如果里根在明年1月离任前匆匆忙忙签订条约，他将有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个人树碑立传之嫌，因而不好下决心。

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难处主要在于核查问题。由于双方，特别是美国，都怕对方以欺骗行为违反协议，所以必须落实核查措施。《中导条约》长达100多页，细致地规定了双方如何对对方的有关生产工厂、仓库、试验场所等进行定期或临时的现场视察，以及如何对现有中程导弹的销毁相互进行监督等。达成这样的协议是不容易的，因为双方，特别是苏联，都不愿意让对方视察自己的绝密设施。但是这比起战略核武器的问题来还是较为简单的。中程导弹一个也不留，将来发现一个就可定为违约，所以较易核查。战略核武器则不同，要保留一半，但除已部署在基地的以外，还须有一定数量的备用武器，实有数必然超过50%。还有，既然允许保留战略核武器，就有保养、维修、更换零件和整件等问题。这样一来，有关的生产就不能停止，核查也就变得异常复杂。

就各种类型的战略核武器来说，巡航导弹的核查问题更是难上加难。美国巡航导弹体积很小，长仅4米多，直径仅60多厘米，可以地面车辆、飞机和舰船上发射，可以隐藏在许多地方。与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等庞然大物相比，巡航导弹更不容易为人发现。洲际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井内，潜射弹道导弹安装在核潜艇上数量固定的发射筒内，通过卫星照相侦察，它们的数量不难点清。巡航导弹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们存放在某个秘密地点，卫星看不到，如何去点数量？轰炸机和舰艇上运载的巡航导弹数量也不很固定，可以多装，也可以少装，打完了可以补充，如何数得清楚？苏联在巡航导弹技术方面比美国居于劣势，所以希望禁止这种武器，美国当然坚决不同意。美国巡航导弹的精确度目前大约是20米（圆公算偏差，CEP）。据说加以改进后，误差可以缩小到几乎等于零。这样一来就可以配备常规弹头来击毁桥梁和建筑物。如果这种导弹既是常规武器又是核武器，对它们的核查就更困难了，因为谈判中的削减只涉及核武器。如何从外表来判定有无核弹头是一个新问题。

另一种有争议的战略核武器是机动的洲际弹道导弹（简称机动导弹）。苏联在这方面领先，已部署了一些铁路机动的多弹头导弹SS-24和公路机动的单弹头导弹SS-25。美国的单弹头机动导弹“侏儒”尚在研制中。美国还计划将其多弹头MX洲际弹道导弹装上火车。机动导弹的优点是能经常移动位置，以免遭受突然性的第一次打击。但是美国的公路上交通极为繁忙，机动导弹在那里运动是极不方便的，因此只能限制在军事保留地的道路上机动。军事保留地的面积有限，如果苏联实施空中核爆炸，很可能会使保留地中的“侏儒”导弹全部报销。苏联西伯利亚地广人稀，公路上车辆不多，因此机动的条件优于美国。在核查问题上双方也有争执。美国认为机动导弹无固定地点，不易核查。苏联认为可以限定机动导弹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还是可以点数的。实际上机动导弹的机动范围可以很大，如果苏联在发动进攻前使机动导弹超出规定范围就会使美国不好办。所以美国坚决要求禁止这种导

弹，苏联则不同意。

还有一个问题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它在美国叫做S D I，即战略防御计划。70年代初美苏都部署了用地面导弹拦截来袭弹头的防御系统。1972年美苏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导条约》）对拦截导弹和反导雷达的数量作了限制。美国旋即拆除了它已有的系统，因为当时的反导系统效能不高，而苏联则加以保留并不断改进。1983年在多年的研究后，美国以为地面拦截导弹的效能可以大大提高，而且还可以在空间部署拦截导弹、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等导弹防御系统。于是里根总统把新的系统命名为S D I，决定加速其研究，希望在90年代能开始部署。苏联在这方面的技术上较为落后，而且系统的成本高昂。虽然苏联自己也在研究，但反对向空间发展。《反导条约》的确规定了不得研制、试验和部署空间反导系统，但未禁止其研究工作。美国说它反正不过是在研究，而苏联则坚持说美国的研究包含了空间试验，因此要求美国停止S D I，后来又改成双方以10年为期遵守《反导条约》，并以此为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条件，把两者挂起钩来。美国则只同意七年的遵守期，并坚持要在空间试验。七年的道理是美国想在90年代中期开始部署空间拦截导弹的S D I第一阶段计划。因为其他空间武器尚不成熟，不能部署。

第一阶段计划是在空间部署300个沿卫星轨道运行的空间平台，每个台约装10枚拦截导弹。这些平台刚够在绕地轨道上布满一圈，并保证任何时间都能进行拦截。据说拦截效率大约为20%—30%。这种系统自然不足以抵抗大量的来袭弹头，特别是当苏联用反卫星武器击毁几个空间平台，因而在防线上造成一些缺口时，弹头可以从这里大量漏过来，拦截效率就会更加降低。即使部署这样的系统也大约要花费1000—1500亿美元。在美国的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很难同意这样的计划，于是削减了大部分1989年度的空间拦截导弹经费。里根总统虽然特别偏爱S D I，怕不部署第一阶段系统会使整个计划泄气，却也无可奈何。看来推迟部署已成定局，不过S D I的研究仍会进行下去，以待技术逐步过关。既然S D I暂时部署不了，那么美苏之间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在总的缓和形势下，双方在难点上妥协，一两年内就削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还是有希望的。这是因为：

（一）在全世界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压力下，美苏也愿意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实行裁减，这样做不但会减轻核恐怖的威胁，也可以降低军费。

（二）美苏两国的核武器数量超过需要，形成了“超杀”（overkill）状态，即双方可以相互毁灭若干次。过去之所以部署超过需要数量的核武器是由于互不相让的军备竞赛。现在关系缓和了，削掉战略核武器的一半，所余仍能满足各自的作战需要，何乐而不为呢？

双方做到这一点后，是否还会削减下去，既削减战略核武器，也削减战术核武器呢？这无疑会更加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有人说美苏现有的约50000个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双方只要能相互毁灭一次就够了，那么核武器可以削减99%，剩下的1%还够毁灭一次。在50%之后继续削减不是没有问题吗？实际上那种计算是过分夸大了。人们在计算中把杀死一个人，炸掉一幢房屋需要多少公斤核当量加起来。实际上核爆炸不可能平均分配，再加上发射导弹的故障率和导弹防御的作用，核武器的破坏效率不可能那样高。

目前美苏各有军事和民用目标几千个。如果对每个目标打一个弹头就需要几千个。因此把战略核武器削减到6000并不富裕很多。双方虽然还有10000多个战术核武器，但它们的射程都很短，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不能集中使用于一个战场。

美国的核战略已在由“纯威慑”（Deterrence only）转向“实战威慑”（War-fighting Deterrence）。前者以大规模打击军事目标和后方大城市为威慑，使对方不敢发动进攻。后者则把核武器用于实际作战，可以从战场或对后方的小规模打击开始，根据情况升级，最后达到大规模毁灭。这样就需要部署更多的核武器。美国认为如果核战争能从小规模开始，当然比

一上来就大规模攻击的威慑可信度大得多。如一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攻击,则自己也必定会遭到同样的毁灭性报复,因此决心很难下,对方也不相信你敢发动。苏联虽无明确的论述,但可能有类似想法。

有人建议美苏都只保留1000个战略核弹头,而消除全部战术核武器。这就意味着回到“纯威慑”战略。虽然对威慑能力有影响,但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不管怎样,将来核武器的裁减有可能继续下去,但实际能减到多少,目前还不好预测,不过笔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核武器不可能全部消除,尽管这是全世界人民的良好愿望。这是因为:

(一)在美苏相互敌对的情况下,它们不可能完全放弃核武器。

(二)不管人们如何责备核武器,但客观上它起了维护和平的作用。战后40多年来未再发生大战,尽管有各种因素,但不能不说核威慑起了主要作用。如果核武器全部消除了,美苏对战争的顾虑恐怕会大大减少。

人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全面消除核武器的口号和目标,但不能期望短期内就会实现,实现得快了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我们只能期望国际上的相互交流与相互依存性不断提高,不同的社会制度逐步趋同,从而使各国间不能打仗,也不需要打仗。到那时,核武器没有必要了,因而可以全部销毁。世界经济的发展可能会起这种作用,但不是一两代人能够成功的。目前最好的期望是核武器不断裁减,达到一个稳定的最小数量。

三、中国对核裁军的态度

中国与英法三个中等核国家对核裁军的态度有相似和不同之处。笔者曾在《论核威慑》(见《美国研究》1988年第一期)一文中已有所论述。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三个国家都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核武器以维护各自的安全,因此在美苏实现大量裁减之前,不会考虑加入核裁军的行列。

中等核国家部署少量核武器纯粹是为了防御。它们的核武器虽少,但在遭到核进攻时仍能通过有限的核反击给对方以较大的打击。这样一来,中等核国家具有某种对超级大国的威慑能力,从而也就能以有限的代价取得与超级大国比较平等的战略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都想挤进核俱乐部的原因。

目前核武器有扩散的趋势。核武器技术已经相当公开化了。只要有心制造,并具备一定的条件,许多国家都有可能成功。《核不扩散条约》规定有核国家不得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无核国家也不得获得核武器。我们认为核武器扩散不是好事,但是让核武器为少数国家垄断下去也是不公平的。因此中国不签署这个条约,但也不去搞核扩散。

中国对核裁军的态度最早见诸1982年黄华外长在联合国第二届裁军大会上的发言。其大意是美苏两国应率先停止核武器的试验、改进、生产,并将它们的各种类型核武器及其发射工具削减一半;在这以后,中国也准备同其他核国家一道停止核武器的发展和生产并实行裁减,直至全部销毁。

一些外国朋友询问,在美苏裁减了50%的战略核武器后,中国是否准备参加?这显然是一种误解。黄华当时讲的是削减各种类型的核武器的50%,而不是仅指战略核武器,所以美苏即使达成了那种协议,也不足以使中国参加核裁军的行动。

后来中国对自己的核裁军的态度做了一些调整。1986年3月,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关于国际和平年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说:美苏“理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地削减并就地销毁各自在其国内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样,就有可能为召开由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创造积极的条件,以商议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步骤。”他没有说明“大幅度”是多大比例。他还表示在美苏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后中国可以参加商议。

关于中国对核裁军的态度，笔者在下面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美苏的核武器大约各有25000个，而中国以及英法的核武器则大约各有几百个，相差十分悬殊。这就是中国历来要求美苏首先大量裁减核武器的原因。中国不打算成为超级大国，不想也不可能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同超级大国展开竞赛。国家无论大与小、强与弱，都有保卫自己的权利。在上述差别悬殊的条件下，在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尚未完全消除之前，中国再对自己的核武器做一些改进，甚至增加一些数量，是无可厚非的。

美苏销毁了中程导弹后，如果再进一步削减其战略核武器的一半，它们所剩下的核武器还会有17000个左右。即使把一切类型的核武器都削减50%，仍会剩下12000—13000个。这个数字同中国的核武器数量相比，依然相当悬殊。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不知道英法将如何反应，但认为中国依然不宜开始裁减核武器。

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会考虑参加核裁军的讨论呢？对这个问题很难作出预先设想，必须根据未来中国和世界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确定，是有相当的伸缩余地的。但是下述两个条件可能是必需的。

（一）美苏应率先继续裁减核武器。中国虽然不一定要它们裁减到同中国对等，但必须达到同中国的核武器在数量上相差不十分悬殊的地步。

（二）除了核武器外，常规武装也应大幅度削减。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当禁止。

笔者设想，当美苏的核武器削减掉95%，只剩1000—1500个的时候，中国可能会参加裁军谈判。这个数字将使美苏都仍能保持基本摧毁对方的能力，因此核威慑将仍起作用。但是它们将不得不因而放弃“实战威慑”，因为要想从一两个核武器打起，逐步升级到大规模毁灭，这点数量是不够的。将来通过谈判可以规定一个各保留多少的比例，比如说美苏各1000，中英法各400。如果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少到如此程度，常规武装也大量减少，化学和生物武器被禁止，那么世界上就会太平得多了。不过武器的减少并不能消除发生战争的根源，因此战争的危险尽管小多了，但依然会存在。只有当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世界才会免除战争的危险。但愿缓和的局势不断发展下去，有一天能使核武器彻底消灭，世界各国能在相互依存的和平环境下不断繁荣昌盛。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经过

贾庆国

1954年12月，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固定了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三角政治关系，对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条约签订的内幕鲜为人知。近年来由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终于使人们有机会了解这一重要历史片断的真实情况。

这些文件向世人表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产生过程是曲折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当时微妙变幻的中美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文件和当时的历史情况加以分析，向人们重新展现这一历史过程。

一、条约的提出

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关于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1)台湾当局选择这个时候向美国提出这个建议,既反映了当时亚洲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也暴露出台湾当局对这些变化对台湾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的影响感到不安和忧虑。

随着朝鲜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亚洲国际局势的发展向台湾当局提出新的日益严重的挑战。至此,战争的双方对继续这场较量都失去了兴趣。美国政府不仅要耗费巨资来维持这场战争,而且发现自己在国内外越来越孤立。国际上,美国的盟国先后从朝鲜战场撤出各自的军队;在国内,美国人民对于这场只花钱流血,目的不明且不见输赢的战争感到越来越厌倦。这一情况使朝鲜问题成为195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一大焦点。艾森豪威尔正是在向选民保证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下入主白宫的。尽管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一再重复其反共决心,但是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还是采取了能停尽量停的态度。(2)

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基本态度和本身的利益也决定了它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积极谋求和平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停战只是个时间问题。

朝鲜停战的前景虽然有利于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但却给台湾当局带来新的忧虑。首先,从政治上讲,朝鲜战争以停战的方式而不是以中共失败的形式结束,这不仅意味着蒋介石借朝鲜战火重返大陆的梦想破灭,而且象征着中国国际威望的进一步提高,使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其次,从军事上看,朝鲜战事一休,中共针对台湾的军事力量将会因此而得到加强,这将对台湾当局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威胁。

不仅如此,朝鲜战争的结束还会给美台关系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一,美国第七舰队当初进驻台湾海峡的公开理由是美国在朝鲜作战的需要。朝鲜战事一停,第七舰队便师出无名。美国必须另想对策,新的对策为何,台湾当局不得而知。其二,美国的盟国,特别是英国,早就对蒋介石丧失信心,并劝告美国面对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这一现实(3)。朝鲜战争进行时,这一劝告难以奏效。但是,一旦和平成为现实,美国是否会听进这一劝告也不得而知。其三,台湾当局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牺牲台湾与中共作交易的可能。台湾当局一直坚持认为美国的介入是其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4)。内战前后,美国曾反复试图在中国寻找第三势力以取代蒋。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又约束蒋针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5)。对这一切,台湾当局都记忆犹新。它明白,在美国认为必要的时候,它是不惜牺牲台湾当局的利益的。其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似乎又证实了台湾当局的疑惧。美国直至最后才任命驻台大使这一事实似乎表明:尽管美国支持台湾当局,但这种支持只是一种权宜之计(6)。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自然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新的对策。

这个新的对策就是设法维持并进一步争取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维持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台湾当局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台湾当局可以从中获取多重好处。其一,在军事上,台湾可以利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以及在必要时阻止中共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并获取军援进一步武装自己。其二,在经济上,台湾可以从美国争取援助,促进岛内经济发展。其三,在政治上,台湾可以利用美国民主自由的口号,支撑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其四,从长远的角度讲,台湾还可以期待有一天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守势改变为攻势,从而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与美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成为台湾当局外交中的关键环节。

二、美国最初在“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的态度

尽管台湾当局对与美签约抱有十二分的热情，美国政府最初的反应却十分冷淡。顾维钧的建议一提出，杜勒斯就一口回绝了（7）。以后，台湾当局又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向美建议举行谈判，但是，直到1954年9月，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华盛顿在缔约问题上的态度。

作为台湾的保护人的美国为什么会为缔约采取冷淡态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美国当时对蒋政权的基本态度谈起。现在看来，尽管当时美国支持蒋政权，但这一支持是十分有限度的。它既不是出于道义上的选择，也不是完全为了维护蒋的利益，而是基于美国冷战战略考虑的一项权宜之计。与它的前任一样，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认为中国人民拥护蒋介石，也不相信蒋在台湾实行的政治制度体现了民主自由的原则，也根本没有准备为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或守卫蒋军控制的大陆沿海岛屿而去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它支持蒋政权只是因为它认为台湾必须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一个战略据点，以遏制想像中的共产主义在那个地区的扩张。对于美国来说，台湾充其量只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蒋介石本人则是一个不太理想，但一时又无法替代的舰长。对于这样一个伙伴，美国自然不愿被条约与之绑在一起（8）。

除此之外，美国在条约问题上态度冷淡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第一，美国担心蒋介石为实现其重返大陆的梦想，主动采取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把美国拖入中国的内战中去。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进行一场耗资巨大、旷日持久、未必能胜的战争，而且还很有可能牵发一场世界大战。

第二，美国不愿承担助蒋防守其控制的沿海岛屿的义务，也不希望明确宣布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将迫使美国明确表态，使美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承担防卫这些岛屿的义务，将使美国冒与中共军队直接作战的危险，而且一旦这些难以防守的岛屿从美军手中丢掉还会损害美国的威望。不承担防守这些岛屿的义务又等于明白告诉中共他们可以对这些岛屿任意处置，从而招致中共军队对这些岛屿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盟国和国会的态度也是美国政府在条约问题上态度冷淡的重要因素。美国的许多盟国对美支持蒋一直持保留态度。它们不相信蒋从大陆逃到台湾的腐败政府和不堪一击的军队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更谈不上反攻大陆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蒋对所谓“自由世界”只是个包袱，美国的政策得不偿失。他们担心，美国对台政策最终可能导致美卷入中国的内战，给各国带来新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美蒋签约势必要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对（9）。

50年代的美国国会虽然以反共辞令著称于世，但多数议员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最疯狂的时代，真正希望不顾一切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国家决一雌雄的人也只是极少数。美国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态度就是例子。世界上头号军事大国与用落后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签订停战协定，一方面反映出中朝人民的英勇机籍和世界战略格局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美国国内和平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可能说服国会支持其为保护几个中国沿海岛屿去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因此，出于不影响与盟国的关系和避免招致国会反战势力的指责考虑，美国政府也不愿意与蒋签约。

最后，美国希望保持外交上和军事上的灵活性。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通过外交活动促成中苏分裂不抱什么幻想，但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0）。此外，美国也未完全排除通过外交手段约束中国的所谓扩张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总统几次重申美国不要讲“永远”不承认中国，并主张解除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11）。与蒋签约无异于在外交上堵死这条路。从军事上讲，美国也不希望让条约捆住自己的手脚，而是希望保持其军事上的灵活性，使中共摸不透其意图，在行动上有所收敛；在必要时，美国还可以随时为其目的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政府内部在缔约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尽一致。以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 Robertson）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坚决主张与台缔约，1954年2月2日，罗伯逊在给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中表明了他对签约的态度。他写道：“‘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会：（1）大大提高蒋军的士气；（2）使蒋政权获得与美国亚太军事联盟体系成员

国同样的地位；（3）抵消蒋对美参加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关于印支和朝鲜问题会议的疑虑；（4）向美国的盟国表明美支持蒋的立场。”他说，他主管的远东事务局原则上赞同蒋提出的条约草案。因此，他建议：“（1）杜勒斯授权远东事务局与国防部协商准备一个美国方面的条约草案；（2）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与蒋签约；（3）迅速将以上两项建议付诸实施，以使条约的谈判能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开始进行。”（12）

但是，罗伯逊的建议并没有为杜勒斯所接受。2月27日，杜勒斯告诉罗伯逊，尽管罗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但人们仍然可以说现在谈判并不适宜。这会给英国和法国造成美国故意破坏日内瓦会议的印象，从而影响美国和盟国的关系。可是，罗伯逊并不就此罢休，他强调说在日内瓦会议前举行缔约谈判至关重要，这恰恰是他本人所希望的。他还说他决不改变这个态度（13）。

3月31日，罗伯逊再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杜勒斯建议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举行缔约谈判。他写道，远东事务局认为，即使从日内瓦会议谈判的角度讲，也应当这样做。因为它可以进一步明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从而加强美国在日内瓦谈判中的态势。但是，杜勒斯仍不为之所动，而是以“微妙的参院问题”为由再一次拒绝了这个建议。美台缔约谈判由此而被搁置下来（14）。

三、美国对缔约谈判态度的转变

日内瓦会议以后，台湾海峡的局势突然发生变化，中国开展解放台湾的运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罗伯逊不失时机，于8月25日又一次向杜勒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日内瓦会议一结束，中共就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解放台湾的宣传战，尽管这一口号不是第一次提出，但此运动规模之大意味着中共正在做很大努力把国内外的注意力引向台湾问题。中共的这一运动可能会增加国际社会在台湾问题上对美的压力。为了根除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各国可能会要求通过谈判改变台湾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通过与蒋缔约向世界表明其为保卫台湾不惜一战的决心（15）。

这一次，罗伯逊的建议在国务院内获得了更多的支持。8月27日，以前反对进行条约谈判的国务院计划室主任罗伯特·勃仪（Robert R. Bowie）对罗伯逊的建议表示同意（16）。8月30日，国务院欧洲事务局也撤回了其早先在条约谈判问题上所持的异议。（17）

但是，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仍然是一个难点。在国务院内部的一次会议上，杜勒斯指出：法国国内和印度支那刚刚发生的事要求美国在亚洲的举动慎之又慎。美国不允许让自己的形象再次受到损害。在台湾问题上，尽管美国决心不让台湾落入中共的手中，但它必须保持在这个问题上行动的灵活性。杜勒斯承认有必要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考虑到沿海岛屿的复杂性，他又主张把谈判再推迟一段时间（18）。

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马祖，台湾海峡的局势白热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委员会最后决定暗请新西兰提议要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在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并出面“斡旋停火”（19）。由于这个建议损害了台湾的利益，因此会遭到台湾当局的反对，安抚台湾遂成了当务之急。罗伯逊抓住时机，于10月7日给杜勒斯又呈送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使“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万分火急。他写道，与台北缔约不仅仅是抵消新西兰提案的副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也是阻止中共攻击台湾的最佳措施。因此，美国应在新西兰提案拿出之前同意举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20）。这一次，罗伯逊的努力终获成功（21）。

四、从谈判到签约

尽管美国同意谈判,但美蒋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出于对国内外诸种因素的考虑,美国政府准备将其对台的条约义务明确限制为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22)。此外,为了避免由于蒋头脑发热,主动挑起与大陆的军事冲突,把美国拖入中国的内战,美国还要求台湾当局保证在征得美军同意之前,不针对大陆采取任何进攻性军事行动(23)。

台湾当局对于美国的这一安排十分不满。首先,它可能导致中共进攻并夺取蒋军控制之下的沿海岛屿。这会使蒋军士气再次受到严重的打击,还会割断台湾与大陆之间仅存的一点领土联系,造成台湾与大陆事实上的分裂。其次,由联合国出面实行台湾海峡停火,又意味着在国际上确定台湾海峡的局势固定化,台湾当局不得不接受与大陆永久分离这个前景。这两点是台湾当局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难以接受的。正如台湾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对罗伯逊所说的,沿海岛屿的得失对台并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台湾也不是吝惜那点领土,但是,这些岛屿是台湾反攻大陆的决心和希望的象征。因此,一旦失去了这些岛屿,台湾的前途也就黯然了。(24)出于以上考虑,台湾当局在谈判中坚持:(1)美国必须承担协蒋防守沿海岛屿的义务;(2)美国应对新西兰政府施加影响,阻止后者向联合国提交台湾海峡停火的建议;(3)倘若无法阻止新西兰建议的提出,台美无论如何要在此建议提交之前缔约(25)。

由于美蒋利益冲突,谈判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继续炮击金门和马祖(26)。从11月1日起,解放军浙江前线部队又开始针对蒋军在浙江沿海的岛屿进行海空袭击(27)。形势对台十分不利。台湾当局意识到美国既不会承担防守沿海岛屿的义务,也不愿阻止新西兰建议的提出,只好放弃坚持这两条,只求在新西兰建议出笼前缔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台湾当局恳求美国同意不在条约正文中明确规定美国的义务只限于协蒋防守台澎,以及蒋军针对大陆的任何大的军事行动都必须事先征得美军的首肯,而是采取秘密换文的形式将这两点确定下来。美国先是不同意,但最后还是在这个技术问题上作了让步。于是,在1954年12月2日签订的条约草案中,虽然条约正文规定美国将承担“防卫”台、澎和其他双方都认为必须防卫的领土,但是,在美台关于条约的秘密换文中则明确规定,美国的条约义务只限于防卫台澎,并且,蒋军针对大陆采取的任何大的军事行动都需事先征得美国的同意(28)。

五、从签约到批准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必须提交美国国会参院审议表决,只有当参院2/3以上的多数赞成的时候,条约方能生效。所以,12月2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条约制定程序的完成。相反,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签订条约的前后做了大量工作以使条约在参议院能顺利通过,但是,由于参院内部利益错综复杂,议员们意见不一,条约能否获得2/3以上参议员的支持仍是一个未知数。

1955年1月6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向参院提交了条约。但是,参院还没有来得及审议,浙江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就对一江山岛发动了攻击。面对台湾海峡局势的这一新的变化,艾森豪威尔决定立即采取行动。1月24日,他请求国会授权他为了防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必要时动用武力。虽然国会中许多议员不愿将此重大决定权托付总统,但面临台海危局又无其他办法。民主党议员约翰·默克科麦克(John W. McCormack)说,作为一个议员,此刻只能支持总统(29)。他的话准确地表达了许多议员此刻的心情。另一个民主党议员詹姆斯·里查德斯(James P. Richards)也指出,如果国会此刻动摇的话,那么美国将无法期待在共产主义威胁之下的小国顶住共产主义的“扩张”。“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摒弃疑惑,开始作决定的时候了。”(30)最后,国会参众两院终于分别以85:3,409:3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所谓“福摩萨决议”。

“福摩萨决议”通过不久,参院就开始讨论“共同防御”条约。条约中有关台澎以外领

土的条款立即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参议员莫斯（Waynes Morse）和汉弗里（Herbert H. Humphrey）都主张把条约中规定的美国的义务明确限定为防御台澎。莫斯还敦请参院拒绝批准这一条约（31）。但是，在“福摩萨决议”刚通过，台湾海峡的局势继续告急的情况下，多数参议员觉得只能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资深参议员瓦尔特尔·乔治（Walter F. George）说，“现在任何软弱与犹豫的表示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32）在这种气氛中，参院终于以64票赞成，6票反对的多数批准了“共同防御”条约。

六、小 结

综上所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影响中美关系的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相互牵制、不稳定的特点使得条约的制定过程复杂、多变。对条约的设想首先由台湾当局提出。开始，尽管签订条约本身与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签约所带来的一系列国内外问题导致美国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举棋不定。后来，台湾海峡局势的突变改变了这一状况。首先，它促使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趋向缔约。其次，它改变了不利缔约的国际环境。再次，它迫使蒋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妥协。最后，它在美国造成了有利于国会批准条约的政治气候。

这里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相反，它只是以法律的形式重申了美国为维护其战略利益，分裂中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不管当时美台是否签订这个条约，美国都会坚持这一政策的。

注释：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 158.

(2) Dwight D. Eisenhower,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3), pp. 178-191.

(3)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 348.

(4) *Ibid.*, pp. 740-741.

(5) Eisenhower, *op. cit.*, p. 172.

(6) 美国于1953年2月任命卡尔·蓝金(Karl Rankin)为美驻台大使。

(7)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 158.

(8) *Ibid.*, pp. 312, 314-315.

(9) George McT.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4-6;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p. 324-325; *FRUS: 1955-1957*, Vol. 3, p. 292.

(10)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 516.

(11) *Ibid.*, pp. 268-273; *New York Times*, May 29, 1953, p. 3.

(12)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 368.

(13) *Ibid.*, pp. 369-370.

(14) *Ibid.*, pp. 400-401.

(15) *Ibid.*, pp. 548-549.

(16) *Ibid.*, pp. 552-553.

(17) *Ibid.*, p. 553.

(18) *Ibid.*, pp. 554-555.

(19) *Ibid.*, pp. 623 and 696.

- (20) Ibid., pp. 706-707.
(21) Ibid., pp. 708-709.
(22) Ibid., pp. 709 and 734.
(23) Ibid.
(24) Ibid., p. 781.
(25) Ibid., pp. 737, 740-741, 743, 754, 779-788, 797-801.
(26) Xinhua News Agency, *Daily News Release*, October, 1954, pp. 126 and 323.
(27) 聂凤智:《三军挥戈战东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3页。
(28)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 929.
(29)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1955, p. 2.
(30) *Time*, No. 6, February 7, 1955, p. 10.
(31)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1955, p. 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55, p. 1388.
(32)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1955, p. 10.

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

——兼议“精英舆论”

袁 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凭借亚洲这一舞台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大国。以中美关系为例,自从美国提出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后,一部中美关系史便是“以在文化、历史、政治深渊两边出现的动乱、扰攘和意外事件为标志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如同万花筒一样多变。应当指出,形象问题并不对两国关系产生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影响两国关系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各自在变幻的国际情势下从本国利益出发而作出的战略调整。然而,在“形象”这一表面上呈万花筒一般的现象背后,还是有它形成与发展的一些特殊轨迹的。就美国方面塑造中国的形象这一点而言,它往往较为生动地反映出美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乃至政治制度上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往往是在历史进程中长久起作用的因素。因此,在回首中美关系史时,对美国怎样塑造中国形象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的透视,还是颇有意义的。

一、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面面观

在一般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了解这一层次上,用寓意深刻的“瞎子摸象”这一古印度寓言来形容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也许是一个最浅近、最生动并且又最符合实际状况的譬喻。在不同的时期,美国人远渡太平洋来到中国,他们根据各自的经历体会,对中国的形象作了五花八门的描绘。这些文字反映的往往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

至风土人情的许多不同的侧面。当这些见闻又回到太平洋彼岸时,生活在美国本土上的人们便面对着一幅幅眼花缭乱有时甚至是扑朔迷离的图景。因此,费正清最近在对美国公众强调要认真思考中国形象这一问题时指出:“形象问题是一个十分变幻不定的主题。”(1)

然而,学者们还是努力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的演变作了一些分类与归纳。1958年,曾在40年代担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哈罗德·艾萨克斯(伊罗生)的《浮光掠影——美国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形象》一书出版。该书后来被广泛征引,遂成传世之作。他将美国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分为下列六个阶段:(1)尊敬时期(18世纪),(2)轻视时期(1840—1905),(3)乐善好施时期(1905—1937),(4)赞赏时期(1937—1944),(5)清醒时期(1944—1949),(6)敌对时期(1949—)(2)。20年以后,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前夕,美国学者就形象变化问题提出了略有不同的分期意见。(1)尊重时期(1784—1841),(2)轻视时期(1841—1900),(3)家长式统治时期(1900—1950),(4)恐怖时期(1950—1971),(5)尊敬时期(1971—)(3)。如将两者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他们对20世纪以前的中美关系看法是一致的,分歧在于20世纪以后。当然,他们都指出,这种分期只是粗线条的归纳。历史的发展错综复杂,在划阶段时亦绝不可能泾渭分明,在各个时期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也经常互相影响渗透。

这些情绪上大起大落的阶段必然产生五花八门的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看法。艾萨克斯曾对181位美国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商人、传教士进行调查专访,他所得到的答案可用一大串形容词来概括:在褒义词汇中,中国是“务实的”、“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国人是“善良的”、“充满活力的”、“勇敢的”、“忠诚的”、“富有幽默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天才的民族”,“世界上最成熟的民族”,“亚洲的最杰出的人民”……;在贬义词汇中,中国人是“靠不住的”、“狡猾的”、“残忍的”、“无效率的”、“无社会责任感的”、“排外的”、“没有高度知识化的”、“莫测高深的”,等等(4)。

这一毁誉参半的词汇表只能在最表面的层次上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这些在一般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上都可以通用,并不仅仅在中美关系上具有典型意义。在这里作一罗列,也只是用较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瞎子摸象”的深刻寓意而已。然而,有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观察已高出这一层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有较为长期的在华经历,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作过较为深入的体察,其中多数为驻华外交官、学者以及新闻记者。他们的言论往往被称为“精英舆论”。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二、形象与决策

就国际关系的一般情况而言,在最高决策层用以表示形象的语言是很简洁的,即非敌即友或盟国。但是,在中美这一特殊关系中,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决定对华政策时,美国决策人首先考虑的是战略利益,或综合的美国国家利益。地理情况、经济利益、政治及军事部署等诸方面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形象”问题不能与以上因素并列。在美国立国之初,富兰克林、麦迪逊等人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将中国看成是人杰地灵的“文明礼仪之邦”。杰弗逊对中国本身在政治经济上采取孤立超然态度称羨备至,他认为美国如以中国为楷模而超然孤立于欧洲之外,就可以避免战乱纷争。乔治·华盛顿在1785年之前甚至将中国人说成“不管外表如何滑稽可笑,他们终究是白种人”。无论以上的形象估计与现实的距离多么大,但对决策却无直接影响。因为中国在美国立国之初的国策考虑中只占极其边缘的地位。

但是,随着美国在亚洲势力的增长,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的增长,“形象”问题在决策中便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大众新闻媒介、官方声明和决策者的回忆录中,仍有

证据表明,感情用事的见解仍然对美国的想法产生微妙而重大的影响。”〔5〕典型的例子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的对华政策。作为一个“实力政治”的信奉者,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落后、无能”的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无足轻重。他个人对中国的轻蔑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在他的语言中只是一个形容词。举凡他所看不起的事情,一概在前面加以“中国”两字来形容。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者在仔细研究了罗斯福的远东政策后,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当中国内部产生了新的改革的希望时,西奥多·罗斯福仍认定中国是一个“军事软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民族”。因此,他放弃了与中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机会,造成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失误,最后终于导致了几十年后的灾难〔6〕。可见,“形象”因素的作用与后果有时不可低估。

就美国的决策程序而言,“形象”问题在对华政策中起作用的层面与层次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美国驻华使领馆、国务院、国会、军方、总统在对同一问题上往往有各自带感情色彩的“中国形象观”。在决策中,这些五花八门的形象观便互相撞击。它们有时相互融合,但更多的是争执与分歧。因此,在战略方针既定的情况下,具体政策如何实施便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了。各个职能部门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报来源及“中国形象观”而作出各种具体的政策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相当明显。它主要体现在美国对日本以及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上。在罗斯福的任期之内,在“将中国置于与日本的战事之内”的大战略下,就有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部分外交官与赫尔利之争,有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之令;在杜鲁门的任期之内,在“战后一个统一、民主、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总前提下,就有“援蒋”还是“弃蒋”的分歧,有国务院与国会的激烈辩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皆有“中国形象观”这一因素在起作用,它既作用于不同方面,又作用于不同层次。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这一微妙而又事关重大、影响深远的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作用于一切参与决策人物的全部思维与行为之中。关于这一点,很有必要列出专题进行进一步具体的、个案的、比较的深入研究。

三、形象的塑造

在美国,是什么因素影响对中国的形象塑造呢?

首先是国际环境。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大地》轰动一时,该书发行了200多万册;被摄成电影后,观众达2300万人。与《大地》几乎同时问世并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巨大震动的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它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个中国形象,第一次向世界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大地》和《西行漫记》之所以在美国得到成功,除了本身在写作上别开生面之外,客观上是适逢其时。面对日本的侵略势头,美国公众的同情倾向于中国一方。当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对在亚洲大地上发生的这场对抗都显示出很大的关注。《大地》与《西行漫记》使中国更具体化和形象化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突变。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莫斯科的工具”,而且“侵略”、“好战”,“赤色恐怖”与“黄祸”加在一起,中国在美国的形象真可谓面目狰狞。30年代时《西行漫记》中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从一般美国人心目中消失了,连它的作者也不得不迁居国外。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也影响着对中国形象的塑造。50年代初,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一时。“谁丢掉了中国?”成了攻击上至总统、国务卿下至一般外交官、记者、学者的咒语。共和党人批评民主党政府将中国推入苏联的怀抱,一时人人自危,凡提“中国”就谈虎色变。6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反对越战情绪高涨,一部分人出于反对本国政府的印支政策,重新注意中国,并写书著文(不少到70年代才发表),其中不乏对60年代中国的肯

定之词。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动乱之中。以上例子说明，那些虚构的“中国”的形象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折射，其图象自然是被扭曲的。

再一方面，中国本身内部的变化也对它在美国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以后将在另文中讨论。

国际环境、美国国内政治、中国本身的变化是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塑造的几个重要因素。但是，真正的塑造工作是由人来完成的。这样就必须要着重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中美国方面的所谓“精英舆论”。

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时期，必然存在一批“精英”。他们是社会的头脑与眼睛。他们往往集历史感、现实感与超前意识于一身。任何社会，如要真正进步与发展，是离不开“精英”们的眼光与思考的。

美国自立国以来，对“精英舆论”一直给予重视。现在遍布美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思想库”、大学等等就是给“精英”们提供的一个思考辩论、献计献策的场所。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精英舆论”的作用尤为显著。当然，它们多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很难以中国的标准去衡量美国“精英舆论”孰优孰劣。本文中所说的“精英舆论”，一般是指那些能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观察问题并尊重客观事实的分析与见解。

40年代，有一批驻华的美国外交官、学者、新闻记者从事“精英舆论”的工作。1947年，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发表《中国的惊雷》一书，向美国公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革命。不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发表《美国与中国》这一专著。它从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这一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实体的特点，告诉西方人应当如何去理解中国。值得在今天重新翻阅回味的是40年代一批驻华外交官发给本国政府的现已解密的报告，其中有些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有的甚至可以与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媲美。它们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被采纳，但对后来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起了积累材料和奠定基础的作用。

“精英舆论”在塑造中国形象、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关于这一点，资中筠在《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一文中已作了系统和全面的介绍〔7〕。本文只想从“精英舆论”对形象的转变的影响这一角度作一点补充。

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朝野对中国的称呼通常是“赤色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敌对的国家，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想起来就害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8〕到了60年代，虽然麦卡锡时期的恐怖已经过去，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开始，但彼此的敌对与戒备心理仍十分严重。一个在对日作战时曾在陈纳德的“飞虎队”中服务过的退役军人甚至预言：“我已经42岁了。我绝对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会与中国再打一次仗。”〔9〕对一般美国人来说，朝鲜战争以及1954、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仍记忆犹新，中国的形象仍是“侵略”与“好战”。然而，“精英舆论”却已在这种情势下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出发，重新考虑与审视美国对华政策。在这项工作中，美国的一些“思想库”、基金会和学者们起着重要的作用。1960年，鲍大可发表《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一书，指出“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最摧枯拉朽、最有扰乱人心的影响的国家之一”，他告诫美国决策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必须调整政策〔10〕。同一年，艾伦·惠廷在美国著名思想库兰德公司支持下写成《中国跨过鸭绿江》一书。他运用大量材料分析中国为什么入朝参战，“中国共产党的参战行动是由理性驱使的。中国既没有参与策划战争，也不是因为俄国人的压力。”“美中关系白皮书”的主要起草者菲利浦·杰赛普认为：“这本书符合美国在未来远东的新危机中与北平政府打交道时应采取的客观态度与政策的需要。”〔11〕

这些“精英舆论”对美国决策人与公众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1961—1962

年，印度支那局势紧张，美国人称之为“老挝危机”。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肯尼迪总统认识到，中国考虑的首先是本身安全问题，“即便共产党人在追逐他们的目标时仍是残忍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谨慎的、现实的，他们对自身的军事力量有着清醒的估计，而且只在他们认为是与中国直接相连的至关重要的利益问题上才去冒险。”〔12〕因此，当负责政策设计的助理国务卿罗斯托提出由美国派遣三个师去老挝的建议时，肯尼迪拒绝了。他此举意在向中国方面表明，“我们理解你们”。与他的前两任总统相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尤其在危机处理时，肯尼迪要“相对成熟得多”，“他向中国表明，如果中国不伤害美国的最低限度的利益，则中国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13〕

当时的“精英舆论”不但为决策层勾划出现实中的中国的形象，而且从历史文化的深度告诉美国公众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埃德加·斯诺于1965年指出：“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要从两重性的角度来看那里的人们。他们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一种在基因与文化上都长存不变的文化的代表。”〔14〕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旅美华裔学者张歆海向美国公众提出：“那些古老的帝国现在都在哪里呢？古波斯、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古巴比伦和埃及，它们现在都在何处呢？它们走进了历史，又一个个消失了。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中国懂得，仅仅靠武力是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永存的。”〔15〕

虽然当时中美关系的坚冰未开，但这些“精英舆论”已在逐步改变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它们的影响面与作用程度各不相同，但就它们的出现与参与而言，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些舆论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即：（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并正在发展的政治文化实体，不容忽视；（2）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是以防卫为主，而不是像50年代中被描绘的那样“侵略好战”。当我们今天在谈论70年代以来以及在可望的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时，60年代“精英舆论”在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上力排众议并定下的这两点基调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四、美国的政治传统与对中国的形象塑造

作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外交使节，顾盛在赴任前夕说：“往日，是东方给这一片文明世界带来了文明与知识的曙光，如今，这一潮流反过来从西方回到东方。我们已经成了我们的老师的老师，我要到中国去了——我是作为文明的代表而去的。”〔16〕立国虽短但笃信“命运天定”的美国人，相信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宗教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旦机会来临，他们便希望别人也接受这种美国式的制度与观念。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我们总是很容易从自己出发去判断要求别人，从杰克逊时代的变革以来，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17〕看来，这种“习以为常”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思维传统了。1983年，美国的大西洋理事会生动地指出：“从美国的观点看，我们的19世纪‘多情的帝国主义分子’（教士、商人和冒险家，他们是开路先锋，是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中国人民的形象）形成了一个传统。看来，美国人将奉天承运横渡太平洋西去，把‘进步’和‘文化’带给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而施主也将因此而得意洋洋。”〔18〕

但是，美国人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有着本身悠久历史的政治文化。无论在哪个时期，中国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按照美国的模式行事。美国人对此是大惑不解的。在中美的交往中，美国在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爱一恨情意结”；“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既聪慧睿智又迷信无知，既富有活力又软弱无能，既是难以推动的保守又是难以预料地好走极端，既有逆来顺受的冷静又有突如其来的暴力。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总是在同情与反感、家长式的爱护与恼怒、倾心与敌对、爱与恨之间徘徊。”〔19〕这种“爱一恨情意结”是贯穿于美国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中的另一个传统。

就主观原因来说，这种“爱一恨情意结”的产生是因为美国人太固守自己的政治观与价

价值观。旅美华裔学者邹谠在经过对美国社会多年的深入观察与思考后指出：“美国的政治形态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一种高度的精神一致性的保护。美国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所有的观念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20〕这种美国对中国的“爱—恨情意结”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民族政治文化上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些特殊之处。政治家们“爱”这个太平洋彼岸的有广袤疆土的国家，却又“恨”它成为敌人的朋友；商人们“爱”那广阔的市场，却又“恨”它不易开发和利用；传教士们“爱”那可以传播福音的活动天地，却又“恨”它不轻易接受基督教义；兴办文化教育的美国人往往觉得自己对中国倾注了满腔热忱，却又常常被中国师生们表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弄得黯然神伤。对美国人来说，以他们本身得天独厚的条件，“命运天定”的观念，充满自信心的美国精神来看，大洋彼岸的这个富于吸引力的国家实在是太难以捉摸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的“精英舆论”已经开始对这种“习以为常”的传统进行认真的反思，“在美国，没有人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看中国是以美国式的眼光来看的，它又立足于一种对我们本身影响中国事务能力的过高估计，而且基于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缺乏准确性的概念。”〔21〕当然，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要改变自己的政治观念。但是，部分“精英舆论”认为，美国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而且重要的是改变认识中国时的立足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特别是研究与西方冲突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观所造成的歪曲。”〔22〕“精英舆论”的这一思考，值得引起重视。当然，它们远未形成主流，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内还是曲高和寡。但是，它们反映了一种反传统的新思维方式，而在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大变动的时期，反传统的新思维方式，尤其是将别文化作为自身思考时主要参照系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富有生命力的。

五、70年代以来中国在美国的形象

经过比较深刻的思考以后，美国的一部分“精英舆论”认识到，“中国既不是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也不是一个永久的敌人。它是一个很大的、很明确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它）不是作为美国或者苏联的仆从，而是作为一个凭本身的力量就足以自存和独立的大国。”〔23〕应该说，从国际格局与中美政治关系大局来看，与本世纪前半期相比，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趋于稳定与成熟了。

但是，近20年来，由于国际环境，美国国内政治、中国本身内部情况的发展，美国公众舆论中的“中国”形象有时仍然是“变幻不定”的。粗略归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中国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的美国商人、投资者、学者、新闻记者、技术人员及游客。他们与中国的交往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因此，就具体的形象塑造来说已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了。它们不但反映出美国传统的对中国的看法，还有新的发展与变化。

（二）70年代初，由于“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系列富有戏剧性事件的影响，“美国全国都压抑不住对中国人的感情冲动”，于是，对中国的赞美之词接踵而至。但是，10年以后，《中国“发臭”了》、《中国——苦海余生》等文章书刊相继问世。中国这一形象前后反差极大。70年代初，中国被描绘成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平等的社会、“几乎全体人民参政”、“和谐团结”；而8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实际上的不平等”，“少数人参政”，“一盘散沙”的议论便取而代之。〔24〕一些曾在中国“文革”期间着力歌颂过中国的美国人反过来激烈地批评中国。这种情绪上大起大落、看法上大幅度跳跃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当中国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接触时（如在美国立国初期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美国对中国往往赞扬备至，而一旦当中国先被动后主动地打开大门，美国人实地接触了中国以后，各种抱怨、批评、疑惑又纷纷而来。80年代出现的这一现象，是否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国的

看法由“空想”到“现实”的又一次循环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它在中美这一特殊关系中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三）在众议纷纭中，美国的一部分“精英舆论”仍然力图起主导作用。他们认为，从“单方面、易走极端地、扭曲地看中国，不会导致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感而只会是一种轻蔑感。”（25）年逾八旬的费正清于1986年、1987年连续出版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及《望中国》两部著作，强调要从历史发展的纵深处来理解中国与中国革命。当然，这些“精英舆论”本身的走向以及作用，还要由今后的国际环境变化、美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中国本身的发展这几个因素来决定。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无全球性的激烈冲突，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保持70年代以来的连续性、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本身的发展与变化这一因素将在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起比较重要的影响。

回顾历史，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几经变幻。这些变化构成了中美这一特殊关系中的一个生动的侧面。它们既反映了国际因素与两国国内因素的作用，也反映了美国民族的观念与性格上的一些特点。然而，只要中美两国关系继续发展，“形象”问题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如何看中国？中国又如何看美国？如果将这些问题深入地探讨下去，是可以加深相互的理解并发现中美关系中的某些内在价值的。当然，这个任务不可能在本文中完成。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与开端。

注释：

- （1）J. K. Fairbank: *China Watch*, p. 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Harold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p. 71, Greenwood Press, 1958.
- （3）Warren Cohen: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引自 *Dragon and Eagle*, edited by Michel Oksenberg and Robert Oxnam, p. 55, Basic books, 1978.
- （4）同（2），pp. 72-73.
- （5）韩德（迈克尔·亨特）：《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中文版序，《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第160页。
- （6）Howard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p. 251, Baltimore, 1956.
- （7）见《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 （8）A. T. Steele: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p. 61, 1966, McGraw-Hill Book.
- （9）Ibid.
- （10）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Vintage Book, 1960.
- （11）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0.
- （12）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 291, Delta Book, 1964.
- （13）David Lampton: "The U. S. Image of Peking in three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XXVI, No. 1, p. 28, 1973.
- （14）Edgar Snow: Introduction for *America and China*, written by Chang Hsinhai, Royalton College Press, 1965.
- （15）Ibid, p. 92.
- （16）James Thomson: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p. 17, Harper and Row, 1981.
- （17）Lovis Harts: *The Liberal Traditions in America*, p. 302, New York. 1955.
- （18）《美中关系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页。
- （19）Harold Isaacs, op. cit., p. 64.

(20) Tang, Ts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7, p. 570.

(21) Robert Oxnam: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37.

(22)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 同(18),第5页。

(24) 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Vol. XXII. No. 10, p. 934.

(25) Ibid.

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和平幻想

——司徒雷登与中日和谈

何 迪

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生下来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事业是创办燕京大学,并由此成为在中国有根底、受尊重的外国人。许多后人替他惋惜:如果他在战后不与马歇尔一起调停国共内战,如果他不在中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就任美国驻华大使,那么他仍然能保持教育家的美名而不至于成为失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遭到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辛辣的讽刺与批判。惋惜代替不了现实,事实上,自燕京大学诞生于中国大地那天起,在中国发生的每一场重大政治风暴都曾引起了未名湖水的波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会也无法置身事外,他的背景、他的能力以至他的助手——傅泾波都推动着他卷入中国政治的漩涡中去。在他参与的许多公开或幕后的政治活动中,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四度在中日之间穿针引线,希望达成和议便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它不仅反映出司徒雷登的政治观点与活动风格,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美、蒋、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各自的打算和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20年代起,为了燕京大学的发展,司徒雷登奔走于中美大陆,周旋于权势之间。他与蒋介石夫妇保持着私人友谊,聘请了孔祥熙为燕京中国董事会董事长,和宋子文等英、美派过从甚密;蒋介石对他颇为信任,曾托付他和傅泾波前往劝说张学良、韩复榘、宋哲元等人归顺,他“结识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1)为了筹款,他10次返美,成为美国在知名度颇高的中国通,连罗斯福总统都在就任100天内的繁忙日子里拨冗会见他,了解中日冲突的情况和征询援助中国的办法。(2)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燕京大学在美国旗帜的保护下继续在北平开办。为了燕京的生存,他不仅与日本占领军的头面人物保持接触,与华北伪政权首领王克敏等时时交换意见,而且还指派了燕大毕业生萧正谊为联络员,奔走于燕大与日占领军司令部、以至中日之间,同时还通过在燕大就学的伪政权头头的子女去与他们的父母进行联系,这些渠道成为司徒雷登消息的主要来源。日本对司徒雷登也颇为重视,资深议员田川经常出入他的寓所,甚至与他商量在华北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人选,他暗示了燕大学生王遵侗的父亲王

克敏较为适宜,后来王克敏就任了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很可能是得力于司徒雷登的举荐。(3)

司徒雷登的身份与地位引起日本的注意,主管日本诱降活动的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这样形容他:“从大学时代起,司徒雷登就和罗斯福总统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在中国,他深得蒋介石夫妇的特殊信任”。“在中国事变初期,司徒雷登校长因与当时的美、中两国领导人有着上述的特殊关系,就加以利用。作为第三国人,他在日中两军势力范围内的北平、重庆任何地区都有自由行动的特权。因此,他可以将日军对重庆政策的真相转告给蒋介石,又可将蒋介石对日方针的内情密告给华北行政委员会王克敏委员长,借以表示他对日中两国实现和平的一番热情。”(4)

日本想利用司徒雷登,而司徒雷登本人对实现中日和谈也抱有热情。首先,他认为中日和解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位美国平民主动承担起这项义务,愿为保护美国的远东利益贡献个人的绵薄之力。他在给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燕京美国托事部的许多信件中一再表达他的愿望:“我最想见到的莫过于中日之间在共同利益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能实现自主的友好合作,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同时也代表了美国的态度,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中美日三国间友好往来与自由贸易,自然而然地形成而非条约迫使的集团,以抵制苏俄在东亚的影响和保证太平洋区域的稳定”。(5)他表示“基于对美国意图的深入理解,我愿担当帮助中日双方领导达成符合各自利益解决方案的谦卑的传信人”。(6)

其次,他认为实现和平是一位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承认介入调停对他并非易事,因为,“人们本能的希望是让那些在中国杀戮无辜的日军也应遭到耻辱或大败的报应”。但是,他认为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方式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而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将会使和平获得更可靠的保证和使中日建立更友善的关系,这符合完美的国际主义或基督教的理想”。

(7)

第三,司徒雷登愿意介入调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燕京大学的事业,使它能够在敌占区生存而又不丧失它为中国服务的性质。他认为在日占区继续办学,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燕京支持者、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日本占领军三者的关系。除了向日本人声称燕大是美国人的校产,不得侵犯,他还不断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鲜明的态度来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对日本占领军,除了与他们的头面人物拉关系外,他还想利用介入和谈来显示他的存在价值,他多次写信给燕京美国托事部,指出只要日本人还想利用他进行调停,他们便不会关闭燕大。而面对中国人民,以及燕大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抗日民族热情,他认为有必要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忠诚。(8)他利用每年一次参加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议的机会,与傅泾波一道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和重庆,“以向一切有关人士表示,燕京虽然在日本占领下继续开办,但它仍然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9)同时他利用这种机会来沟通中日和谈,他认为燕京大学的命运与恢复中国在华北的主权直接相联。任何能使日本放弃征服目的的行动都有助于确保燕京的生存。(10)

司徒雷登在他介入调停伊始,大约没有想到所肩负的使命的严肃性与艰巨性,也不会想到在这出戏中,他非但无法进行导演,而是被人引导着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1938年3月,司徒雷登首次介入中日调停活动。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声明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使公开调停中日战争的活动陷入僵局。但是,位于第一线的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华北日军负责人多田深知这种政策将使日本陷入对华长期作战的泥沼之中,在反对无效后,他便转而接触司徒雷登,期望这位美国人能帮助私下里推进日军与蒋介石政府的和谈活动。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从王克敏处得知司徒雷登愿意介入调停,于是在1938年2月,多田授意王克敏,请司徒雷登前往武汉与蒋介石探讨和谈事宜。(11)和谈条件是:(1)消灭反日活动;(2)华北自治;(3)中日经济合作;(4)中国赔款。如果蒋介石同意以上条件,日本就以蒋介石政府为和谈对象,并可接受蒋介石继续领导中国。(12)

2月26日,司徒雷登由北平启程,经上海前往武汉。行前,他向美国驻北平领馆汇报了此行目的,出乎他的意料,美国政府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收到北平领馆报告,28日即复电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指示他明确转告司徒,他的行动只能代表他个人而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让司徒向他将要接触的中国政府官员及他曾接触过的王克敏、日军将领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决不协助司徒的调停活动。由于司徒已离开北平,电报追至上海、武汉,司徒未进入武汉之前,在上海便得知了电报内容。同时,赫尔让使馆通报国民政府外交部,转告那些司徒将要会见的官员,司徒的活动不代表美国官方意见,美国政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13)

和平热情遭泼冷水,司徒雷登不得不向使领馆人员表示,他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他的作为完全是个人的行动。他辩解道,他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开会、办燕京校务之便,去武汉了解一下和平的前景。(14)或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拦,或是由于日本的条件过于苛刻,司徒雷登没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和谈条件。事后,他向詹森大使表示,现在他相信了中日和谈是不可能的。(15)

尽管司徒雷登的首次和平使命未获任何成果,反而遭到赫尔国务卿及美国驻华官员们令人尴尬的对待,但他并未就此灰心。大约是受了“保卫大武汉”气氛的感染,或许是由于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激励,他回到北平后,便接连给罗斯福、赫尔、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以至北美的基督教徒们写信,一方面敦促美国破除孤立主义情绪,推动政府修改“中立法案”,援助中国,对日禁运,用此制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与扩张。他向总统慷慨陈词:不要因顾及与日本冲突和美国在华人员与财产的损失而不敢对日采取更严厉的禁运政策。(16)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感到美国介入中日调停大有可为,特别在10月他与一位日本自由派教授一席谈后,更坚定了这种看法。他分别写信给罗斯福和赫尔,建议总统运用他的影响力作为中间人,或是召集在华享有利益国家会议,调解中日冲突。大概对赫尔处置他介入调停活动的措施记忆犹新,在给赫尔信件正本中,司徒雷登删去了这项建议。(17)10月底,司徒雷登与王克敏再次探讨了中日和平的可能性。他问王克敏,请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的时机是否成熟,王答曰,在德、意进行此类活动之后,如果美国能出面,则将给日本面子,十分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随后,司徒雷登不无激情地写道:最近英、法、德、意在欧洲达成的以捷克为代价的协议给他们以启迪,用同样的办法,牺牲中国以换取它们与日本保持贸易的好处。在这种时刻,如果美国出面,按九国公约的原则进行调停,以维护中国主权、行政及领土的完整与尊严,这不但有利于解决中日冲突,而且可以证明美国是中国的最不谋私利的真正的朋友。(18)

1938年10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认识到速战速决已无可能,于是制订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加强了诱降和扶植亲日傀儡政权的活动。1938年底,他们策划了汪精卫叛逃,接着一场组织汪伪政权的闹剧在紧锣密鼓中进行。1939年2月兴亚院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带着东京的方案归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准备组织由汪精卫为核心的新国民党政府,吸收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参加;日本驻华北部队在清除了游击武装之后将留下一部分维持该地的经济合作“秩序”,中部与南部的占领军将逐渐撤离;这项方案将争取英美的支持。喜多诚一让王克敏将此转告给司徒雷登,大约希望他能将这些条件传达给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司徒一方面给赫尔写信转达了这些信息,但同时他也表示,如果美国支持了日本的建议,中国为了维护独立、进行抗战所付出的牺牲都将白白浪费,他反对这个方案。(19)日本的方案进展并不顺利,对依靠汪还是通过蒋来解决中国事变,日军内部存有分歧。直接处理中国事务的兴亚院对支持汪精卫组阁解决中国问题方案持否定态度。喜多诚一本人和多田等都是强烈的反对派,他们一方面对汪精卫组阁工作消极怠工,另一方面则积极开展对蒋诱和工作,(20)司徒雷登自然又成了他们的理想人选。司徒于1939年7月中旬离北平取道香港前往重庆,开始了他第二次和平使命。但是,司徒雷登从蒋介石那里得

到的回答是：（1）日本必须将其部队、各伪组织和企业单位撤往关外；（2）在任何协议中必须排除汪精卫；（3）如日方和王克敏确有和谈诚意，蒋将考虑派张群去与他们会晤。司徒将口信捎给了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杉山元、喜多诚一和王克敏。汪精卫很快得知这些秘密活动，他指出蒋想在日汪之间制造分裂，要求日方马上停止此类活动。为了支持汪精卫组阁，日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口末一郎专程来华。他训斥了喜多诚一，否定了与重庆直接谈判的策略，认为这是种愚蠢的作法：“司徒是一个老骗子，他捎来的口信旨在破坏日本阿部内阁建立汪精卫政权的决定，是有违武士道精神的”。〔21〕但是，此时司徒雷登仍真诚地相信，“我得到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蒋与日本军界实力人物间进行调停，此事一定会引起总统与国务卿的兴趣”，“我个人印象是日本急于想解决中国事变，而罗斯福总统是使日本人明白在公平条款上达成协议的最佳人选”。〔22〕10月，司徒雷登认为，由于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无法获得公众支持，短期内摧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伤亡增加、财政困难、士气低落，加之不利的国际形势，迫使日本不能不在继续进行武力征服或按蒋介石的条款进行和谈的政策中进行选择。现在是中日双方接触的大好时机，美国应该担负起调解的责任。他向美国驻北平领事做此建议，领事反应颇为消极，认为，美国的注意力都被刚刚爆发的欧战所吸引，怕没有精力顾及亚洲的问题。司徒愤愤不平地质问，美国重欧轻亚情有可原，但是，难道就没有人关心一下亚洲吗？美国能在中日间起斡旋作用，让日本体面地撤出，美国的介入将大大有助于日本内部的主和派力量的斗争。司徒甚至建议了双方的条件：日在蒋汪之间承认蒋的合法性，给蒋以平等地位并撤军关外；蒋则停止反日活动，与日进行经济合作；日承认九国公约，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尊重中国政府在关内主权，美国将恢复前不久中断的美日商约。〔23〕

1939年秋，日本政府确定了支持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的政策，但是，持不同意见的兴亚院、驻华占领军与情报部门仍想趁汪伪政府成立前与蒋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大力加强了与重庆方面的沟通工作。据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木武夫回忆，日本与重庆方面进行沟通的渠道有通过宋子良与重庆谈判的桐工作计划、孔祥熙路线、艾豪路线、钱永铭路线、司徒雷登路线。〔24〕汪精卫集团面临此种压力，也积极活动。1940年1月16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呼吁和谈，并让周佛海通过关系请司徒雷登赴沪，商谈牵线使命。王克敏不甘落后，他运用和司徒的老关系，也插上了一手。一时间，日本人、汪精卫集团、王克敏都找上了司徒雷登。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意图，司徒派萧正谊前往日本探听虚实。〔25〕

经过一番调查，司徒雷登认为，中日和谈的可能是存在的，日本的“明智派”急于想利用和谈结束中日战争，但是目前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当时，日本内部就如何利用汪精卫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派系斗争日益激化，以参谋总长坂垣征四郎为首的一批“明智派”认为，仅仅依靠汪精卫组成新政府来实现中日和平的政策是十分糊涂的，为了不违背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汪精卫的既定方针，他们期望通过与重庆方面直接和谈，劝说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以共同组织政府的折中方案解决中日争端。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难以接受此种方案，他本人并让萧正谊向日本方面表示，只有日本同意按蒋介石的条件进行和谈，他才愿意充当“非官方中间人”的角色。〔26〕按照司徒雷登的理解，重庆方面的和平条件是：（1）日本应以蒋介石为对手；（2）应以近卫三原则（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和平基本条件；（3）日本应以撤军关外为原则，为防共需要，华北、蒙疆驻军可暂时保留；（4）调整经济合作范围，成立合作委员会；（5）文化提携，改革教科书；（6）与英美维持友好关系；（7）东北问题留待实现和平后再作处理。司徒雷登还向日驻北平占领军首领建议，由重庆组织和平委员会，让王克敏担任委员长，具体进行蒋、汪、日之间的调解工作。司徒的建议引起日方高度重视。2月26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喜多诚一专程返日向中央本部作了汇报。〔27〕

但是，他们又担心这是司徒雷登有意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的花招，于是，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授意让周佛海出面，于2月24日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日本的条件：（1）如蒋有诚意，

根本改变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内的共产分子，与汪精卫合作，汪可以接受；（2）蒋对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最好与汪精卫直接谈，汪可向日方转达，希望重庆派密使来谈。周佛海还希望司徒雷登劝解蒋介石“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28）

3月初，司徒雷登到达重庆，先后会见了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等一系列国民党军政要员，见了美、英大使，甚至由英国大使安排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他得到的总印象是，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寻求和平、放弃抗日的企图，对于汪精卫的和平条款反应冷淡。蒋介石向司徒雷登表示，除非美国同意介入中日调停，否则他不考虑任何中日间的和平谈判。蒋介石强调，这是由于他对美国的友谊和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道义原则充分信任，同时，也是由于对罗斯福总统高度信赖。只有美国作中间人，才能保证日本实践它的允诺。蒋还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国有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去，三年、五年在所不计，但是，目前的财政困难正成为影响抗日的严重问题，所以，进一步的外国贷款成为抑制通货膨胀，鼓舞抗日信心的重要措施。（29）

4月5日、10日，司徒雷登分别写信给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和罗斯福总统，汇报了他重庆之行的结果。首先，他对美国介入调停有新的看法，他第一次表示如果美国作为调停人介入，那么美国政府与美国总统将要承担责任，此事暂不易实行；目前，日本的所作所为离和谈要求甚远，它并不想卷入美国为中间人的谈判，而是想通过和重庆的直接谈判，获取尽可能多的好处，所以，中国宁愿战斗下去，直至它的独立自由获得真正保证时才能谈及和平；而日本只有意识到靠傀儡政权不能结束战争，日本人民意识到自身的危险而群起反对军事专制集团时，日本政府才会被迫求助美国出面调解。只有当中日两国都要求美国介入时，美国总统才应考虑介入调停。（30）其次，司徒雷登向罗斯福总统呼吁，尽快采取措施在财政上帮助中国，以免中国财政崩溃。这么做所冒风险甚小，而利益，甚至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巨大的。（31）

4月底，司徒雷登到达上海，分别向周佛海和日本议员田川转达了蒋介石对和谈的意见。在未达到上海之前，司徒曾两次捎信给周佛海，表示急盼与周见面，使得周佛海感到“岂蒋先生有和意欤？果尔，是天赐中国也”。但是，在28日与司徒的二小时会谈后，他大失所望，感到“蒋对汪，仍不谅解”，“蒋今仍逞意气，不顾大局，实为可叹”。尽管他得知“美国出面调停”，“蒋或可接受”，并与司徒约定共同为此努力，但“恐前途仍属悲观”。（32）可是，田川所得到的信息则有很大出入，他向日本本部报告，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会谈的要点是：近卫关于收拾时局的声明也是蒋之所望，但是日本并未能按此实行，这表明日本要压服中国，没有承认中国独立，尊重中国主权之意向；蒋并未说过日本未撤军期间不响应和平，未撤军期间虽不能在华实现和平，但并不等于不进行和平交涉，蒋希望和谈；蒋对蒙疆、华北不抱希望。司徒雷登建议，日本应暂时克制已经获胜的感情，双方只有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共同为东亚谋求永久和平亲善，和谈方可成立。（33）可能是司徒雷登根据不同的对象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也可能是听者各取所需，日汪间对此次司徒雷登重庆之行获得了相反的印象，日本方面甚至乐观地认为“司徒雷登工作是有希望的”。（34）事实上，3月30日，司徒雷登正在重庆探求和谈可能之际，汪精卫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无异于堵死了汪蒋、中日和谈的大门。

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决定了南进政策，9日，进占印度支那，同月下旬，与德、意结成轴心同盟，日本的扩张态势使得美日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中国成了美日进一步角逐的场所。日本为了实现南下政策，急于解决中国问题，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加紧军事压力，切断美英在中国南部的供应线，通过谈判迫使美英减少对华援助，同时，与重庆沟通，谋求和谈。（35）而美国则为了遏制日本南下，扩大对日禁运，加强援华抗战，反对蒋汪、中日妥协，特别是在11月30日日本宣布承认汪伪政权并与之订立条约之际，

美国宣布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以示对蒋政权的支持。司徒雷登在11月26日关于美日关系的备忘录中分析了这种形势。他观察到，由于中国战争久拖不解，南下受阻，美英的态度日趋强硬，使得日本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日本的亲英美派更加协调一致，谋求组阁，以便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和改善与英、美的关系。他甚至注意到，11月13日的日本御前会议已决定派外务省东亚司司长前往香港，寻求与重庆方面接触。他认为，这表示日本可能改变了“不以蒋为对手和谈”的政策。(36)

为了开辟与重庆沟通的渠道，日本驻华使馆和驻军开始动员司徒雷登再次承担和平使命。12月上旬，日本外务省东亚司第一课课长田后专程前往北平游说司徒，他告诉司徒，外相松冈洋佑已获批准谋求与蒋介石和谈，但是，蒋介石拒绝派代表前往香港与日东亚司司长会谈。司徒雷登为蒋介石辩解，他回顾了蒋在3月会面时对此作的解释：(1)日方以往的表现，使他无法信任日本谈判代表；(2)他无法确认任何一位代表具有代表日本国家政策的权威性。司徒雷登进而介绍了蒋介石的和谈条件，并批评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给中日和谈造成了困难。他指出，解决中国问题，日本有两种政策选择：一是靠武力征服，二是靠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建立友好关系，合法地获取在华利益。而目前，日本想将二者结合，获得两方面好处，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日本采取后一种政策，日本便能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美国的基本利益是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如果中日能实现自愿的合作，那么，不必担忧其他国家的侵略。随后，司徒雷登列了十个问题，让田后转交日本当局，他指出，弄清这些问题会有助于日本对蒋和谈。(37)

1941年1月中旬，日大本营参谋部总长坂垣征四郎邀请司徒雷登前往南京会商中日和谈事宜。坂垣表示，他愿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国统区内与蒋介石或他的代表进行私人会晤。(38)开始时，司徒雷登感到犹豫，怕又像前三次一样徒劳无功。他向日本驻北平总领事表示，和平的障碍来自东京，与其靠和谈劝说蒋介石改变立场，莫若东京下决心放弃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39)经再三考虑，司徒认为通过坂垣这样掌有实权的人物或许能解决一些实质问题，于是，他同意前往上海会晤坂垣，但拒绝到南京与汪精卫见面。(40)

2月13日，坂垣和司徒在上海会晤。坂垣透露：在最近召开的南京军事会议上，有18位高级日军将领希望以承认蒋介石政府，撤退关内所有日军，并保证中国国家独立为条件，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坂垣已将他们的建议送回日本，争取批准；同时，他表示愿意接受美国调解。南京会议的参加者们相信，一个由中、日、美三方参加的会议将可有效地解决中日冲突和战后的经济合作问题。中日双方都愿获得体面的和平，日本期望罗斯福总统能够找到实现这种体面和平的途径。司徒认为，日本占领军头面人物这么急于谋求他的帮助，说明各级将领们几乎达成一致意见，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但他提醒坂垣，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影响重庆或华盛顿的看法，而在于如何取得东京的同意。坂垣希望司徒前往日本替他们说项，司徒拒绝了这项要求，他告诉坂垣，只有蒋介石要求，他才愿担当这种使命。但是，他私下向美国驻沪领事说，他对坂垣的谈话印象深刻，希望能就坂垣提供的可能性进行仔细的研究。(41)

2月中下旬，在沪停留期间，司徒雷登已预感到调解中日和平难获成功。23日，司徒的美国友人传来重庆方面消息，蒋无意和谈，他转告周佛海，美国进行调解，恐难以实现，并让周将此信息转给日本占领军。正在此刻，司徒接到美国政府训令，结束燕京校务，准备撤退。(42)于是，他匆忙返回北平去筹划燕京在未来美日冲突情况下的出路。

尽管他人回到了北平，但心仍挂念着未能展开的中日和谈。他受到美国采取的日益强硬的的对日政策和积极援华的行动的鼓舞，认为这有助于迫使日本最高当局考虑放弃武力征服代之以和平谈判，而坂垣的行动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司徒雷登回忆到，1940年3月，蒋介石希望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而当时，这并不能为日本最高当局接受；现在，坂垣征四郎等驻华将领提出了和谈建议，尽管很难确切知晓这是否代表了日本最高当局的意愿，(43)

但是，他殷切希望，日本最终能接受美国总统出面，组织中、日、美三国会议，这三个国家将构成太平洋地区联合或协作体的核心，为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奠定基础。从全局看，这将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为解决当前国际混乱与争端树立榜样；对日本而言，则为其提供了从当前困境中解脱出来的途径，实现体面的和平，同时，又能满足它对原料和贸易市场的需求。司徒写道，他无法抑制不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政策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极符合基督教精神和富有远见的，它将必然受到中日两国明智的领导人以及遭受战争苦难的民众们的热烈拥护。(44) 4月，司徒前往重庆参加教育文化基金会议，行前，他与日本驻北平总领事土田丰交换了意见，日本领事再次表示，希望美国能介入中日调停，司徒回答，依他个人看法，必须得到中日双方的邀请，美国才愿意充当中间人或参加中、日、美三国会议；只有日军全部撤出关外，蒋才愿意讨论和平。随后，司徒将与日本领事的谈话报告给美国驻北平领事，并认定，他是受东京的指派提出以上要求的。(45)

4月中旬，司徒雷登经上海、香港抵达重庆，他三次会晤蒋介石，并与孔祥熙、何应钦等进行了长谈。蒋介石对日本和谈条件不感兴趣，外界传言 罍谟肴 谋和的孔、何二人也矢口否认，司徒认为，他在重庆感觉不到对日求和的趋向。(46) 事实上，蒋介石一直盼望着美日冲突，这样，美国便不得不与中国拴在一起与日作战，蒋便可节省自己的力量而依赖美国去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早在1939年2月日军进占海南岛之时，蒋就声称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47) 1940年9月，德、意、日轴心同盟成立，蒋又预言，太平洋海战必将爆发，美国一定会直接参战。(48) 现在，美日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冲突已指日可待，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自然不会有和谈。当年，他向司徒表示：如美国总统介入，中国愿与日本和谈，无非是想利用和谈向美、英强调，要是他们不对中国进行大量援助，那就必然要冒迫使中日和解的风险；而这种和解将使日本得以任意南侵，从而危及西方的利益。(49) 此时，蒋却向司徒强调，须待世界战争总结束以后，方能解决中日问题。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50) 4月28日，司徒在给燕京美国托事部的信中描述他在重庆得到的印象：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对于世界局势有深切的了解并时刻注意着时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知道，在爱好自由的人士与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者作全球性的斗争时，美、英、中三国实际上已变成了同盟者。(51) 5月上旬，司徒雷登回到上海，把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不成功使命的结果转告给日本占领军当局和汪伪政权。(52)

尽管四次调停使命未获成功，尽管太平洋上的气氛随着日本的刻意南进而变得剑拔弩张，但是，司徒雷登坚持认为，由美国介入的中日和谈仍是解决远东危机的有希望的方案。直至1941年7月和8月，他还通过美国驻北平领馆和燕京美国托事部向美国政府建议介入调停。他确信，美日之间正在进行的会谈表明，日本已放弃了早先所宣称的不与蒋或任何第三国进行谈判的政策。(53) 最近日本有影响的人物已准备开始与重庆方面和谈，甚至可以接受中国方面的条件，日方唯一需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愿意与会的保证，而中国方面的看法是只要美国更有效地援华，那么重庆方面多则二三年，少则明年春、夏，便可迫使日本按中国的条件坐到谈判桌上来。(54) 他唯一担心的是在日美华盛顿会谈中，美国作出与中国和谈条件相违的妥协，会谈所造成的和平气氛不利于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放弃扩张野心，与中国谈判实现真正的和平。(55) 美驻北平领事巴特瑞克(Butrick)为之所动，向国务卿建议，说不定美国介入中日和谈是保护它远东利益的最佳方案。(5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作为敌国公民被日军囚禁起来，他们认为司徒是有价值的人质，很可能在哪一天还能派上用场，司徒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软禁生涯，和平的使者成了“和平”的囚徒。1945年5月，德国战败，日本政府改组，新成立的铃木内阁急于想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为了和重庆沟通，铃木内阁想到了司徒雷登，于是派河相达夫为密使前往北平，请司徒雷登出面斡旋。由于日本华北占领军反对停战，从中阻挠，几经周折，河相才于8月1日与司徒见面，这次，司徒

雷登干脆地拒绝了日方的请求，并劝告日本政府应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57）

司徒雷登介入中日调停的始末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他参与政治活动的风格与特点。他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而是一位在华有巨大事业，与中国利益相连、情感相通美国人。当中美共同抵抗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时，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在华利益，他所举办的美国在华事业的利益和他所理解的中国利益在他心中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利益的一致性构成了他行动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使中国这块亚洲大陆成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最可靠的伙伴，不仅在政治上协调一致，而且在价值观念上同步合拍，这是美国在华利益之根本，也是他传教、办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必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防止苏俄共产主义的扩张。日本是中国生存和美国在华利益的直接、现实的威胁，而苏俄则是未来染指中国、危及美国在华利益的隐患。它们的入侵直接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它们推行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又和美国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在司徒看来，维护中国主权独立完整，成为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最好方式。所以，他在调停中始终坚持了“以蒋为对手，日军撤出关外，尊重中国领土与行政主权”为和谈基本条件；他反对欧美对日妥协，出卖中国，他谴责英国对日妥协，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为愚蠢的政策。（58）他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在日美谈判中上当，出卖中国去换取短暂的和平。（59）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司徒雷登认为，采取援华抗日和介入和谈的两面政策，既可遏制日本南下，实现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又可避免美国直接卷入战争，美国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如果中、美、日三国真能以和平的方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那么，便能有效地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这无疑是一幅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图景。难怪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巴特瑞克在向国务卿推荐司徒的建议时说，他的想法并不新鲜，我之所以转呈他的建议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位在华利益遭到威胁的美国人的观点，它表达了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个人利益如何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意見。（60）

司徒雷登不仅仅是一位具有中国背景有影响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基督徒的理想主义、传教士的使命感和对自己影响力的自信心形成了他介入调停活动时与众不同的色彩。他以基督教非暴力观念看待战争，认为日本用战争暴力去攫取它的经济需要，这种企图是邪恶的，手段是不仁不义的，因此注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暴力手段制服日本，这种一报还一报的作法无法取得永久的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最佳途径是双方通过合乎理性的协商，在满足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合作、和平共处。（61）在非暴力原则的基础上，司徒雷登一再勾画了他的世界政府与东亚新秩序的蓝图。他声称，他从来都是以一位传教士和教育家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来对待当今世界的。（62）世界与东亚新秩序的理想方案是，以政治力量促使达成一项国际协议，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统一政府，为此，各国都必须放弃它们的部分权力，变成国际主义者，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的中、美、日应该首先携起手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建立起东亚新秩序，从而为解决欧洲的战乱提供可遵循的模式。（63）他认为这种方案是可行的，他过分夸大了日本内部主和派的力量，甚至根据自己的逻辑将他们理性化，他一再指出美国的强硬政策有助于遏制日本好战派的野心，而美国介入中日和谈的作法则有效地支持了日本主和派的斗争并为他们提供了出路。（64）他相信人性的因素，认为非但日本的主和派人性尚未泯灭，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连汪精卫、王克敏一类人也并非真正的叛徒，他们只不过是失败主义、机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妥协与合作达到中日间的和平。（65）

非暴力的原则、东亚新秩序的幻想和人性因素的信念，模糊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界限，夸大了和平的可能，这不仅仅使司徒雷登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产生误断，而且也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真实的位置与能力的限度，以及在这场国际性的角逐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以至于用良好的主观愿望来替代日益险恶的现实。他在给燕京托事部的信中承认，应邀介入中日和谈活动，

这无异于将自己置于某种危险之中，一方面会被认为好管闲事，干扰了外交事务；另一方面则会受到中日双方狂热的极端分子的攻击。但是，他认为只要对沟通、解释中日双方的意图略有帮助，这种冒险便是完全值得的。(66) 尽管他的调停活动一开始便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是，传教士的使命感激励着他仍按照自己对于事态发展的理解，不受政府的纪律束缚，我行我素。这种单干户的活动风格的确不合乎美国的外交规范，但是，在司徒雷登今后的政治生涯中却不断地显现。

作为调停对象的日、蒋、汪三方十分重视司徒雷登的美国背景，希望通过他向美国政府传达信息。可是他只是一介平民，既非调停特使，又无与美国政府要员的特殊关系，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代表美国政府的意愿。同时，他往来北平、上海、重庆之间往往负有参加教育会议、办理燕京校务的责任，这使他不可能迅速转达各方面的信息。最后，连日本人都发现，司徒雷登这条线对于一气呵成推动和平工作是不适当的。(67)

事实上，美、日、蒋、汪之间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是中日和谈难获成功的根本原因，司徒雷登的个人努力无法扭转客观趋势的发展。就日方而言，独霸中国是它的既定方针，具体政策的调整不能根本违背这一方针，日本的和谈计划前三次都是由华北占领军司令部提出的，第四次则由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领导。他们的行动缺乏与日本政府最高层领导的协调，有时甚至和日本的总政策相矛盾，如司徒的第一次调停活动直接违背了日本近卫内阁刚刚宣布的不以蒋为谈判对手的方针；第二、三次调停又与日本政府扶植汪精卫政府的政策相冲突，汪精卫等人拆台自不待言；第四次调停也未获得日最高当局的肯定。司徒雷登也看出了其中破绽，他抱怨：日本方面没有权威的领导，缺乏贯彻始终的工作，这只能使混乱与踌躇不决的局面日益严重，对此又没有任何人或任何集团敢于承担责任，去寻找一个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案。(68)

就中方而言，蒋介石谋求的妥协是以不丧失他的统治为前提的，他不甘心仅仅作一个儿皇帝。抗战初期，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而后，他难以接受汪精卫作为合作的对手；当美日矛盾激化，美国介入太平洋战争的趋势明朗后，蒋介石苦撑待变、拖美下水的政策即将奏效的时刻，他更不会轻易和谈。把美国卷入中国事务，与美结盟是蒋介石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司徒雷登的调停活动成为送上门的向美国传递信息、影响美国舆论的渠道。或利用和谈作为敲诈手段，迫使美国增加援助；或提出美介入调停建议，把美国直接卷入中日争端。从司徒雷登每次重庆之行后写往美国的报告看，蒋介石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渠道。

而美国方面，在中日战争初期，坚守中立政策，不愿介入中日和谈；随着日本南下企图明显化，美国则希望用援华抗日的办法，遏制日本南下，为美国争取备战的时间。美国的政策决不希望蒋介石实行妥协，进行中日和谈。司徒雷登的调停活动自然受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他多次呼吁美国介入调停，也未能收到罗斯福总统的任何积极反应。美国政府的消极态度不仅剥夺了司徒雷登调停活动的权威性，而且使他的个人信誉受到损伤。在司徒雷登初次介入调停活动时，赫尔国务卿便颇有先见之明地预言：历史经验证明，国家领导人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的协调，事非同小可，个人以平民身份介入其中，必将承担重大责任，其结果往往是弊多利少。(69) 赫尔不幸言中，司徒雷登的四次调停活动空耗了精力与时光。

注释：

(1)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2) 1938. 7. 15. Stuar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Record Group, No. 11, J. Leighton Stuart File, Record of Yenching Univ. (J. L. S-RYU),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Library of the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3) 1986. 4. 3. 访问傅泾波先生记录，美国华盛顿。1938. 6. 6. Stuart to B. A. Garside.

J. L. S. -RYU.

- (4)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 (5) 1939.10.14,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 L. S. -RYU.
- (6) 1939.8.17, Stuart to B. A. Garside. J. L. S. -RYU.
- (7) 同(5)。
- (8) 1938.6.6, Stuart to B. A. Garside. J. L. S. -RYU.
- (9) 同(1)，第123页。
- (10) 1938.7.29,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 L. S. -RYU.
- (1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0，406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71页。
-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38, II*, pp.109-110.
- (13) 同(12)，第111-113, 114-115, 117, 119, 124页。
- (14) *FRUS.*, III, p.117.
- (15) 同(14)，第124页。
- (16) 1938.7.15, Stuar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10,15 to Hall,10,17,11,14, Stuart to The Trustees. J. L. S. -RYU.
- (17) 1938.10.15, Stuar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to Hall. J. L. S. -RYU.
- (18) 1938.10.29, Stuart to The Trustees. J. L. S. -RYU.
- (19) 1939.2.22, Stuart to Cordell Hall. J. L. S. -RYU.
- (20) 约翰·博伊尔：《通敌内幕》(下)，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34，357页。
- (21) 同上，第358页，邵玉铭博士论文。
- (22) 同(6)。
- (23) 同(5)。
- (24) 同(4)。
- (25) 1940.2.12,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 L. S. -RYU.
- (26) 1940.1.18, 1940.2.12. 1940.2.14,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 L. S. -RYU.
- (27) 《侵华资料长编》(上)，1940年2月14日，第528—529页。Stuart's Memorandum o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merican Concern. J. L. S. -RYU.
- (28) 蔡德全编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252—253页。
- (29) 1940.4.5, Stuart to The Trustees, 1940.4.10. Stuart to The President Roosevelt, *FRUS*, 1940, IV, pp.315-316.
- (30) *Ibid.*
- (31) 同(14)，IV，第316页。
- (32) 同(28)，第62，77，78—79页。
- (33) 同(11)，第528—529页。
- (34) 同(11)，第529页。
- (35) 同(11)，第586—588页。
- (36) 1940.11.20, Stuart's Memorandum o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 J. L. S. -RYU.
- (37) 同(14)，IV，第466—467页。
- (38) 同(14)，1941，V，第467页。
- (39) 同(14)，V，第484页。

- (40) 同 (3)。
- (41) 同 (14), 1941, I V, 第36—37页。
- (42) 同 (28), 第467、469页。
- (43) 1941.4.2,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44) Ibid.
- (45) 同 (14), 1941, I V, 第117—118页。
- (46) 1941.4.2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47) 名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 中央日报社, 1978年, 第4页。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 第73-74页。
- (49) 同 (20), 第417页。
- (50) 同 (28), 第503页。
- (51) 1941.4.2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52) 同 (28), 第503页。
- (53) 1941.9.15, Stuart's Momerandum on The Real Danger on the Pacific J.L.S.-RYU.
- (54) 同 (14), 1941, I V, 第323—324页。
- (55) 同 (14), 1941, I V, 第390页。Stuart's Memorandum. J.L.S.-RYU.
- (56) 同 (14), 1941, I V, 第324页。
- (57) 同 (4), 第206—208页。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第142—144页。
- (58) 1939.7.30,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59) 同 (14), 1941, I V, 第564—565页。
- (60) 同 (14), 1941, I V, 第390页。
- (61) 1940.2.14, Memorandum o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merican Concern. J.L.S.-RYU. 1939.10.14, Stuart to The Trustees. J.L.S.-RYU.
- (62) 1941.2.1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63) 1941.9.11, "The Meeting to U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of Contemporay World Events". J.L.S.-RYU.
- (64) 1941.2.1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65) 1938.9.1,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66) 1941.2.1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67) 同 (4), 第172页。
- (68) 1941.4.2,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 (69) 同 (14), 1938, I I I, 第111页。

1948-1985年美国生产率增长试析

沈 侠

长期以来, 美国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一直是其经济实力的基础。然而, 70年代以来,

美国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渐开始动摇,日本、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水平正在逐步向美国逼近,在有些部门,一些国家的生产率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的探讨。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各个历史时期美国的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然后剖析战后(1948—1981年)美国私人部门生产率增长的特点。第二部分着重分析1974—1975年危机后美国生产率增长停滞不前的原因,并且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第三部分简要地评价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对美国生产率增长前景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美国生产率增长概要

1. 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历史趋势

表1列出了从1800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基本数据。(1)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将近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私人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是相当高的。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年平均增长率在4.0%以上。1919—198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在3.0%以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在1973—1981年期间出现了转变,从前一时期的3.7%下降到2.1%。1973—1981年的八年相对于1800—1973年100多年来说是相当短的,所以,还不能说1973—1981年间增长率的下降是一种长期的趋势。

由于持续大量的移民入境和较高的出生率,美国人口的增长一直很快,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19世纪,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是由人口增长带来的。美国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到20世纪开始下降,这种趋势部分是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另一部分是周工时减少以及受教育时间增加的结果。1973—1981年间,劳动投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主要归因于妇女就业率的大幅度提高——1973—1981年间妇女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3.6%,远高于同期的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与20世纪劳动投入的增长率的下降趋势相对照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加速。19世纪劳动投入年平均增长率在3.3%左右,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只有0.8%左右。但在20世纪前80年中,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而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上升到2.3%左右。

资本投入也是从19世纪的高增长率过渡到20世纪的2.5%左右的稳定值。资本的生产效率在1973年以前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但1973年以后的八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平均5%的负增长,几乎完全抵消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表1 美国私人部门经济增长及其来源, 1800—1981年(%)

	1800-1855	1855-1890	1890-1919	1919-1948	1948-1973	1973-1981
产出	4.2	4.0	3.9	3.0	3.7	2.1
人口	3.1	2.5	1.8	1.2	1.5	0.8
人均实际产出	1.1	1.5	2.1	1.8	2.2	1.3
总和要素投入	3.9	3.7	2.2	0.8	1.5	2.1
劳动投入	3.7	3.0	1.8	0.6	0.7	1.4
资本投入	4.3	4.6	3.1	1.2	2.6	2.7
要素生产率	0.3	0.3	1.7	2.2	2.2	0.0
劳动	0.5	1.0	2.0	2.4	3.0	0.7
资本	-0.1	-0.6	0.7	1.8	1.1	-5.0

资料来源:

第1-4栏引自《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I卷条目“生产率”；第5-6栏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至当代》和《美国统计摘要》（1975年，1980年，1983年），以及美国商务部和劳工部未出版的资料。

现在来看总和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变化情况，从1800年到1973年，总和要素生产率是加速增长的（见表1第7行）。在整个19世纪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处在相当低的平均水平（约0.5%），进入20世纪后，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跨上了年平均2.0%的水平，这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加速的结果。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是加速增长的。在1800—1855年间，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对产出年平均增长率的比率仅为7.1%，而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则达92.9%。从1889—1919年这个时期开始，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上升，并赶上了投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3.6%和56.4%）。到1919—1948年间，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73%以上。在1943—1973年间，产出增长有60%左右是由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

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整个19世纪，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较慢，产出的增长主要是由投入的增长带来的；在20世纪，生产率增长较快，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战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几个主要特点

前面我们考察了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历史，现在我们着重来考察一下战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特点。

表2提供了1948—1981年间美国私人经济，私人非农业经济和制造业的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和生产率增长的概貌。

表2 1948-1981年私人经济的生产率概况(%)

	总计	其中	
		非农业部门	制造业
投入	1.6	2.1	1.6
劳动投入	0.9	1.4	0.7
资本投入	2.6	3.2	3.3
产出	3.3	3.4	3.3
总和要素生产率	1.7	1.3	1.7

资料来源：同表1。

1948—1981年间，私人部门产出增长率高于1919—1948年的增长率。而且，投入也表现出持续的加速趋势。无论是劳动投入还是资本投入，都比前一时期有较快的增长——前后两个时期劳动投入分别为0.8%和0.9%，资本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和2.6%。特别是资本投入，增长速度超出前一时期一倍多。但是，同前一时期相比，生产率的增长却减速了。年平均增长率比前一时期低半个百分点。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即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占产出年平均增长率的比例，也下降了——从前一时期的73%左右下降到52%左右。

从整个趋势上看，1948—1981年间，私人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超过了整个私人部门，但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投入的增长，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低于整个私人部门的平均水平。在非农业部门中，战后这个时期的生产率增长率只占产出增长率的38.2%，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计算农业部门的有关数据，但是，从整个私人部门与私人非农业部门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知道，农业部门的投入，无论是劳动投入还是资本投入，都低于整个私人部门的平均水平；产出的增长速度也略低于私人部门的平均水平。但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却要远超出整个私人部门的平均水平。肯德里克关于农业方面的数据也可证实我们的看

法。(2)在肯德里克得出的1948—1977年的农业方面的数据中,农业的总和要素投入年平均下降1.9%,其中劳动投入平均每年下降3.8%。尽管时度度充裕1%的年平均增长率缓慢地增长,但单位劳动的资本配备却在同期增长了3.3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2%。这个增长速度远超过整个私人部门的平均水平(年增长率为1.7%),甚至超过制造业的水平(年增长率为2.2%)。这是农业生产率的速度高于其他部门的重要因素。

农业部门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1948—1978年间,根据肯德里克的数据,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30年间增长3倍,年平均增长4.7%,相比之下,整个私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3倍,年平均增长2.8%。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2倍,年平均增长2.7%。

以上我们概括了战后美国私人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总趋势,现在我们来分析战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特点。

战后美国生产率增长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整个增长过程可以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即1948—1973年和1973—1981年,前一阶段是生产率的高速增长阶段,后一阶段为生产率增长的停滞阶段;(2)整个增长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现分述如下:

1973年的转折

总的来说,在我们所考察的私人部门及其主要部分——私人非农业部门和制造业——中,生产率都取得了较快的增长。而且,各部门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在1973年以后,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都出现了停滞,偏离了战后25年以来所保持的趋势。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战后高速增长势头向低速增长的转折,而不是一般的周期性下降。如表3所示,1973—1981年间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从前一时期的2.2%跌落到几乎近于零。

伴随着生产率增长的下落,整个私人部门的产出的增长速度也从前一时期的3.7%下降到2.1%。私人部门中,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从前一时期的3.9%和1.7%分别下降到2.0%和零。制造业的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到1.2%和0.2%(分别从前一时期的4.0%和2.2%)。产生这种转折的原因非常复杂,它既可能产生于经济因素,也可能产生于制度因素(例如,劳动和就业方面的立法、环境保护立法等等),而且还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是本文第二部分的主题,我们将在那里详细地讨论。

表3 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转折

	1948-1973年			1973-1981年			变动		
	(1)	(2)	(3)	(1)	(2)	(3)	(1)	(2)	(3)
投入	1.5	2.2	1.8	2.1	2.0	1.0	0.6	0.2	-0.8
劳动	0.7	1.3	1.1	1.4	1.6	-0.2	0.7	0.3	-0.9
资本	2.6	3.3	3.1	2.7	3.1	3.6	0.1	-0.2	0.5
产出	3.7	3.9	4.0	2.1	2.0	1.2	-1.0	-1.9	-2.8
生产率	2.2	1.7	2.2	0.01	0.0	0.2	-2.2	-1.7	-2.0

注:(1)、(2)、(3)分别代表私人部门、私人非农业部门和制造业。

资料来源:根据表1,表2计算。

生产率增长的周期性

从战后的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数列来看,生产率增长过程中存在着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周期性。在我们所考察的部门中,生产率的增长都以4—5年的间隔呈周期性波动。以峰值划分,这些周期包括1950—1955,1955—1959,1959—1963,1963—1968,1968—1973,1973—1976,1976—1980等等。

最后一个周期因为靠近数据截止点,所以不很明显。每个周期都明显地表现出生产率从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然后恢复的完整过程。

同以产出为参考指标的一般经济周期相比,生产率的周期性变动通常是领先一年(经过一年的调整后,两种周期是吻合的),即生产率周期在产出周期出现峰值之前一年达到其峰值,而在产出周期到达顶峰时,生产率增长已开始减慢,另一方面,生产率在一般经济周期的低谷之前一年到达低点,而在经济周期进入低点时,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回升。米切尔(W. C. Mitchell)曾从要素价格和单位成本的变动来解释经济波动,他的解释也可以移用来说明生产率周期和一般经济周期的关系。这种解释认为,生产率在经济周期的顶峰之前开始衰退是由于需求膨胀引起要素价格和单位成本上升。单位成本的上升超过了产出价格的上升,因而减少了利润并降低了投资愿望;另一方面,生产率在经济周期的最低点之前开始回升是由于要素价格的下降,或者说因为要素价格上升的相对减慢。这样,单位产品的成本相对于产品价格就下降了,利润的份额因此增长,生产开始恢复。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没有同我们的经验数据发生矛盾,有一定的合理性。肯德里克的解释也与此相似。(3)从我们的数据来看,生产率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时间是一年,利用更具体、间隔更小的数据,如季度或月度数据,可能会得出较精确、合理的结论。

除了这种超前特点以外,生产率的周期性波动在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我们所考察的三个部门中,私人部门的波动最平缓,制造业的波动最剧烈,(4)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较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农业部门是波动最小的部门,因而包括农业在内的私人部门平均之后比私人非农业部门平稳。

二、1973年以后美国生产率停滞的原因

在战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概述中,我们已经指出,1948—1973年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一直比较平稳并且是历史上速度最快的;然而,在1973年以后的时期却出现了逆转。总和要素生产率从1948—1973年间2.2%的平均增长下跌到1973—1981年间的零增长。其他来源的估算也表明了这种转变趋势。在生产率增长出现停滞的同时,产出的增长也出现了减速。私人部门净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从1948—1973年间的年平均3.7%下降到1973—1981年间的2.1%。由于1973—1981年间实际的投入增长远远高于前一时期(1948—1973年间劳动投入增长率为0.7%,资本投入增长率2.6%,后一时期两者分别为1.4%和2.7%),所以产出增长速度的下降完全要归因于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

从1974—1975年经济危机开始,美国经济的增长减慢,而且,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成为战后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纷纷来研究这一时期增长率下降的原因。鉴于经济增长减慢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的减慢,一些经济学家就从研究导致生产率增长下降的因素入手,来研究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然而,经济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且大多不令人满意。限于篇幅,我们不准备在这里介绍和评论其他作者的研究,仅提出我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 1973年以后美国生产率增长停滞的解释

解释的方法

我们同样面临着其他作者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即:第一,我们还无法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比较精确地衡量某个因素所引起的收益变动(虽然对于教育程度变动所引起的收益变动已有较统一的估计),以便确定它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我们还无法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和方法来估计某个因素(通过对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发挥的)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而这是准确的估算所必需的。要解决这些困难,需要类似于投入产出表那样的一种结构。

它既能说明各因素变动对生产率变动的直接影响,又能说明各因素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生产率产生的间接影响。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未达到这种阶段。

尽管定量的分析还存在很大的困难,对生产率变化的解释仍然是可能的,因为生产率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的阶段,各种因素对生产率变化的作用不同。通过分析导致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方式,我们就可以较好地解释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和变化的机制。我们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同生产率相关程度较高的变量,这些变量正是我们要加以分析的,相关分析证明了这些变量同生产率变动存在相关关系。下面我们将分析它们同生产率变动相关的机制。在本节中,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然后讨论各种变量对生产率停滞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1)劳动质量和资本/劳动比率;(2)长期的经济停滞;(3)美国经济处于结构性变化中;(4)产业技术结构的不平衡;(5)政府政策的变化。

1973年以后美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

许多经济学家在解释1973年以后生产率增长停滞时,没有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美国生产率变化的影响。(5)实际上,在美国生产率增长发生转折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变化也是一个转折点,从两者都发生转折这个相似点来看,很难相信它们是毫无联系的。后面我们讨论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对美国生产率的影响,即是对两者联系的探讨。基于上述的原因,在解释美国1973年以后生产率增长出现较长期衰退时,有必要考察一下美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便使我们的分析有一个较全面的基础。下面我们还要专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分析战后美国生产率的变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从1974—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黄金时代的结束。自这次危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困难的境地。(危机后恢复最快的日本,其经济增长率也比危机前大大地下降了。见表4。)这次危机对于美国来说,是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1974—1975年危机之后,1980—1981年又发生了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的生产率水平还未恢复到上次危机前的水平,就又出现衰退现象。

表4 战后各国经济增长率(%)

	法国	联邦德国	日本	荷兰	英国	美国
1950-1973	5.1	6.0	9.4	4.8	3.0	3.7
1973-1981	2.5	2.0	3.7	1.7	0.1	2.2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展望》(Economic Outlook)1982年7月。

几乎与这两次危机同时,世界能源价格暴涨,造成了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对于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是一个重大冲击,引起它们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物价的波动。美国虽然是一个石油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危机前国际石油价格非常低廉,再加上国内石油生产本身存在的问题,因而大量依赖进口石油。在60年代末,进口原料约占国内消费的1/3左右,以后,美国国内石油生产稳定而略有下降,增加的石油需求都靠进口来满足,因而,能源危机后石油进口仍然不断增长。到1977年,进口石油已占石油消费的一半。所以,能源危机对美国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到。

劳动力质量、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虽然1973—1981年间美国私人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几乎为零,但是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81年,就业人口中受过1—3年以上大学教育的就业者占总数的35%以上。估计1973年至1981年间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带来的劳动质量的改善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约为0.52%,上一时期(1948—1973年)约为0.56

%。(6)因此,教育程度的改进仍然基本保持战后以来的趋势。与此同时,就业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化也保持了战后的长期趋势。就业人口中,妇女的比重继续提高,1948年到1973年从28.5%上升到38.5%。1981年上升到42.1%。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培训制度的提高,使得她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有了较明显的增长。因此,总的来说,年龄-性别构成变动对生产率增长的负作用只是略有增长(年平均为-0.36%,相比之下,1948-1973年间为-0.22%)。

总之,在1973-1981年间,就业人口教育程度和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质量的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仍然是正的(年平均为0.16%)。

1973-1981年间,资本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7%,同1984-1973年间的2.6%相近。但是,这一时期的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为1.4%,高于上一时期的0.7%,为上一时期的两倍。人-时资本装备量(即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1948-1973年间,资本/劳动比率以年平均1.9%的速度上升,而在1973-1981年间,这个速度减慢到1.3%。资本/劳动比率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减慢意味着资本设备更新的速度的放慢。对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不利的(劳动生产率从上一时期的3.0%下降到0.7%)。

在资本/劳动比率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资本设备的利用率也从1950-1973年间的平均84.7%下降到1974-1981年的平均81.2%。下降了3.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就业人数持续增长的同时,失业人口也持续增长,失业率比战后任何时期都高。

在不考虑技术变动这个因素时,失业率的上升和设备利用率的下降使劳动、资本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是生产率增长速度和产出增长速度下降的最直接的原因。

持续的经济停滞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产出同生产率的相关性是很显著的。产出的增长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73-1981年间生产率增长的停滞也伴随着产出增长速度的下降。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角度来看,生产率的停滞不前是1973-1981年间经济增长减慢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是由要素投入的增长引起的。

另一方面,经济的低速增长必然对生产率带来很大的影响。经济停滞导致了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降低了投资速度和设备利用率;同时,经济的不景气也无助于技术创新的进行。相比之下,在1949-1973年间,总的来说经济的长期增长为生产率增长提供了富有刺激性的环境。

经济结构性变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7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结构性转变中,是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特殊的原因。经过战后将近30年的持续增长(其间也有“中间性危机”发生),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结构性转变的阶段。70年代的大部分和80年代早期是美国经济从战后以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阶段转变为低速、不稳定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这种结构性变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到70年代初,农业劳动人口向其他行业的转移基本结束。农业劳动人口向其他部门的转移不仅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且也使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提高,劳动力部门结构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三产业和政府部门中的就业人员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员。1975年,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员同服务业和政府部门的就业人员之比为1:1.3,而在1960年,这个比例为1.3:1。此外,妇女就业率也在这一时期迅速提高。1977年,就业人口中有41%是妇女,同1965年的31%相比,有显著的上升。妇女的工作岗位大部分是由服务业提供的。在1965-1975年的10年中,妇女就业者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增长。

(2)产值的部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产值的部门结构来看,农业部门国民生

产总值在G N P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4.5%下降到1977年的2.9%。同期,制造业的比重从28.4%下降到23.7%。这些部门都是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而另外一些生产率增长较慢或下降的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反倒有所上升,如金融业(从1960年的13.8%上升到1976年的15.0%)和服务业(从1960年的9.7%上升到1976年的14.7%)。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比重下降了5.5%(根据表5计算)。整个非物质部门的产值达到G N P的66.4%(1976年)。

表5 私人部门各主要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和产值比重(%)

	农业	矿业	建筑	制造业	运输	通讯	公用事业	金融	贸易	服务业	其他
1960-76年生产率增长	2.2	0.9	-0.3	2.3	2.5	3.4	1.1	-0.3	2.2	1.7	-
1960年产值比重	4.5	2.5	4.5	28.4	4.4	2.1	2.5	13.8	16.9	9.7	20.7
1976年的产值比重	3.0	2.5	4.4	23.7	3.7	2.6	2.6	15.0	17.4	14.7	10.4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81年和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和周期》的附录。

从产值和劳动的部门结构变动来看,美国经济正在转变成为一个服务主导型的经济。非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比其他国家高得多(同英国相近)。但是,我们从部门间生产率增长的分布上可以看出,比重增长较快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如金融保险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比平均水平低许多。这样,这些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的上升必然会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这是结构性变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技术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美国经济中的一些 喜望挡棵如冶金、铁路、非电子机械及建筑业等的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这些老产业部门技术更新速度减慢,需求萎缩,使得美国经济中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发展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相当不平衡,导致了技术进步和创新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战后初期,美国的技术水平在绝大多数领域中领先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70、80年代,美国在电子计算机、宇航和航空,以及通讯设备等尖端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同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同美国政府的军事、空间计划有密切联系。政府提供的研究与开发资金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资金总数占有很大份额,尤其是在60年代。这使得这些尖端领域的技术水平获得很大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产业部门,特别是老工业部门,由于得不到新技术的刺激,技术老化,成为所谓的“夕阳工业”。在70年代,那些新兴的尖端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尚处于幼年时期,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小。因而,它们在生产率增长上领先不足以弥补在整个经济仍占很大比重,但日益衰落的老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上的减缓。发展缓慢的“夕阳工业”的技术水平被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欧各国和日本赶超上来,逐渐失去了生产率上的优势,进而失去了竞争力。

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政府的经济职能通过其政策来发挥。7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加剧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多变,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越来越多。政府开支占G N P的比例从1960年的26.6%上升到1973年的30.3%和1981年的33.0%。支出的增长必然要求收入随之增长。1970年各种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5.7%,到1975年,

这个比例上升到29.6%，1980年上升到30.4%。纳税负担的增长会降低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因为对于刺激生产率增长是不利的。另外，政府支出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属于社会保障和福利金，以及国防开支；前者的增长无助于刺激其接受者努力工作，后者则从经济上来说是无生产力的。较高的税负还会引起逃税漏税和地下经济的发展，从而也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此外，政府为了弥补收支差额，在市场上筹集资金，从而挤占了私人资本供给，抬高了利率，这也不利于私人投资的增长。

除了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外，政府的立法措施也会对生产率增长带来影响。政府对某些行业的管制，例如运输业，使得这些行业缺乏竞争，导致成本上升。环境保护方面的过高要求必然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并使某些工业，例如钢铁业，不得不向国外转移。

2.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停滞

为了进一步理解战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变化及其原因，我们需要综合考察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生产率增长，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生产率的增长和停滞。本节分两部分：（1）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率增长的分析；（2）从国际比较看美国生产率增长减慢的原因。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率增长

战后，各发达国家的生产率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以上。在1960—1973年间，联邦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速度是负的，即劳动力投入绝对减少，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得这些国家不仅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下降，而且还保证了它们具有较高的产出增长率（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有以下三个特点：

（1）除美国外，各国战后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1950年前的80年（1870—1950）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战后生产率增长是显著的，并且是共同的。在1973年前的100年时间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稳定在2.3%和2.6%之间，在1973年到1981年间下降到1.1%（7）。

（2）从1870—1950年、1950—1960年和1960—1973年的三个时期各国的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几乎都呈加速趋势，其中以日本最为显著。日本经济在1960—1973年间以9.8%的年平均速度增长，其中95%的增长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带来的。

（3）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1973年以后都出现了减速，改变了100年来的加速趋势，下降最多的是日本，达六个百分点以上。

表6 各国GDP和人-时GDP(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1870-1950		1950-1960		1960-1973		1973-1981		(8)、(6) 项的变动
	(1)	(2)	(3)	(4)	(5)	(6)	(7)	(8)	
法国	1.4	1.9	4.6	4.4	5.6	5.5	2.5	3	-2.5
联邦德国	2.1	1.5	8.0	6.9	4.5	5.4	2.0	3.7	-1.4
日本	2.1	1.6	8.8	5.7	9.8	9.3	3.7	3.1	-6.2
荷兰	2.3	1.4	4.5	3.4	5.0	5.4	1.7	2.6	-2.8
英国	1.6	1.4	2.8	2.2	3.1	3.9	0.5	2.9	-1.0
美国	3.5	2.3	3.1	2.3	4.1	2.6	2.2	1.1	-1.5

注：(1)、(3)、(5)、(7)列为GDP增长率；(2)、(4)、(6)、(8)为人-时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美]麦迪逊(Madison)：《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及表1等计算。

我们注意到，在上列四个时期内，虽然各国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很大的差别，但变化

的方向是相同的。考虑到各国的生产率水平在各个时期均有较大差异,这种生产率变化方向上的同一性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特别是在我们试图解释美国7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率增长出现停滞时,这种同一性引导我们从影响各国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因素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停滞。

主要发达国家在战后经历了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但在1973年以后,增长的速度大大下降。改变这种趋势的,除了各国特有的经济条件外,有两个各国共同的因素,即1974—1975年的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1974年、1979年两次能源危机。在分析各国(包括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减慢的原因时,这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这是因为,第一,各国的生产率增长的减慢是同时发生的,这说明有某些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起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但其他的因素在这个时期都是次要的、间接的,例如,如果我们用科技进步这个因素来分析这次生产率增长的转折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因素并不是显著的。因为,相对于美国来说,各国的科技水平都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日本,战后初期,它们与美国的差距比起70年代中后期的差距要大得多。这说明,在美国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的时候(1973—1981年也不例外),其他国家的科技水平发展得更快,因为它不仅没有落后,而且缩短了同美国的差距,在许多领域和部门甚至达到或超过了美国的水平。所以,科技进步,或者如丹尼森在分析美国的情况时所谓的知识进步,不可能成为导致这些国家1973—1981年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第二,70年代中期生产率增长开始减慢时,各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对各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它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

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生产增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与以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相比,这次危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危机后至下一次危机(1980—1981年)之间的复苏和高涨阶段并没有恢复以前周期中的增长速度。所以,从整个周期来看,无论是生产率增长还是产出的增长,都未达到战后其他经济周期的水平。伴随着这种低水平的增长,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在各国都出现了下降趋势。从表7可知,六国平均下降了将近两个百分点。人均资本投入的增长同生产率增长有很显著的联系,资本投入增长速度的下降意味着设备更新和新设备、建筑投资速度的减慢。发达国家的投资率水平都不高,因此,投资增长速度的减慢主要是对停滞前景的悲观预期引起的。

能源危机对各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能源,特别是石油,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能源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它为经济中的各部门,各环节所必需。第二,石油还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工业原料之一。第三,发达国家的能源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在战后至70年代早期能源价格由于发达国家垄断,石油的生产和销售而相对较低,廉价能源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能源价格上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有各种看法。丹尼森(1979年)估计,在1973—1979年,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国民收入每年损失0.1个百分点,即占同期生产率下降的11.5%。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都比丹尼森的结果大。肯德里克估计,1973—1979年,产出的损失年平均为0.3个百分点,约为丹尼森的三倍,有的学者甚至把1973年以后几乎全部的生产率下降归因于能源危机的影响。这些看法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表7 各国人均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

	法国	联邦德国	日本	荷兰	英国	美国	平均
(1):1960-73	4.8	6.2	10.6	5.9	4.2	2.1	5.6
(2):1973-80	4.5	4.7	5.8	3.4	3.4	1.0	3.8

(3):1973-80	3.9	4.1	5.2	2.9	2.8	0.4	3.2
(4):(2)(1)的变动	0.3	1.5	4.8	2.5	0.8	1.1	1.8
(5):(3)(1)的变动	0.9	2.1	5.4	3.0	1.4	1.7	2.4

注：第(3)行是经过贝雷调整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同表6。

实际上，这些差异主要由衡量能源危机影响的方法上的差异引起的。要分析能源危机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必须分析能源危机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下面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上升，直接影响了生产率的增长。据麦迪逊计算，在1973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七国）的能源成本占以要素成本计算的GDP的2%，而能源价格上涨后，这个比例上升到8%左右（8）。

其次，石油价格迅速而大幅度的上涨必然引起能源需求结构和生产要素组合（包括能源、资本设备、劳动和技术）的适应性变动，这种投入的结构性变动对现有的资本设备带来很大的冲击，使许多在原来能源消费结构下的资本设备作非正常的弃置；造成总的资本效率的降低，据贝雷估计（9），从1968—1978年间，有效资本的损耗中，有20%是由结构变动，特别是能源价格上升引起的。对由于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所引起的资本设备非正常的弃置进行调整之后，1973年以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甚至更低了。（见表7）

再次，石油价格突然大幅度的上升导致了各国的经济不稳定。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造成了各国国际收支困难和国内的适应性通货膨胀，成了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和助燃剂。这迫使某些国家的政府采取各种价格管制措施。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和过多的政府干预，成为生产率增长的长期的抑制因素。

能源价格上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很难具体用数量来衡量，也很难从数量上同其他因素相比较。因为，正如上一节所讨论到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分析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70年代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工业化国家垄断和剥削的正义斗争的结果。但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认识到，石油价格的上涨在一个时期内，是导致我们所分析的这些国家经济不稳定，生产率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并不等于忽视这些国家内部的或其他于生产率增长不利的因素，而是为了更清楚地研究各种因素。

以上我们从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这两个国家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来分析1973年以来发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各国由于各自的条件不同，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要专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生产率增长停滞的原因。

表8 1950-1980年各国人均资本增长速度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法国		联邦德国		日本		荷兰		英国		美国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950-60	2.4	4.4	5.0	6.9	5.1	5.7	6.4	3.4	2.5	2.2	3.4	2.3
1960-73	4.8	5.5	6.2	5.4	10.6	9.3	5.9	5.4	4.2	3.9	2.1	2.6
1973-80	4.5	3.0	4.7	3.7	5.8	3.1	3.4	2.6	3.4	2.9	1.0	1.1

注：(1)为人均资本增长速度。(2)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同表6。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美国生产率增长减慢的原因

战后美国生产率增长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异。前面我们讨论了和生产率增长相关的因素中同各国都有关联的几个方面——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影响。现在我们来讨论美国的特殊性。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比较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率增长因素上的差异。

(1) 从按就业者平均的资本拥有量的增长速度来看, 美国的增长率在整个时期(1950—1980)都低于其他国家。在50年代, 美国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长速度在六国中列第四位, 同其他国家相差不远。而在60年代, 同仅高于它的英国相比, 它的增长速度也只有后者的1/2, 同较高的国家相比, 它只有日本的1/5, 联邦德国的1/3。在1973—1980年间, 美国人均资本增长速度相对于其他国家, 下降得更快了。它只有同期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1/4。考虑到美国人均劳动时间缩短的速度比其他国家都快, 那么, 美国单位劳动时间的资本装备量的增长速度就更低于其他国家了。从所列的六国数据来看, 生产率增长率同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长率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因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 资本投资增长速度的低下, 是美国战后生产率增长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1973—1980年期间更可以看出这一点。(见表8)

表9 每千元实际GDP的能源消耗(单位:吨)
(1975年美国相对价格)

	法国	联邦德国	日本	荷兰	英国	美国	平均
1950	0.62	0.90	0.60	0.54	1.04	1.27	0.83
1960	0.57	0.65	0.53	0.54	0.84	1.11	0.71
1973	0.56	0.72	0.54	0.80	0.75	1.12	0.94
1981	0.49	0.56	0.46	0.70	0.62	0.94	0.63

资料来源:同表6。

同资本投入量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本的质量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工厂、设备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 这使得这些国家在战后大量重置或新增工厂、设备时, 可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或工艺。而美国则由于在大战中工厂设备未受损害而不可能进行这样彻底的设备和技术的更新。因此, 美国资本存量中, 老设备、老工厂的比重必然要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加上美国投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都低, 资本的更新更比不上其他国家。从资本质量的角度来看, 这是美国生产率增长低于其他国家的又一个因素。

除了资本因素以外, 研究表明, 在劳动人口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化对生产率带来的影响方面, 美国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处于不利地位。日本和英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2) 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的影响也要大于其他国家。

美国是一个能源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但由于价格和开采技术方面的原因, 美国的能源供给很大部分依赖进口。1970年美国石油进口量约占消耗的1/4。1970年以后, 美国本国的产油量稳中有降, 所增加的石油需求都由进口石油来满足。因而, 到70年代末, 进口石油已占石油消耗的1/3。同其他国家相比, 美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性最大。从表9可知, 美国每千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比其他国家都高。这就说明, 在能源价格所引起的单位产品变动方面, 美国也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单位产品能源消耗较小的国家, 例如法国, 受能源价格变动的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较小。单位产品成本的倒数即是单位投入的产出, 亦即我们所谓的生产率。所以, 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的不利影响大于其他国家。

总之,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与能源危机冲击, 美国在这一时期甚至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大的打击, 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三、里根年代的美国生产率增长

前面我们主要讨论了1973—1981年间美国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原因。进入80年代后, 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里根政府把减少政府干预作为最基本的

经济政策。里根政府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抑制了私人企业的创新活动，限制了竞争，因而对解决经济问题并无好处。因此，里根上台后，即实施同以前几届政府完全不同的政策——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抑制通货膨胀，通过改革税制来增进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国家管制（deregulation）来扩大竞争机会，发挥市场的作用。在1982年危机之后，里根经济政策的作用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表 10 美国私人部门的年平均增长率

	1948-1973	1973-1981	1981-1985
产出	3.7	2.1	3.6
要素投入	1.5	2.1	2.1
劳动投入	0.7	1.4	2.0
资本投入	2.6	2.7	2.3
要素生产率	2.2	0.0	1.5

资料来源：本文表 1，以及根据《美国统计摘要 1987》和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 年的有关数据计算。

2. 70 年代困扰美国的“滞胀”现象已经不复存在。里根政府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导致 1982 年以后美国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这转过来使得美元汇率和美国的实际利率上升。这一变化也导致了美国从 1983 年开始经常项目收支连年出现逆差，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国。这一方面表明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不断上升（同 70 年代的美元危机相对照），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巨额的贸易赤字。巨额的贸易赤字同巨额的财政赤字一起成为里根年代美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3. 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因伊朗革命而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冲击后，国际石油价格逐渐下降并稳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摆脱“滞胀”，而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因通货膨胀率下降，实际利率上升，以及 80 年代初美元汇率的上升而陷入深重的外债困境中。

这些变化表明，里根执政后，美国经济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响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获得的数据表明，1981—1985 年间，美国私人部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6%，其中生产率增长为 1.5%，占产出增长率的 40% 以上（见表 10）。虽然生产率增长仍低于 1948—1973 年时期的水平，但相对于 1973—1981 年，仍可以说是有力的回升。诚然，这种回升能持续多长时间还难以预测。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里根的经济政策同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一起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的条件下，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出现了回升的势头，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加强。总的来说，经济政策的变革，包括改革税制，放松管制，减少国家干预等政策的施行，为进一步提高美国生产率，增加美国经济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机会。

注释：

(1) 由于公共部门或者说政府部门的统计核算不完全，所以只列出私人部门的数据。本文以下考察的对象是美国私人部门。美国私人部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国民经济的 85% 以上。故私人部门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

(2) 见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与周期》1980 年。

(3) 见肯德里克前引书第 88—95 页。

(4) 肯德里克在《美国的生产率：趋势与周期》中，利用季度数据对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波动和一般经济周期做了比较分析。见该书第 99 页。

(5) 例如丹尼森 (E. F. Denison)，见丹尼森：《增长率下降的解释》，布鲁金斯学会出版，1979 年。

(6) 估计的方法是把劳动力队伍的教育水平的变动按一定的权重加总, 得到一个总的教育水平的变动, 权重以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报酬的相对大小来确定。类似地, 就业人口的年龄—性别的变动也可以获得。这种方法是丹尼森在其196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首次采用的。

(7) 麦迪逊的数字比我们的美国私人部门的数字略大(0.7%)。因本文估算的数据主要是美国私人部门的, 所以难以用来做国际比较。麦迪逊(美国宾大教授)的数据虽简单(只能据此计算劳动生产率), 但具有很好的国际可比性。故在国际比较时采用他的数据。

(8) 见麦迪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 载肯德里克编:《生产率增长的国际比较和下降的原因》, 1984年。

(9) 见贝雷(M. N. Baily):《资本、劳动的生产率和服务》, 载《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 1981年第1期。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初探

袁韶莹

美国现有正规高等院校约3300所, 其中有培养博士生的大学400所, 培养硕士生的大学1000所, 四年制学院700所, 二年制社区学院1200所。公立和私立学校约各占一半。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 其学校总数、在校生总人数、高等院校毕业生总人数以及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据1976年的统计, 美国的20—24岁人口中有55.5%的人正在大学里读书, 这个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之所以如此发达, 除了因为它有高度发展的经济之外, 还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有发达的高等教育评价系统。一方面它的教育评价理论基础比较雄厚, 另一方面它的教育评价实践活动开展得比较好。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理论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中, 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是最发达的。回顾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发展的150年历史,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和理论特点。从19世纪30年代到世纪末, 是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萌芽阶段。南北战争也即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等院校数量的激增, 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大量涌现, 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感到担心, 就要求用统一的质量标准对各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作出评价。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20年代末, 是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教育测定运动阶段。当时, 由于自然科学的大发展, 物理学的测量手段被应用到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 从而出现了智能测定、学力测定、心理测定、教育测定。从本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 是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教育评价运动阶段。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高等教育也面临危机并且亟待改革的情况下, 出现了“八年研究”。“泰勒模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教育评价指导思想。从本世纪60年代至今, 是美国高等教

育评价的现代教育评价阶段。

（一）萌芽阶段

在回顾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发展史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教育家霍勒斯·曼(Horace Mann)于1837年提出向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改变过去的单纯用口试评价学生成绩的作法，他主张以具有同一客观标准的笔试法取代带有教师主观色彩的口试法。在他的倡导下，1845年的波士顿文法学校首先实行了笔试法。

1890年心理学家卡特尔(J. M. Cattell)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利用心理测验法测定学生成绩。

1894年教育家赖斯(Joseph Rice)对20所学校的16000名中学生进行“拼字测验”，结果表明，教育测定工作是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1899年美国成立了大学招生考试委员会(CEE B)，开始统一组织全国的高考，这是美国高等教育评价走上统一标准化的标志。

（二）教育测定运动阶段

1904年著名教育家桑代克(E. L. Thorndike)在《心理与社会测定导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论断：“凡是存在的事物都有数量，凡是有数量的事物都可以测量。”此论断对教育测定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桑代克被后人誉为“教育测定之父”，成为美国教育评价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他主张教育测定必须做到客观化及标准化。

在桑代克的倡导下，教育测定运动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 S S E)开始把心理学的测定应用到对教育结果的测定中去。

1923年心理学家凯利(T. Kelly)设计出“斯坦福大学成绩测定标准”，这是首次出现的可以综合利用于全部课程的测定标准，人们给予很高评价。

1924年美国六个地区都成立了“学院和中学联合会”，开展高等学校的认可鉴定工作。这实际是把教育测定的各种手段应用于对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鉴定和评价。这时，美国的教育测定运动进入了高潮。

20世纪末期，教育测定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教育测定可以评价学生的成绩与学力，也可以对教育成就进行定量化、客观化、标准化的评价，却无法测定学生的世界观与思想感情等等。

（三）教育评价运动阶段

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美国教育界陷入了资金匮乏的困境，于是，教育的社会效果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美国教育评价史上著名的“八年研究”。

“八年研究”(1933—1941)是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P E A)发起的，有300所大学和30所中学参加了这场课程改革研究。由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泰勒(R. W. Tyler)领导的“追踪研究与评价委员会”从这30所中学选定1475名毕业生作为追踪对象，与其他中学的1475名毕业生对比，经过四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实验学校的毕业生无论在学业成绩、思维能力、学习兴趣、实践能力、对环境和职业的适应能力方面都比其他学校高。

1942年泰勒与史密斯(E. Smith)合著的关于八年研究的《评价委员会报告书》被人们称之为“教育评价宣言”，因为这份报告书正式提出了“教育评价”的概念，认为教育评价就是衡量实际教育活动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而测定只是它的手段。报告书中提出了五个观点：(1)教育是使人的行动方式发生变化、得到改善的过程；(2)各种行动方式的变化都是教育的目标；(3)教育计划要以教育目标实际完成的水平而加以评价；(4)人的行为是复杂的，既不能用个别的名词概念来说明，也不能用单纯的测验来判断，对它的评价必须从多方面加以综合才能完成；(5)要搞好评价，单靠纸和笔是不够的，还应当采用观察、

谈话等多种方法。

“八年研究”适应了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教育评价史上的“泰勒时期”，把他提出的关于教育评价的理论称之为“泰勒模式”，又称之为“行为目标模式”。这是一个以目标为中心的模式，就是说，预定的目标决定了教育活动，同时也规定了教育评价就是判断实际教育活动达到或偏离目标的程度，从而通过信息的反馈来促进实际工作，使之能够尽量地靠近目标。这是一种与系统分析法最为接近的理论，它成为30年代到50年代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教育评价理论。

1948年在波士顿成立了“美国心理学会总会”，学者们开始研究建立教育目标体系。

1956年著名心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布卢姆(B. S. Bloom)发表了《教育目标分类学(一)》。他提出，教育目标的第一级分类应当包括三个领域：(1)认知领域(包括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等)；(2)情意领域(包括注意、反应、价值倾向、组织等)；(3)精神运动领域(包括身体运动、协调动作、言语行为、非语言交流等)。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对于完善教育评价理论，有效地开展教育评价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 现代教育评价阶段

1. 60年代的理论发展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引起了美国的“大地震”。全国各界人士一致认为美国科技的落后应归咎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落后，因此教育必须改革。一些学者重新审视教育评价理论，认为“泰勒模式”有个根本缺陷，就是说，教育评价是以目标为中心，而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却是无法衡量的。何况，每项教育活动除了要达到预期目标之外，还会产生各种非预期的效应与效果，对它们也应进行评价。

1961年在瑞典成立的国际教育到达度评价协会(IEA)主张，教育评价应以把握教育现状为主要目的，评价的领域应当包括教育目标、教育课程、教学组织、教育预算等等。这些主张对美国教育界的影响颇深。

1966年教育家斯塔弗尔比姆(L. D. Stufflebeam)对泰勒模式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把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融为一体的“CIPP模式”。他认为，评价是一种过程，它包括系统地搜集、整理、提供有用的资料，以便决策时择优而行。他主张，进行教育评价，第一步要根据社会需要对教育目标本身进行价值判断，这就是诊断性的背景评价；第二步要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对教育计划、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输入评价；第三步要结合研究大量的反馈信息来发现计划、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并加以解决，这就是过程评价；第四步要根据完成定量目标的情况来衡量教育质量，这就是结果评价。

1967年教育家斯克里文(M. Scriven)批评了泰勒模式，并提出了具有更大客观性的“目标游离模式”。他认为，进行教育评价时，要考察教育方案、计划、活动的真实效果，而不是预期效果。他主张，在形成性评价阶段，应当由教育计划、方案的执行者充当评价人；而在总结性评价阶段，应当把已经完成的教育活动作为评价对象，把搜集资料作为评价活动的重点，还应当强调评价人的客观性，一定要客观地作出价值判断。总之，作出评价结论的依据不是教育方案制定表的预定目标，而是教育活动参与者的意图。

在批判泰勒模式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受到更多人重视的“应答模式”。这是由斯塔克(R. E. Stake)首先提出，由他人加以完善而形成的模式。这种评价模式的出发点，是从决策者与实施者双方的需要出发，通过信息反馈，使评价结果真正产生效果。这种评价活动，能够回答其他模式所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关于目标的到达度、决策与判断的正确性等。这种模式在动机上强调价值观念的发散性；在方法上强调客观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方法，注重自然主义方法。因此，它更适合于当代这个多元的、复杂的客观世界的现实和各种层次、各种观点的评价者的需要。可以认为，应答模式是迄今为止的各种评价模式中最全面、最有效

的一种。

2. 70 - 80年代的理论发展

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对教育评价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许多学者对相对评价进行了批判,要求废除现行的考试、测验制度。他们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教育评价的本质是什么?它应当起到什么作用?它在现实中应当完成什么任务?

1971年,教育家桑德(O. Thornd)提出,今后的教育评价应当向新的方向发展:(1)过去的具有惩罚性的测验,今后要成为引导、刺激学生继续发展的评价;(2)过去以书面测验为基础的评价,今后要发展为以观察法为重点的多种多样方法的评价;(3)过去以考察记忆力为中心的评价,今后要发展为以创造性和问题意识为中心的评价;(4)过去的单纯在课程结束时进行考试的评价,今后要成为与课程同时进行的合作性的评价;(5)过去只着眼于狭窄范围的测定能力的评价,今后要变成考察认识、情意及运动技能的全面的综合评价;(6)过去只由教师进行的评价,今后应当提倡学生进行自我评价;(7)过去只由大学进行的入学资格审查评价,今后应当由大学与高中协作寻求更稳妥的评价方法。

1972年,教育家埃贝尔在专著《教育评价理论》中指出,当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评价理论,一种是“传统见解”,另一种是“进步见解”。他认为,进步的教育评价理论特点是:(1)认为教育评价的目的是诊断学生成绩,促进学生学习;(2)认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创新精神的开拓性人才;(3)认为学生应当有敢闯精神、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积极参加各种活动;(4)认为学生的学习目标应当由学生自己来确定;(5)认为教师的作用应当是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应当以学生的朋友身份出现于学生面前;(6)认为教育评价不但要看学生掌握多少知识,能完成什么任务,更要看学生知识面有多宽、思维有多么敏捷、有多大的创造性、有多丰富的想像力。

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又有了深入发展。全国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教育评价研究中心,其中最出名的有:斯坦福大学教育评价联合会、西密执安大学教育评价中心、洛杉矶加州大学教育评价研究中心、伊利诺斯大学教学研究及课程评价中心等。这些研究中心的任务是加强和推动各大学的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及实践活动,以求达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之目的。许多高等院校纷纷建立教育评价专业,培养教育评价的专门人才。1984年全国有117所大学正式建立了教育评价专业,那里不但培养本科大学生,还培养研究生,有权授予教育评价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等学位。美国的教育评价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美国教育研究学会、美国教育评价研究会,美国教育评价信息网等学术团体都在积极开展高等教育评价理论研究,每年都有许多教育评价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问世。这些研究机构还创办了一批刊物,其中有《教育评价研究》、《教育评价评论》、《教育评价信息》、《教育评价与政策分析》《方案评价新趋势》等。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高等教育评价不仅历史长,理论基础雄厚,而且它还有一套比较健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些制度保证了全国高等教育评价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一) 评价机构的变迁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由于美国是地方分权制的联邦国家,联邦教育部对大学没有管辖权,各州政府也只能管辖该州的公立大学,凡是私立大学都可以完全自治。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大学为了永远逃避政府的控制,便自发地联合起来。1885年建立了第一个民间组织——新英格兰地区学院与中学联合会。此后,相继建立了中部地区、中北部地区、西北部地区、西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学院与中学联合会。联合会下设的“高等院校认可鉴定委员会”开始对各地区的高等院校进行认可鉴定。与此同时,

一些全国性的专业学会开展了高等院校专业的认可鉴定活动。

20世纪初创立起来的认可鉴定制度已成为当代美国高等院校认可鉴定的雏形。

1949年成立了美国国家鉴定委员会(NCA),其任务是协调各专业鉴定组织的活动。

1964年成立了美国高等教育地区鉴定委员会联合会(FRACHE),其任务是协调各地区鉴定组织的活动。

1975年,这两个组织合并,成立了美国中学后教育鉴定委员会(COPA)。这是美国高等教育评价民间组织的最高机构。它拥有审查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高等院校认可鉴定机构、高等院校专业认可鉴定机构的权力。每年公布一次它所承认的鉴定机构名单。

官方高等教育评价管理的最高机构是联邦教育部的“资格与机构评价办公室”。它每年对全国高等院校和高等院校专业认可鉴定机构进行审查,然后公布它所承认的鉴定机构名单。

全国任何一个鉴定机构,都必须得到以上两个机构的承认,才具有权威性,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

COPA下设三个鉴定协会:(1)美国高等院校鉴定协会(AIAB);(2)美国高等院校专业鉴定协会(ASAB);(3)全国中学后教学组织协会(ANPEO)。

AIAB包括4个全国性高等学校鉴定机构(美国神学院鉴定委员会、美国独立学院鉴定委员会、全美贸易技术学院鉴定委员会、全美家政研究委员会)和9个地区性学校鉴定机构。这13个机构分工负责鉴定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

ASAB包括37个全国性专业鉴定委员会,其中有美国工程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美国商业院校会议(AACSB)、美国师范教育鉴定委员会(NCATE)、美国医生协会(AMA)、美国律师协会(ABA)等。这些鉴定机构分工负责鉴定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的全部专业。

ANPEO虽然也属于COPA,却不开展认可鉴定活动。

(二) 评价标准的制定

1. 高等院校鉴定标准

以学校为整体的认可鉴定工作是比较复杂的。在认可鉴定开始之前,要公布质量标准。对高等学校的鉴定,不仅涉及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包括管理水平及经费状况等。概括起来,有下列原则性标准:(1)具有恰当的培养目标;(2)具有达到目标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人力、物力、财力等);(3)能够表明它正在实现其培养目标;(4)能提出可信的理由,表明它将继续实现其培养目标。

鉴定一所学校的具体标准,一般包括下列方面:(1)学校的任务与目标是否明确;(2)经费来源是否有保证;(3)设备、设施等物质条件是否充分;(4)教育、教学计划是否完备、妥善;(5)图书资料是否充足;(6)教师队伍的结构是否合适;(7)行政管理机构是否健全;(8)学生工作是否令人满意(入学条件、注册制度、学习方向、对学生的指导、考试制度、经费资助、书店、食宿服务、健康服务、课外活动、就业指导等);(9)科研工作水平;(10)研究生教育工作水平;(11)继续教育及特殊教育水平。

2. 高等院校专业鉴定标准

各种专业都有不同的专业特点,因此,各专业的鉴定标准都不相同。

ABET所制定的工程技术专业鉴定标准包括下列方面:(1)教师队伍(学术水平、工作态度、教学经验等);(2)学生质量(学习成绩、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报告水平、工程设计水平等);(3)课程设置(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开一年;力学、热工学、材料学等专业基础课开一年;工程设计课开半年;人文社会科学课开半年;此外还应开设经

济学课程);(4)教学设施与设备(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等);(5)行政管理水平(管理人员的工程经验与背景、参加工程技术工作的情况等);(6)学校对工程技术专业的态度;(7)教育计划是否富有创造性、想像力,是否鼓励改革与试验。

(三) 评价工作的过程

美国高等教育的认可鉴定,是高等院校集体自治管理的一种主要方法,它是为控制教育质量而进行的自愿活动。这种教育评价,简单说来,就是根据事先确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对一所高等院校的整体或它的某个专业作出鉴定的过程。

1. 申请过程

在美国,新建的高等院校必须首先向州政府提交办学申请。经州政府审核批准,便是获得了法律承认。这是申请质量认可鉴定的前提条件。

申请获得认可的学校或专业,首先要根据鉴定标准进行全面的自我鉴定,写出书面报告,报告中要明确写出本学校或本专业的优缺点。然后将申请报告提前六个月上交对口的认可鉴定机构。

2. 视察过程

鉴定机构根据申请,组织质量鉴定视察小组。小组成员包括本机构成员学校的校长、教授及各方面专家、研究机构的学者、有关企事业的代表等。全组人员一起到申请单位去视察几天。他们同全体人员广泛接触,听课,检查有关文件。最后写出视察报告,分析该单位的教育质量,肯定成绩,指出问题,报送认可鉴定机构。这样的视察,必须在收到申请的两年内进行。

3. 结论过程

认可鉴定机构在收到视察报告后进行讨论。以A B E T为例,它所作的鉴定结论分为四种:完全合格者为6 V级,有效期为六年;有小缺点者为3 R级,限三年内克服缺点,有效期仍为六年;有较大缺点者为3 V级,限较短期限内克服缺点,有效期为三年;不合格者,评为N A级。

评为6 V者,列入当年公布的认可院校或专业名单;评为3 R、3 V者,只要该单位作出在限期内克服缺点的“合理保证”,便可列入“候补认可院校或专业名单”;评为N A级者,只要该单位表明继续争取的态度,便可列入“评价联系院校名单”。列入前两个名单者,都可得到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资助。

(四) 其他评价活动

最近20年来,美国高等教育评价活动声势浩大,种类繁多,影响广泛。下面仅举出二例予以说明。

1967年美国国家教育标准局(N E S)成立了一个以哥曼为首的四年制高等院校本科生教育质量评价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学校从五个方面(教师水平、教学及学术水平、管理工作、服务工作、设备设施)进行评价。每个方面又细分成几项到几十项。评价方法,完全依靠大量的客观材料和各种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给全国的高等院校评定分数,排出名次。他们把评价结果印刷成册,以《哥曼报告》为书名,从1967—1986年共出版了12本。这部书已经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1976—1981年由美国教育协会(A C E)、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 C L S)、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 R C)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 S R C)联合进行了一次“美国博士学位计划的评价”。这次评价的对象是数学与物理、生物与生命科学、工程科学、社会与行为科学、人文科学等五个门类的32个学科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计划。全国228所名牌大学的32个学科2699个博士学位培养点接受了评价。评价方法,既有由同行进行评议的主观评价,也有用质量指标来衡量的客观评价。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六类16项。这次大型的评价活动,前后历时五年,耗资500万美元,参加评价的学者和专家多达5000名。可以说,这次评价活动是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教育质量评价活动。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特点

美国是一个地方分权的资本主义联邦制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院校没有管辖权，它不可能像苏联政府那样用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去约束高等院校，而只能通过各州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主要是靠民间机构进行的。

（一）高等教育评价理论基础雄厚

美国的教育评价理论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泰勒模式受到批评以后，又出现了C I P P、目标游离、应答、反对者、差异、医疗、费用与效果分析等40余种评价模式，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流派，有一些共同点，在教育评价的目的上，它们都强调要通过教育评价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推动教育事业向前发展。例如，L·斯塔弗尔比姆就指出，现代教育评价的目的“不在于证明，而在于改进”。在现代，虽然教育评价仍然具有实现行政管理的职能，但作为侧重点，评价的结果主要用于提出建议，促进教育工作的发展。现代教育评价虽然也承认总结性评价的作用，但它更注重评价的形成性作用。这一根本目的的转变，是美国现代教育评价区别于早期教育评价活动的显著标志。在美国，随着教育评价理论的深入发展，教育评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出现在高等院校的专业名单上，高等院校开始培养这一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这说明美国高等教育评价在西方世界里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

（二）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在美国，虽然也有官方的评价机构，可是，大量的实际评价活动都是由民间学术团体进行的。民间的认可鉴定机构享有很高的威信，它可以不受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的控制。在评价过程中，与评价的专业化趋势相适应，民间的专业人员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进行评价时，申请者必须写出全面的、认真的自我评价报告，这可以使被鉴定者由被动变主动，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发挥他们在认识与改进自己工作方面所具有的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评价实践过程中，美国出现的应答模式，既能反映管理者与决策者的需要，也能反映方

、计划的实施者的需要。这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特点之一。

（三）高等教育评价的作用愈来愈大

虽然美国高等教育评价机构是民间的，认可鉴定又是各单位自愿申请的，但是人们都非常重视它。总的来说，高等教育评价能够保证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民间的评价机构起到了联邦教育部可望而不可即的监督、检查、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对于各高等院校来说，通过评价，一方面它们可以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有利于改正缺点，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取得认可资格后，既可以顺利获得联邦政府、州政府、美国科学基金会、各大企业提供的经费或资助，又可以参加院校联合会及鉴定委员会，获得与外校平起平坐的招聘好教师、招收好学生的权利。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学校获得认可后，学生获得的学分在转学时便可以得到外校承认，毕业时便可优先获得州政府的任职许可证。总之，高等教育评价事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四）高等教育评价机构的威信愈来愈高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机构已经形成网络，它们的影响已经遍及全国的几千所高等院校。

地区性高等院校认可鉴定委员会中规模最大的中北部地区鉴定委员会，工作范围是19个州的915所高等院校，其工作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全国性高等院校专业鉴定委员会中的A B E T，1986年一年里对90所高等院校的300多个工程技术专业进行了鉴定。目前，该委员会在全美土木工程师协会、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等23个专业团体的支持下，已经为全国263所高等工科院校的1296个专业进行了鉴定。

如今,接受认可鉴定已经成为美国高等院校的自觉的行动。据1982年的统计,当年美国共有3253所高等院校,有2800所通过了认可鉴定,有300所被列入候补名单。

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发展趋势

150年来,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有了巨大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院校认可鉴定与专业认可鉴定是由两个机构分别进行的,每所院校既要接受地区性鉴定机构的鉴定,又要接受许多个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这就造成了时间与经费的浪费。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一) 指导思想方面

美国现代高等教育评价在指导思想上将比过去更加重视评价的形成性功能。

通过教育评价的实践,人们认识到,形成性评价的特点是通过揭示存在的问题,反馈有关的信息,以促进教育工作的提高;终结性评价的目的在于对评价对象作出某种资格的判定。因此,人们一般都重视对教育活动结果的评价。现代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不同于过去,不是为了选拔适当的教育对象,而是以改进教育工作、创造适合学生需要的教育为目的。因而在承认终结性评价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同时,美国学者更重视的是评价的形成性功能。这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一种发展趋势。

(二) 评价方法方面

美国现代高等教育评价将比过去更加重视主观法与客观法的结合、定性化与量化的结合。

在美国高等教育评价的萌芽阶段和教育测定运动阶段,人们对当时风行的客观评价方法非常重视,认为那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当时,要评价一所高等院校的办学水平,便以学生统考的成绩、教师当中教授人数的多少、师生发表论文的数字等等作为下结论的根据。当时,强调的是摒弃主观因素,追求评价结果的完全客观化。后来,随着教育评价运动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活动是复杂的,教育活动中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也是错综的。如果在评价中一味追求纯客观,往往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往往会忽视那些难以量化的因素。因此,美国一些高等教育评价学者提出,虽然从定性向定量发展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虽然发展各种定量分析的方法是提高教育评价科学性的途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必须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客观的统计处理方法与带有主观色彩的描述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三) 评价制度方面

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已经出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趋势。

现行的美国高等院校认可鉴定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它已经落后于教育改革的新形势。美国卡爾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开提出,现行的认可鉴定制度必须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认可标准。如果用现行的、几十年不变的标准来衡量一些新型的学校、新建的专业、新兴的学科,那都是难以通过的。这样一来,必然对新生事物、对改革起着束缚作用。例如,目前的认可鉴定机构对学校进行评价,往往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图书资料、校舍校园等数量因素,往往忽视学生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质量因素。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连美国总统里根也注意到这些情况,他曾经宣布,要撤销联邦教育部。假如他的话得到兑现,各州政府将会接管美国高等院校的认可鉴定机构。到那时,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四) 培训评价人才方面

从1973年起,美国的教育评价研究领域已经趋于具体化。教育评价作为一门新学科、新专业已经诞生。此后的十几年中,经过教育评价人员的不懈努力,许多学术团体建立起来,许多书籍和刊物得到出版。各大学和专业机构制定的培训教育评价人才的计划正在许多地方实施。从事研究和开展教育评价工作的中心纷纷成立。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制定了培养教育评价人员的政策和计划,马萨诸塞州也在制定类似的计划。现在,对高等院校进行全面评价,作为一种确定和检查质量的手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许多高等院校建立起来的教育评价专业,每年都要培养出一批教育评价专业的人才。今后,这些人才必将成为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的教育评价机构的骨干力量。教育评价专业人才的队伍将越来越壮大,教育评价工作将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美国城市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史明正

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城市国家。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统计,到1980年,近80%的美国人口居住在城市或与城市密切相联的城郊。截至1986年底,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多达十余个,其中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费城、底特律、圣迭戈和达拉斯等城市名列前茅。(1)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象征,美国城市不但反映而且影响着现代美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

然而,美国史学家对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美国城市史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尚属年轻,处于探索阶段。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他的西部边疆学说统治美国史坛。特纳的边疆学说认为,美国历史是一部西部开发史,对西部边疆的不断探索和征服是推动美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边疆研究是美国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总纲之下,其他探讨,如民族性格,人口迁移和两党政治才变得有意义。毫无疑问,特纳的边疆学说是美国史学的重大贡献。生长于美国中西部的史学家特纳凭借自己的直觉和洞察力,充分地肯定了西部边疆的无偿土地对提供生计保障、促进民主政治、塑造民族性格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今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

192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结果,宣布西部边疆开发完毕,全国大多数人口已经在城镇落户。这个统计结果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对美国城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美国城市史学的奠基人当推哈佛大学教授阿瑟·M·老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1933年,老施莱辛格发表了《论城市的兴起》一书,把1878—1893年这段美国历史纳入了城市发展的轨道。七年之后,他又在《美国历史学刊》的前身《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上著文“论美国历史上的城市”。(2)老施莱辛格认为,城市对美国文明史发展的影响与边疆不相上下。城市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和改革的场所,加强了美国人的团结和集体责任感。这种群体的概念与边疆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探险精神一道共同塑造了美国的民族性格,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他强调指出,在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国家以后,城市的作用将远远超过边疆,史学家应给予城市以足够的重视。总之,老施莱辛

格 没有提出研究城市史的系统方法论,但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奠定了美国城市史学的基础。

50年代是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初期。老施莱辛格、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阿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等著名史学家在几所美国大学里开始开设城市史课程,数量可观的博士研究生开始把美国城市史作为论文主题。1953年,城市史学会成立,次年开始出版其学术刊物,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大都属于“城市传体史学”范畴。史学家力图通过研究某个典型城市的兴衰史来揭示整个国家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传体史学的基调为记叙体,与中国的地方志或县志类似,往往侧重于记载具体事件和传闻,忽视了综合分析和寻找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城市传体史学的代表作包括理查德·C·韦德(Richard C. Wade)的《城市边疆》,贝尔德·斯蒂尔(Bayrd Still)的《米尔沃基:一个城市的历史》,以及布莱克·麦凯尔维(Blake Mckelvey)关于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发展史的四卷本著作。(3)

在大动荡的60年代,美国城市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起源于20年代末期经济大萧条、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在艾森豪威尔时代达到高潮的美国传统史学主流开始瓦解。60年代遍及美国各地的贫民窟骚乱和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所实行的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再一次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城市和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下层。在这种形势下,史学家们开始摒弃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把重心逐渐转向社会史。他们开始从下朝上地研究历史,兴趣点放在种族文化和阶级背景上,研究下层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价值观念,以及这些无名人士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

在史学研究重心转变的60年代还发生了另外两个深刻的变化:科技革命和教育普及。科技革命使美国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史学研究开始运用这个科技新成果搜集、贮存、分类和分析历史资料。计算机的运用使史学变成一门更为精确的社会科学,此外,到了60年代美国的大学教育较为普及,攻读社会科学学位的研究生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在1882年到1970年之间,美国大学中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共有1417篇,其中半数以上是在60年代完成的。(4)这个数字显示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开始对社会史研究发生兴趣,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美国城市史研究在60年代获得新的突破。截至1967年,美国50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城市史课程,其他150所学校开设了与城市史密切相关的课程。1967年,查尔斯·格拉布(Charles Glaab)和西奥多·布朗(Theodore Brown)合编了《美国城市史》教科书,填补了城市史课本的空白。同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由韦德为总编辑的题为“美国城市生活”的专著系列。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城市史专著系列。几年以后,《城市史学刊》创刊,《城市史年鉴》和《城市史评论》也分别在英国和加拿大出版发行。

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更体现在其方法论方面的突破。许多史学家认为,城市史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社会学科,必须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1961年,史学家埃里克·兰帕德(Eric Lampard)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中发表了题为“美国史学家与城市化研究”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兰帕德对运用传体形式研究城市的方法提出质疑。他认为,城市史研究不应该成为城市问题研究,更不应该成为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历史传奇。相反,“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全面的、探索性的‘群体结构’理论”。城市应是许多相互作用因素的平衡产物,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环境、科学技术水平和组织结构。兰帕德指出,这个理论框架有助于史学家们理解人口迁移、劳动分工以及工业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最后,兰帕德提醒史学家们注意社会流动性这个美国社会突出的现象和它在城市化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美国阶级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十分森严,城市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其他改善生活的机会。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士,特别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以及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中下层人士,通过自身的奋发图强改变了原先的境遇,跻身于上层之列,过上殷富的生活。

同时,由于城市竞争激烈,不少原来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上层人士逐渐丧失了竞争力,变得贫困潦倒,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美国城市社会中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流动性非常普遍,应该构成城市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真正对兰帕德上述理论进行实践论证,从而开创了美国城市史学新局面的史学家当推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 Thernstrom)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姆·沃纳(Sam Bass Warner)两位教授。1964年,塞思托姆发表了代表作《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5)在这部论著中,他成功地验证了19世纪的美国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了众多改善生活机会的假设。在研究方法上,塞思托姆运用了人口统计结果,对他的研究对象——马萨诸塞州纽伯利港在1850年和1880年之间的人口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贫穷与进步》这部著作“首创研究凡人小事的史学之风,首次运用社会流动性这个社会学的概念分析城市历史,并对复杂的计量统计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6)。

《贫穷与进步》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美国“新城市史学”的诞生。受塞思托姆的启发,大批学者也开始进行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并把重点放在美国其他工业城市,到了70年代初期,以研究城市人口发展规律、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为特征的“新城市史学”取得了重大成果。塞思托姆和另外一位史学家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主持编辑了《19世纪的城市——新城市史学论文集》一书,全面地总结了新城市史学的最新进展及其在城市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塞思托姆的“新城市史学”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单纯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新城市史学”代表了史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变。塞思托姆摒弃了长期统治史坛的“杰出人物史学”,首次把史学兴趣引向千百万无名大众,因而迎合了60年代激进主义政治的现实,受到新一代史学家的欢迎和效仿。在方法论上,“新城市史学”代表着计算机时代史学研究的新潮流,即将数理统计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建立可以应用于其他群体研究的模式和变量。总之,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新城市史学”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史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塞思托姆在《城市史学刊》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已经不再称自己为新城市史学家而为社会史学家。他指出:“现代城市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联系如此密切,并且成为整个社会体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于城市史的任何方面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7)

继塞思托姆之后“新城市史学”的又一进展体现在西奥多·赫什伯格(Theodore Hershberg)主持的“费城社会史研究课题”上。这是一个为期10年、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集体研究工程。整个研究围绕着费城这个美国东部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力图把社会流动性问题与其发生的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成果汇编成集,题为《费城:19世纪的工作、空间、家庭和群体经历》。(8)在导言中,赫什伯格批评塞思托姆过分强调社会流动性问题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它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赫什伯格认为,新城市史学与旧城市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视城市为变化的过程,而后者则视城市为静止的观点。换言之,城市并非事件发生的背景和陪衬,相反,城市是积极主动的范畴,常常成为事件发生的引导者和推动者。赫什伯格还认为,城市史研究应该注重城市系统中环境、行为和群体经历这三大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联系;变化和运动中的城市应该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表现城市的生命力,揭示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费城社会史研究课题”通过对费城的细致分析,构成了城市史学中独特的微观研究方法。该工程针对其研究对象——生活或者曾经生活在费城的250万居民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分别对工作、空间、家庭和群体经历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赫什伯格和其他研究者还调查了费城在1850、1860、1870、1880四年中城市住房、商业网点、工厂作坊和交通运输等状况,通过比较研究寻找该城市在数十年间的变化规律。参加费城社会史

课题研究的不仅限于城市史学家，众多的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加入其中，并且使用同一数据库进行不同性质的研究，取得了不同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城市史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综合运用吸收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人口学之长，使其对城市的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刻。

在新城市史学统治史坛的60和70年代，前面提到的史学家萨姆·沃纳独辟蹊径，运用一套迥然不同的史学方法研究城市。他侧重分析所谓人类行为发生场所的城市和城市建设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他的代表作《有轨电车的城郊：波士顿的成长过程，1870—1900》中，沃纳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有轨电车的发明和使用，是推动波士顿城区向郊区延伸从而改变人口分布格局的根本动力。他的研究方法更具有独创性，通过分析鲜为人知的波士顿三个郊区一共23000个建房许可证，他能够就建筑规模和风格、公共设施和市政建设以及邻里种族和阶级成分的构成作出许多可靠的判断，从而对美国现代城市的成长过程提供了大量的独特见解。

此外，沃纳对城市史学的方法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68年10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学术论文，题为“假如整个世界都是费城的话——城市史学的基本框架（1774—1930）”，这篇文章通过筛选几项可以统计的变量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模式，这些变量包括人口的增长，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区和生活区空间位置的相对改变，居民住宅区密度以及劳动力的组织结构。（9）

在《私有化城市：费城在三个阶段的发展》一书中，沃纳试图对上述变量理论进行检验。同时，他还引进了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概念“私有主义”。在沃纳看来，私有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私人财产所有权至高无上。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私有主义在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可以用来解释城市盲目建设、贫民窟和贫富悬殊等弊病。在1972年出版的另一部专著《荒芜的城区》中，沃纳继续了私有主义的命题，认为私有主义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使美国城市充满活力，但他强调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呼吁政府在城市规划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私有主义和城市规划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只有这样，美国城市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下去。（10）

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50、60年代单一的学术观点和方法独占史坛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史学家的兴趣涉及城市的各个方面：城市政治、新地区主义、城郊化和阳光带城市、城市规划、种族关系、城市工人阶级、城市造房和交通以及城市大众文化等等。本文下面的篇幅将用来对80年代美国城市史学的几个重要发展趋势加以简单介绍。

首先，城市政治寡头和改革者。这是“新城市史学”几乎完全没有探讨的问题。传统的城市政治研究把重点放在19世纪末期出现的城市政治寡头和与其针锋相对的城市改革者。传统的观点认为，寡头统治机器腐败不堪，代表少数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改革者们则高举民主大旗，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到了50、60年代，许多史学家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政治寡头不一定是公众的敌人，他们在推行民主政治、推动城市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不应该抹杀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相反，一些史学家对城市改革者的贡献产生疑问。他们指出，改革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非一个团结的联合实体。有些改革者本人就是政治寡头，另外一些改革者并不支持民主政治。因此，对改革者的贡献不能一概而论，政治寡头与改革者势不两立的观点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进入80年代，这个问题又在史学界展开第三次评价。受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史学家开始抨击寡头行善的机能主义观点。乔恩·蒂伏德（Jon C. Teaford）认为，真正在美国城市中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政治寡头也不是改革者，而是成千上万有知识、懂技术的专业工作者，在每项决策通过之前，政府部门都需要请教由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工程师、教授和律师才是城市建设的主导力量。相比之下，政治寡头和城市改革者的影响则逊色多了。

(11)

80年代的城市史学家还更加注重对美国城郊的研究。人口统计表明,近20年来,美国居住在城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居住在市区的人数。人口重心的迁移使城郊在后工业化的美国城市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自沃纳60年代开创性的著作《有轨电车的城郊》问世之后,关于城郊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不断涌现,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T. Jackson)所著的、曾荣获两项史学奖的《草坪边疆:美国城郊化》。这部著作首次从全美国角度对美国200年的城郊化历史作了综合分析。该书开始先介绍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工业化之前的“步行城市”,以及这种城市格局如何被新的交通工具和 Americans 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瓦解。自19世纪中叶以后,科技革命带来了运输方式的飞跃,起初的载人马车和后来的有轨电车无一不推动了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城郊扩散。到了20世纪,汽车的发明加速了城郊发展的进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又通过修筑高速公路,提供造房贷款和分期付款等措施积极支持和鼓励人们向城郊迁移,使城郊逐渐成为居住和工作的场所。总之,杰克逊的《草坪边疆》一书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发展了美国城郊化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特纳的“西部边疆”一直到杰克逊的“草坪边疆”,美国的城市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12)

战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所谓“阳光带城市”的兴起。“阳光带城市”指包括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在内的东南部各大城市和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为代表的西海岸城市。1950年以来,这些城市人口激增,就业率和人均收入有的已经超过基础雄厚的东部城市。此外,由于这些地区终年气候温暖,阳光普照(阳光带城市由此而得名),所以旅游业和娱乐业非常发达,大批美国人退休之后也搬迁到“阳光带城市”来安度晚年。卡尔·艾博特(Carl Abbott)在探讨“阳光带城市”兴起原因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将军事基地和训练设备设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国防工业比如军舰和飞机制造业也都集中在这个地区。联邦政府的大量军事开支创造了大批就业机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前来工作。这种兴旺势头经久不衰,造成“阳光带城市”的形成。(13)到1980年,美国最大的10个城市有5个在“阳光带”——休士顿、达拉斯、菲尼克斯、圣迭戈和洛杉矶。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不断南移,“阳光带城市”作用会愈加重要,史学家也会对美国城市发展史中这个饶有兴趣的现象有更深入的认识。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化的移民国家。城市移民史向来是美国城市史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著名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所著的《离根者:缔造美国民族的伟大移民运动史话》代表了传统观点。汉德林把欧洲移民描绘成被迫告别乡下,迁徙到陌生的都市的离根者。在美国城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里,这些新来的移民逐渐丧失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被美国主导文化所同化。(14)

近年来,城市史学界对城市移民过程、种族居住区的建立和移民文化生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在他的新著《植根者:美国城市移民史》中总结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欧洲移民定居美国以后,原有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虽然受到同化力量的强烈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恰恰相反,移民们不但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家庭关系和道德观念,而且还常常利用传统的价值观适应新的环境,向现存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挑战。博德纳列举了移民建造社区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论点。他写道,芝加哥市的“小意大利城”作为意大利移民定居美国后为自己建造的生活和工作区充分反映了意大利民族文化特点。事实上,“小意大利城”不过是在美国这个新的国土上建立的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罢了。它植根于欧洲传统文化,但又丰富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内容,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向多元化发展。(15)总之,历史学家们认为欧洲移民被同化不是普遍的现象。他们引入“涵化”这个概念来表明主导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初次撞击之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

的事实。“涵化”一词比“同化”更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是美国城市充满生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城市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史学家热衷研究的课题。大众文化涉及面甚广，各种文体生活，如体育、电影、电视、舞会、音乐酒吧等等，皆属于城市大众文化研究范畴之列。史学家试图通过对这些大众娱乐方式的研究，搞清在城市发展的某一阶段这些娱乐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冈瑟·巴思(Gunther Barth)所著的《城市大众：19世纪美国现代城市文化的兴起》一书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在该书中，巴思具体分析了五种大众文化形式：城市单元住房、都市报纸、百货商店、舞场和剧院。他指出，这五种大众文化形式随着美国现代城市的发展而产生，代表了现代城市大众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元化的国家，共同的文化娱乐方式才显得日益重要，因为大众文化方式可以帮助不同背景的城市居民适应紧张的、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此外，大众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人士和不同种族、性别和年龄的人们互相沟通和接触，有助于全社会人士接受和吸收某一特定的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化的传播在美国现代城市兴起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用不亚于工厂的兴建和政治机器的运转。(16)

简而言之，8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在许多重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与50年代到70年代的城市史学相比较，80年代的城市史学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全都得到发展，成为城市史学史上成果甚丰的时期。那么，今后90年代，乃至21世纪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呢？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美国城市史学除了保持上述各种研究的势头之外，还将在下列各领域有所发展和突破。

第一，比较城市史学。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美国城市史学不能孤立地研究，应该置之于国际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实际上，一些史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城市比较研究。布赖恩·贝里(Brian J. L. Berry)在其著作《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途径》中，把美国城市演变视为国际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与欧洲城市、日本城市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城市相提并论。他认为，推动全球城市化的动力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世界上许多城市有大量的共同性，探索城市的共同性有助于掌握城市的发展规律，了解其兴衰原因，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的城市系统研究框架(17)。此外，还有许多史学家侧重于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力图通过对各国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的异同比较，为研究美国城市史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丰富美国城市史研究内容，开拓其研究视野。拟定于1989年在中国召开的“中美城市史比较研究”讨论会，将成为美国城市史学比较研究国际化的有力证明之一。

第二，应用城市史学。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城市史学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计献策。不久前，美国城市史学的权威刊物《城市史学刊》出版了一期特刊，专门载文讨论如何借鉴历史经验，解决城市中能源、交通、垃圾、下水道等问题。史学家马丁·梅洛西在《论美国城市中的污染和改革》一书中提出的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主张受到许多市政官员的重视和采纳。(18)美国各大中城市所设的城市规划委员会中一般都有城市史学家的参加。可以预见，学术界和市政府在市政建设中的通力合作还会继续下去，应用城市史学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第三，城市史学方法论。首先，城市史学将会更广泛地吸收和运用相邻的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和社会学等会与城市史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城市史学跨学科的特点表现更为突出。其次，城市史学家将会更加注重城市的宏观分析，强调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使城市史作为一门社会学科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最后，城市史将与口述史相结合，从听觉上扩大城市史学的研究范围。康涅狄格大学的布鲁斯·斯特夫(Bruce M. Stave)教授对当代美国几位著名城市史学家进行采访后编辑了《城

市史学的形成》一书，成为口述史学与城市史相结合的首次成功的尝试。(19)同时，一些史学家还通过历史图片和照片研究城市的发展，充分利用形象的优势作为论点的有力说明，同样获得重大效果。对口述史学和历史图片创造性的运用将会极大地丰富城市史学的研究方法。

总之，以老施莱辛格的先驱性著作作为诞生标志的美国城市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历时50多个年头了。正如它的研究对象——充满活力的美国城市一样，美国城市史学在数十年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从老施莱辛格的奠基概论到盛行一时的城市传体史，从塞思托姆的“新城市史学”到沃纳对美国城市史独树一帜的贡献，从80年代城市史学在各个研究领域的突破到对其发展大趋势的展望，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美国城市史学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过程。可以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城市史学在研究内容上会不断广泛深入，在方法论上会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正是美国城市史学充满生机的奥秘所在。

注释：

(1)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87年10月16日。

(2) 阿瑟·老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论城市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纽约，1938年版；“论美国历史上的城市”(“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40年6月号。

(3) 理查德·韦德(Richard C. Wade):《城市边疆》(*The Urban Frontier*)，芝加哥，1959年版；贝尔德·斯蒂尔(Bayrd Still):《米尔沃基：一个城市的历史》(*Milwaukee: The History of a City*)，麦迪逊，1948年版；布莱克·麦凯尔维(Blake McKelvey):《水力城》，《花城》，《争取质量》和《一个冉冉升起的都市》(*The Water-Power City, The Flower City, The Quest of Quality, An Emerging Metropolis*)，纽约，1948年版。

(4) 大卫·韦伯(David Weber):《城市研究博士论文集》(*Dissertations in Urban Studies*)，安阿伯，1974年版，第5—8页。

(5) 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 Thernstrom):《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19th-Century City*)，坎布里奇，1973年版。

(6) 布鲁斯·斯特夫(Bruce M. Stave):“城市史：多城的故事”(“Urban History: A Tale of Many Cities”)，载于《历史杂志》(*History Magazine*)，1987年春季号，第34页。

(7) 布鲁斯·斯特夫(Bruce M. Stave):《城市史的形成》(*The Making of Urban History*)，贝弗利希尔斯，1977年版，第221—246页。

(8) 西奥多·赫什伯格(Theodore Hershberg):《费城：19世纪的工作、空间、家庭和群体经历》(*Philadelphia: Work, Space, Family and Group Experience in 19th Century*)，纽约，1981年版。

(9) 萨姆·沃纳(Sam Bass Warner):《有轨电车的城郊：波士顿的成长过程，1870—1900》(*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 1870-1900*)，坎布里奇，1962年版。又见“假如整个世界都是费城的话——城市史学的基本框架”(“If All the World Were Philadelphia: Scaffolding for Urban History, 1774-1930”)，载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8年10月号。

(10) 沃纳:《私有化城市：费城在三个阶段的发展》(*The Private City: Philadelphia in Its Three Periods of Growth*)，费城，1968年版。又见《荒芜的城区》(*The Urban Wilderness*)，纽约，1972年版。

- (11) 乔恩·蒂伏德 (Jon C. Teaford): 《未通报的胜利: 美国的市政府》(*The Unheralded Triumph City Government in America, 1870-1900*), 巴尔的摩, 1984年版。
- (12) 肯尼思·杰克逊 (Kenneth T. Jackson): 《草坪边疆: 美国城郊化》(*The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 1985年版。
- (13) 卡尔·艾博特 (Carl Abbott): 《新城市美国: 阳光带城市的成长和政治》(*The New Urban America: Growth and Politics in Sunbelt Cities*), 查珀尔希尔, 1981年版。
- (14) 奥斯卡·汉德林 (Oscar Handlin): 《离根者: 缔造美国民族的伟大移民运动史话》(*The Uprooted: 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 波士顿, 1972年版。
- (15) 约翰·博德纳 (John Bodnar): 《植根者: 美国城市移民史》(*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布卢明顿, 1985年版。
- (16) 冈瑟·巴思 (Gunther Barth): 《城市大众: 19世纪美国现代城市文化的兴起》(*City People: The Rise of Modern City Cul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纽约, 1980年版。
- (17) 布赖恩·贝里 (Brian J. L. Berry): 《比较城市化: 20世纪的不同途径》(*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纽约, 1984年版。
- (18) 马丁·梅洛西 (Martin V. Melosi): 《论美国城市中的污染与改革》(*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奥斯丁, 1980年版。
- (19) 布鲁斯·斯特夫 (Bruce M. Stave): 《城市史学的形成: 以口述史学研究城市史学》(*The Making of Urba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through Oral History*), 贝弗利希尔斯, 1977年版。

“太平洋的东部首府” 洛杉矶 (一)

——一个被低估了的美国城市

王受之

1988年2月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有一组专题报道,冠以大字标题“太平洋世纪”(The Pacific Century),惹人注目。而其中一篇关于洛杉矶的文章,更使人受到启发。作者现在洛杉矶一所大学当教授,对这里的“中国城”、“小东京”、“小西贡”、“韩国区”已有些熟视无睹,但并没有把这个巨大的城市放到21世纪——太平洋盆地的世纪去想、去看,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因此发了愿,在授课之余去钻图书馆、找专家谈、开车看。一个多月以后,居然也真的对美国西部海岸这个大都会得到一种全新看法。一方面是新奇——真不知这个“城”有那么多背景与潜在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则是感到压力——国内实在很需要及时注意到它的存在意义,以及它在“太平洋时代”将会起到的作用。因而在早春的酷暑之中(这里3月底气温高达36℃—38℃),写下这篇杂文、游记、评论三不像的东西,目的在于使大家对洛杉矶有所认识,有所估评,有所行动。

洛杉矶 (Los Angeles) 是西班牙语“天使”之意, 美国文人时而戏称之为“天使之城”(The City of Angeles)。华人, 特别是广东人图其方便, 称之为“罗省”, 而当地的美国人则简称为 L A。

L A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 纬度大致与我国的上海、日本的东京相近。它的电影业雄居世界第一, 它的高科技使世人为之侧目。它的高等教育在美国位列前茅, 它的工业力量是美国城市中最强的之一, 它的旅游业名登榜首, ……它拥有无数的“第一”, 而最为特殊的是: 它是美国大城市中最年轻的一个, 也是美国最少传统束缚的一个大都会。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 洛杉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有不少是被一般人忽略了的。而这些变化之深之大, 远远超过美国的任何一个都市。洛杉矶目前在经济与文化影响方面一跃而居美国第二, 仅次于纽约, 并且有急起直追之势。以进出口而论, 1986年洛杉矶港口(包括长滩)总处理货运量为5800万吨, 已经超过纽约加上纽泽西港口合起来的2100万吨, 全美第一。在银行存款方面, 洛杉矶也已超过芝加哥和旧金山(三藩市), 纽约勉强高出洛杉矶一点点。1980—1986年间, 洛杉矶存款增长率为65%, 而纽约在同期只增长了7%。照此趋势, 一二年间洛杉矶就会大大超过纽约, 而在存款总值上达到美国第一。更有一点, 洛杉矶每年移入总人数大大超过纽约。从身无分文的墨西哥劳工到日本的大企业家, 从中西部失业工人到台湾来的地产商, 从货车司机到各国电影工作者, 简直无所不包。这不但在美国, 就在全世界也是一种独特现象。不少政治学家、政治地理学家、经济学家认为, 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 洛杉矶将会成为21世纪西半球最重要的都会。

洛杉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在各方面向美国其他大都会挑战的。洛杉矶目前已显示出来的许多问题, 是美国整个社会未来几十年中将会面临的问题。比如, 白种人(指非西班牙语系的白种人)在这里已成为少数民族; 多种族社区共存所产生的复杂性; 城市日益膨胀造成的交通、通讯、社区计划、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犯罪率增高等问题, 比别的美国城市更为严重。其经济增长之迅速造成其他因素的“不同步”, 也是一个未来性的问题。中产阶级在这里虽然仍为中坚力量, 但贫富区别的日益扩大则是一个新问题。在豪华而一尘不染的“小东京”市区, 你会被几个无家可归的叫化子拦住要饭。我的一位同事、著名的艺术史与社会学史教授诺尔曼·克莱因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 洛杉矶是一个过去与未来的城市, 它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狄更斯笔下的那种贫富悬殊的社会, 又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未来大都会。

我还记得两年前第一次看见洛杉矶时的惊奇。当时在烟雨蒙蒙的西雅图起飞, 飞机上放映的电影索然无味, 我就坐到窗边去看万米以下的雪山。忽而看到一片淡灰色大格子式的市区, 机上播音员介绍说前面即是洛杉矶了, 过15分钟可以到达机场。15分钟之内, 这架飞机一直都在“大洛杉矶”的上空高速穿越。15分钟的飞行! 下面全是整整齐齐棋格一样的市区, 公路, 一间间独立住宅, 矮矮的植物, 半沙漠状的地貌, ……这么大的一个“城”, 目前在全世界恐怕也仅此一个。

洛杉矶大都会是由几十个城市组成的, 其中包括洛杉矶市中心区、好莱坞、比华利山、蒙特利公园、阿罕布拉、帕萨迪纳、圣·莫尼卡、温图拉、长滩、安那罕、勒·芒特、阿卡迪亚、林肯高地、英格伍德、鹰岩、格兰戴尔、坎顿、圣·安那、布尔班克、河边市等等。各个城区面积不等, 大的比我国大城市一个区(如北京的东城、西城、海淀区, 上海的徐汇、静安区, 广州的越秀、荔湾区)大一些, 小的则与这些区相仿。这些城区之间用十几条全封闭式的超级公路相联, 把大市区组成一个整体。从行政上讲, 洛杉矶大都会还包括洛杉矶县、橙县、河边县、圣·巴拉丁诺县与温图拉县。我们的北京市也有房山、密云、昌平等县, 论

面积不会小于洛杉矶大区。不同的是,北京的县主要是农村,而洛杉矶则是连绵不断的现代城市。整个大洛杉矶区总人口为1 2 6 0万,洛杉矶市区只占2 5%。

洛杉矶市区面积相当于一个每边长3 0公里的方块,相对来说不算大,但极具多样性。市中心商业区和摩天大楼与纽约曼哈顿岛下城无二;清一色黑人居民的瓦茨区,则因6 0年代的城市暴动闻名;连绵数里的富裕中产阶级居住区圣·菲尔南多山谷清静可人,总人口比达拉斯一个市还多;唐人街充满了广东色彩;再走过几个街口就进了“日本城”,坐在日本料理馆中,你可以计划下午去极尽豪华的威斯特伍德区去选购意大利时装……。这是一个国际城市,美国有的它都有,世界有的它也几乎都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在此尝到中国各地风味,甚至蒙古烤肉、西安羊肉泡馍也能找到。这个都市,很难讲哪一种族的人占大多数,只能按区而论。就这点讲,LA倒与纽约有相似之处。

其实,“城市”、“市中心”(Downtown)、“郊区”这些字眼,用到洛杉矶都不适当。这个大都会没有通常意义的市中心,也没有通常意义的郊区。郊区在这里是城市,城市在这里也是郊区,都是相对于其他的中心而言。地理学家苦于找不到适当字眼来描述这个城市,最后,南加州一些地理名称专家称这里各个小城为“星系”(Constellations),而称大都会洛杉矶为“银河”(Galaxy)。

二

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1 9 8 8年有一期载文介绍洛杉矶,文中说这个城市很快将在各个方面成为美国第一。确实,它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政治影响也日益增强。我国于同年(1 9 8 8) 3月5日在此设立了总领事馆,就在中国总领事馆所在的豪华的威尔夏大道上,已设有超过5 0个国家(地区)的外交机构。这个“第一”确是少见的。

洛杉矶东部是高达3 0 0 0米的圣·加布里尔山脉,山外则是干旱沙漠区。西边面临太平洋,北部温图拉县是半干旱地带。因此,这个城市的发展主要朝向东南部,即圣迭戈的方向。目前边缘距离洛杉矶中心约有1 0 0公里,其中橙县发展最快,圣·巴拉丁诺县与河边县也颇为可观。

洛杉矶的发展模式是集中发展1 8个“都市村”(Urban Village),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一般都市,以各种商业、零售业、房地产业以及娱乐业为主。在这1 8个“都市村”中,有几个是称得上古老的。如帕萨迪纳、好莱坞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其经济重点都十分固定,市政建设完善。而另外一些则十分新,有些还正在建设之中。如洛杉矶国际机场区、柯斯塔一米萨等。这几个区才出现一二年,其发展与设计集中了美国都市计划的经验与崭新理论。

在这1 8个“都市村”之中,最主要的发展重点当推洛杉矶市中心区。这个区在5 0—6 0年代几乎荒废,成为贫民栖身之处,但7 0年代以来大兴土木,摩天大楼林立,英语电影院、豪华公寓、豪华大旅馆、各种文化中心和艺术中心纷纷建成开张。如新近开放的当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已成为美国五大现代艺术馆之一。新的商业楼宇更是层出不穷。每到午餐时间,大群衣着入时的白领阶级雇员像一群群鸟儿云集在市中心公园、酒吧、快餐店中,确有一种升平与繁荣的景象。

洛杉矶市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与纽约相似的国际性中心。这个城区的百老汇大道一段,是西班牙语的购物中心,芝加哥以西地区的同类“中心”以这里为最大。再走几步,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在西海岸的各种办公机构,这是除首都华盛顿以外美国最大的联邦政府中心。“唐人街”、“小东京”、一个像纽约索霍区那样的艺术家社区、一个全美国最大的成衣业中心、一个美国首屈一指的鲜花批发中心,都在这个区内,令人目迷五色。在就业方面,这个市中心却与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的市中心不大一样。由于洛杉矶大都会十分庞大,这个中心

区的就业人数只占全市就业总数的4%。由于历史短,这个市中心也不像其他都市的中心有那么多历史遗迹可供瞻仰,有那么多古老场所供人游览。这一点,使这个中心与香港中区或东部尖沙嘴颇有相似之处。

这座“城”建于200年前,当时是干旱沙漠中一条小河——洛杉矶河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之后移民日益增加,市区扩大,便建了一条小铁路,公路亦随汽车业兴盛而发展起来,市中心区因此形成。如果现在想去领略那条洛杉矶河的风光,你能看到的只是一条干涸的水泥板大沟。现在,洛杉矶90%以上的用水都得利用管道、运河从外州进口,那条小河只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之中了。

洛杉矶18个“都市村”的兴盛与市中心区的复兴,标志着这个城市经济的发展。1987年,洛杉矶生产总值(包括产品与劳务)为2500亿美元,使得这个城市按总值计算可以排到世界各国的第11位,超过澳大利亚、瑞士或印度的全国生产总值。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南加州政府协会(SCAG)1986年8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个城市的就业机会,会从1984年的600万个增加到2000年的800万个。洛杉矶的主要经济骨干为宇航工业、航空工业、娱乐业、金融业、制造业、医疗卫生业、政府部门业、国际贸易业、石油加工提炼业、房地产业、旅游业、批发与零售业等。由于全市有足够的面积发展,洛杉矶的制造业已居于美国第一位,而零售业则超过了人口1800万的纽约市,也是全美第一。

不少人都会认为好莱坞的电影业是这里经济的主干,其实所占经济比例很少。这个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包括电影业与电视业),在本地总共雇佣7.5万人,总经济收入占洛杉矶的1.4%。

洛杉矶的金融业虽然算不上全美第一,但已相当可观。10年以前,洛杉矶超过旧金山而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金融中心。1980年,它又以存款额超过中西部最大的金融中心芝加哥。1985年中,洛杉矶银行存款额升至1300亿美元,位居1750亿美元的纽约之后,成为全国第二金融中心。从1980年到1987年,洛杉矶存款数急剧上升了750亿美元,而纽约在同期反而下降了。

正因为金融、信贷市场如此好景,各大银行都力争在洛杉矶建立分支机构。1986年间,一共有173家非加州的银行在此设有支行,其中更有126家为外国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运通银行的摩天大楼,已雄居于洛杉矶中心区。加州政府决定,东海岸与中西部的银行从1991年开始可在本州开展全面银行业务。到那时,竞争肯定更为激烈。

制造业是洛杉矶另一经济支柱。洛杉矶的宇航工业居于世界第一,美国航天计划中大部分飞行器都在此制造。美国空军的大部分飞机、飞行器、导弹以及相关设备也在此生产制造。美国最大的航天航空公司,如诺思罗普(Northrop)、洛克维尔国际集团(Rockwell International)、TRW等,都在此设有大办公行政中心、设计中心、科研中心、工程中心、制造工厂。美国发射的卫星大多在此进行总装配,经10号国家公路运到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世界闻名的宇航研究中心——美国喷气推动实验室(JPC)就建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一个山谷中,我每天开车上班时都看得清清楚楚。宇航工业雇员占洛杉矶就业人数7.7%。

汽车业在洛杉矶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经济结构。这里虽然只有一家汽车装配厂,但已使洛杉矶被称为“世界汽车业的中心”或“西部底特律”。此地公路网极为发达,而人们的购买力又相当强,汽车换代极快,因而被认为是世界汽车潮流的中心。当年在洛杉矶流行的汽车款式,翌年就会在美国与西欧其他国家流行。正因如此,八家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丰田、本田、五十铃、三菱、马自达、速霸、日产、达得桑),南朝鲜的“现代”,联邦德国的大众、BMW、奔驰、波什,瑞典的富豪、萨伯,意大利的菲亚特、奥迪—罗米拉等,都在这里设立庞大的设计部与美洲总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与克莱斯勒)更拥有全套人马,

在洛杉矶设计未来汽车。我执教的这个学院，就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外型设计教育中心，20%的学生来自日本、南朝鲜、台湾。在教员咖啡厅吃午饭时，每天可以看到世界各大汽车公司的代表到来拉关系，从学生中物色未来的设计人员。那种各国人物混杂，谈生意之声不绝于耳的情景，实在是我以前在别的高等院校中未曾见过的。

洛杉矶大都会同离此不远的“硅谷”一样，是美国目前尖端科技一个急速发展的中心，集中有大量最高级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就以帕萨迪纳一所几千人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为例，在几百名教员之中居然有七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实在令人惊奇。洛杉矶的尖端科技，主要项目包括军事与宇宙通讯设备、电子、导弹与宇航器、计算机等。德佩利技术学院（The DeVr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项调查报告估计，洛杉矶到本世纪末将成为美国各都市中尖端科技绝对领先的城市。

总的来说，制造业占本市总就业数的22%。虽然从全世界看，制造业在未来20年内会继续有所减退（美国经济学权威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说，到2000年，在制造业中工作的人员比例会从目前的20%下降到10%）。但洛杉矶的制造业发展却看好，比例会维持在20%上下。

为什么全美国的制造业都在走下坡路，而洛杉矶反倒发展呢？原因很简单：洛杉矶是美国唯一能把第一世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同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大都会。先进技术与管理是美国固有的，但由于劳动力日贵，大多数厂家无法与南朝鲜、台湾、香港等地竞争，因而纷纷倒闭。洛杉矶则得天独厚地不断有大量廉价、低技术劳工从亚洲、拉丁美洲移入。洛杉矶地区之大，又使投资者能以低价买到地皮建厂。由于技术与廉价劳工、大面积厂区三者结合，洛杉矶某些厂家不但可在美国称雄，并且居然在竞争中反而击倒南朝鲜、台湾等同类厂商，真是当代一大怪事。去年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一位教授对本市劳工情况发生兴趣，于是要求一些厂主让他访问市中心区附近的几个工厂。厂主答应了，但在途中要用布遮着他的双眼，使他无法知道这些厂的准确位置。等到把遮眼布解开后，他惊奇地发现身处一个设备极为简陋而效率相当高的汽车轮胎总装车间内。四周的窗户全部都涂黑，使外面无法看见车间内的工作。一大批不会讲英语的南美洲人与亚洲人正在紧张地工作。防止工业金属灰尘的全部设备，居然仅是一人一块布，用来遮住口、鼻。这简直是19世纪的作坊，或第三世界落后的工厂。这种条件在美国是非法的。更使这位教授震惊的是：所有产品在组装完毕之后就打上“巴西制造”的字样，装入大箱，发运到底特律！

洛杉矶工业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一个为主的工业。大多数美国城市都有其领导性的产业，如底特律的汽车业、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而洛杉矶的工业则几乎没有一个是占大比例的，各个产业比例大致相仿。另一个特点是这些产业之间有休戚相关的共生关系：石油业、航空业、航天工业几乎是一条线的，而娱乐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也息息相关。

洛杉矶特定经济门类的大升大降，的确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国防开支一减，失业人口立即增加，高技术人员流入低技术门类。一个开电脑机床的工人失业后去快餐店当跑堂，是司空见惯的事。电影业也是这种大起大落的部门之一。一部片子卖座好，公司即大力投资拍下一部，就业急增；一部片子失败，立即裁员。前些时卖座极高的几部片子，都造成一时内的好莱坞高就业。如写美国空军生活的《王牌中队》（*Top Gun*），写警察的《比华利山警官》（*Beverly Hills Cop*），写一个澳洲大汉与一个纽约女记者恋史的《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等都是此类。但由于耗资4100万美元的《天堂之门》（*Heaven's Gate*）失败，一下裁员过千，差点把大名鼎鼎的联艺（United Artists）搞垮了。这种升沉的就业状况造成洛杉矶另一特点：工人就业大量按月、周计算。大约90%的本地娱乐业、电影业雇员是这种月工、周工，甚至按日算的日工。这类人员一年的就业时间大约为8—10个月左右。

洛杉矶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大都会。几乎一切都被视为赢利的行当。我上周曾与当地几个大学管财务的负责人共进工作午餐，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教育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商业。这

个地区从高科技中心、大企业，到房地产、快餐连锁店，都是为了赢利这一个目的。只要有钱，什么都干。洛杉矶为此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色情工业中心，所生产的色情录像带行销世界。

说明洛杉矶商业性特点的最好例子，是198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体育比赛盛会由私人公司承包是有史以来头一次。结果，这届奥运会壮观至极。其开幕式、闭幕式的精彩，各项赛事、设备与服务的完善，都是奥运史上“史无前例”的。而更无前例的是它的赢利：总收入6.5亿美元，扣除费用支出，赢利率为33%，亦即是说净得2.13亿美元利润。而早几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奥运会耗资33亿美元，使这个城市与加拿大直至现在还负担着债务。洛杉矶奥运会后，世人对洛杉矶人的经营之精明刮目相看。奥运主持人尤伯罗思更被人视为洛杉矶最杰出的经营家。

讲到经营，洛杉矶还有一个大特点：它的自立公司、自我创业的人数超过美国任何一个城市。自己开设一家公司，从事经营、投资、法律、计划、设计、扩展等方面的咨询业务，在洛杉矶是最时髦最热门的。这批人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不甘居人门下受雇于人，便到市中心区、比华利山、好莱坞、威尔夏大道、帕萨迪纳市等地的商业大厦之中，租一二间办公室，出售自己的知识与才干，所得利润颇为可观。他们的业务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主要的有电脑软件编排、财政金融计划、律师业务、电影与电视剧本撰写、房地产咨询、室内设计、高科技研究等等。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在家里从事工作的，因此造成洛杉矶电子通讯网络的高度发展，同时又出现一批供公众使用的实验室、办公中心、文件处理中心、资料与数据中心。我曾到市郊山区中访问过一位“自我雇佣”的地质学家。他住在山谷中两间被大树环绕的木屋中，利用卫星天线、电脑、电话、电话传真与外界相通，指导三四千公里以外加拿大的具体查矿人员行动。踏勘结果用卫星传给他，他再用电话与大数据中心电脑联结，进行综合计算。几个反复之后，他就查到一个大金矿，加拿大公司已开始进行初步试采，找到品位相当高的矿石。这家公司把给他的酬金通过电脑从加拿大多伦多存入他在洛杉矶的银行帐户内。当我访问他时，他拿出一小瓶矿石给我看，这是他找到的——金矿在将近4000公里以外的加拿大冻土之中，而他足未出门！这位仁兄可以说是这种“自我雇佣”、以知识吃饭的洛杉矶新一代的好例子。

由于“自我雇佣”日增，虽然洛杉矶经济发达远超其他城市，但在美国《幸福》（#FKFortune#FS）杂志每年列出的全美500家最大公司中，洛杉矶只占17个；500家最大的服务型企业中只占14个，500家最大金融集团中也只占18个。利润并不是全部进入大公司，而是分散的入了那些有才干的“自我雇佣”者的口袋。由于“自我雇佣”的人可以为市外大公司服务，因而大公司亦无需在此设立分支机构。除汽车业外，美国500家大企业在在此有总部、分部的极少。表面看来，这种情况好像是洛杉矶经济不景气的象征。事实上却正表明这个地区有极其活跃、极有生机的一种新型经济活动。

外国公司、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洛杉矶，是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现象。如果你在洛杉矶市豪华的办公—商业中心走走，人们会告诉你这一栋摩天大楼是日本人的，那一个旅馆是南朝鲜人的。由此导出一个问题：未来的洛杉矶将是谁的？根据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报纸《洛杉矶时报》估计，市中心区75%的大型建筑是外国人所有或控制的，这个比例在过去的八年之中升高了25%。日前在学院遇到一位来访的广东经济界人士，据说广东也计划在市中心买大楼了。东部地区的一些大财团也到此发展。不少产业已易手到纽约人手中。洛杉矶银行界人士已担心东京、纽约金融中心的人有一天控制这里的市场。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比如总部在纽约华尔街的第一波士顿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已是南加州最大的投资银行。律师界也担心纽约的律师会把触爪伸进洛杉矶参与争夺。到1987年，已有40多家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在此开张，大多是近一二年新设的。

港口贸易是洛杉矶另一个大经济支柱，为这个市带来巨大的财富。洛杉矶有两个港区

——洛杉矶港与长滩港。这两个港合称洛杉矶港，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货运中心。两港在圣·比德罗湾相联，但行政管理分别属洛杉矶与长滩两个区。货物进出额自1983年的340亿美元急升到1986年的610亿美元，大大超过纽约港加上纽泽西港的总和。在这个总量中，国际贸易占有相当比例，1985年从港口与洛杉矶国际机场两地进出口的国际贸易总值达到638亿美元，大大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全年外贸总额。

洛杉矶—长滩港成为全国最大港口的原因是，美国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比大西洋地区高30%，而美国太平洋贸易中的60%是通过洛杉矶两个港口和洛杉矶国际机场进行的。太平洋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号称亚洲“四小虎”的香港、台湾、新加坡与南朝鲜，号称“当今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日本，正在崛起的中国沿海经济区，都在此大圈中。泛义的太平洋地区占有世界人口43%，连苏联算在内在有27个国家与地区，这个地区估计到1995年将占有世界生产总量的27%（1970年为21%，1980年为24%，据加利福尼亚州商务部资料）。而这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以每一星期30亿美元的惊人速率在增长。这种经济奇迹，当然直接会在洛杉矶造成奇迹样的兴盛。

10年以前，长滩地区完全是一个贫民窟，大多数白领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如他们所谓的企业、商店都纷纷移出此地。长滩市中心到70年代中简直像个鬼城。而今天，长滩市中心大兴土木，超达20亿美元的新建工程四下开张。长滩市位处洛杉矶市区与长滩港之间，一下成为极理想的居住区、商业区、贸易区。白领阶级纷纷移入，外国企业纷纷购置产业。在退役而改成旅游旅馆的旧船“玛莉皇后”号停泊的海边，将兴建一座占地19.8万平方米的世界贸易中心。这是一个集商业、贸易、旅馆、零售业于一身的综合性大楼。美国与日本合资成立的IDM-Kajima建筑公司在此承包了大量建筑工程。

在洛杉矶的发展中，亚洲的投资者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主要投资于制造业、贸易、房地产。洛杉矶有各种亚洲人的大型社区。相比之下，旧金山华人多，但单有华人，而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以及其他亚洲人的社区则很小，甚至没有，这是为什么旧金山经济实力日益不敌洛杉矶的原因之一。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在此地的投资相当成功。他们不求“急功近利”，而着意放长线，以长远眼光进行投资。比如地产投资，美国地产商投资在每一项的第一年都要收回9—10%的利润，而日本商人则只要6—7%。因此，亚洲人在洛杉矶被称为“可怕的竞争者”。

对外贸易、外国投资、产业兴旺、金融活跃、移民激增，这几个因素使得洛杉矶一跃而成为美国西海岸经济、金融的中心。不少银行家与经济学家预言这个城市将要与纽约、伦敦、东京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级的经济核心。如果按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待续）

从新政到里根经济学

——读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

徐静之

—

30年代经济大危机给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罗斯福临危受命入主白宫，以拯救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美国经济。罗斯福下车伊始就提出的“新政”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开始，也是资产阶级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向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一个大转折。80年代，保守主义的里根经济学的兴起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清算，这又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一个转折，但这决不意味着放弃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思潮居统治地位，新政的基本精神——政府干预经济政策一直在延续和发展。

50年来美国经济和政府干预政策的发展演变是每一个研究西方经济的学者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同志所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一书中，得到了鞭辟入里、淋漓尽致的阐述。

近年来论述美国经济的论著可谓多矣，它们各具特色，自成一家。然而这部洋洋77万言巨著从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揭示了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客观发展规律。

作者近年来多次赴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和访问，接触了许多经济学家、企业界人士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在掌握大量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后才完成了这一力作。它的最大价值正如作者所说的“美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决定了研究美国经济的重要性。研究它将为我们理解整个西方经济提供一把钥匙。对于锐意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我国来说，要认识西方，理解西方，扬弃其糟粕，研究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从新政到里根经济学的两个转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两种经济思想和政策虽有重大区别，然而也有割不断的联系。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也不是突发性的，而是一个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将近半个世纪的凯恩斯经济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出来，直至70年代导致了严重的停滞膨胀，使美国经济的衰败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里根的前任们尽管在经济政策上做些小改小革，但终究没有挣脱凯恩斯主义的羁绊。

美国经济在里根入主白宫两年以后开始全面复苏，到现在为止，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长达六年之久了，这是美国在战后以来最长的一次经济景气时期。正如里根在1988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说的“这届政府的政策已经促成创纪录的经济扩张——美国在和平时期最长的一次。在经济扩张中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丰厚的收益遍及各个行业和各种人口组合，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五年中上升了近23%。在当前经济的扩张中，就业的有力增长

与低通货膨胀率、高生产率增长相结合，意味着美国人民生活水准的上升”。

美国经济的持续回升与国内外许多客观的有利因素有关，但是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里根从30年代实行新政以来的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立场撤退，把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缩小到最低限度，可以说里根经济学是50年来保守主义回潮的顶峰，里根的信条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干预而主要是创造出一种良好的宏观环境，让企业家自由发展。但如果认为里根经济学是萨伊定律的复活，那么就是对里根经济学的最大误解，凯恩斯主义在80年代的美国依然没有被彻底抛弃。里根经济学中包含了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它不同于它们，然而又来源于它们，其根本特征在于它的综合性。这也决定了里根经济政策不可能完全放弃经济干预措施，它与新政以来历届政府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区别仅仅是干预的程度和角度不同罢了。里根经济学与实践中的里根经济政策并不是一个概念，二者的不合拍并非里根本意，而是由经济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矛盾所致。作者对这一矛盾的分析是很正确的：“里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多的不协调。从里根第一任期起，他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就不是反干预的中立政策。进入里根政府的第二届任期，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节就更加露骨，这些行动不仅是对国内经济的干预，而且是与盟国共同协调行动对国际经济的干预。这些事实说明，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节已经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里根政府理论上反对国家干预，实际上并没有抛弃干预”，而里根政府与罗斯福以来历届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差别在于对政府力量的运用不同，以及处理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策略不同”。

三

美国政府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宏观调节的主要工具是财政和金融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的55年中，财政赤字年就占47年，人们认为罗斯福和里根都是积极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人们也不禁要问里根保守主义表现在财政政策方面究竟与过去的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有何不同？

作者的论述给我们以启迪，罗斯福和里根的初衷都是主张平衡预算的，新政时期是由不自觉地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认为赤字财政是新政的主要政策手段，并把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误解。1937年的经济危机和凯恩斯主义正式出笼以后，罗斯福才逐渐自觉地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而里根实行赤字财政却是迫不得已。作者评论说：“有人说里根奉行的是赤字财政政策，是有意识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他希望看到的是预算平衡而不是巨额的财政亏空。”里根大赤字的原因是供应学派理论和政策的落空，减税没有刺激投资、储蓄和劳动生产率，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又影响了税收的增长。削减税率、巨额军事支出、利息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也促成了里根任期的巨额财政赤字。书中还论述了一个重要的产生赤字的原因，即里根任期内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这样使公众纳税等级爬升而增加税收成为不可能。里根经济政策的四个目标是：（1）减税，（2）减少政府支出，（3）放松对企业的过多管制，（4）反通货膨胀。八年的实践证明，减税和减少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是里根所始料不及的。

货币金融政策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又一主要杠杆，然而和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一样，美国的货币金融业也是经过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干预三个发展阶段。金融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是自由资本主义货币信贷制度在加强了金融资本统治的同时，又强化了资本主义矛盾，加深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从新政开始，各届政府开始对金融业进行干预，不断实行金融和银行制度的改革。

书中指出，联邦金融政策50多年来经历了3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大改革，同时也是两次转折。新政以来的金融政策和80年代以后里根政府的金融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财政

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其作用主要是“通过对货币流量的调节和利率高低的调整来促使经济收缩或膨胀”，而后者是“金融杠杆在经济中第一次显示其独立作用的时期，在不放弃加强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放松对信贷活动的限制，鼓励竞争”。从实行的战略目标来看，前者实行的是严格控制利率的战略，后者是控制准备金增长目标区的折衷战略。

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的宏观货币政策是以“刺激总需求”“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把扩大货币供应量做为经常使用的手段。80年代的金融改革主要解决宏观控制的基础不完善和信贷规章限制过死的问题。另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力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一个目标之内，而不考虑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以及可能出现利率急剧上升的后果”。里根上台七年多，其金融政策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这是里根政府值得夸耀的成绩，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6年的1.1%。

里根政府的金融政策所取得的效果尽管得助于外界的有利因素，并不是尽善尽美，但其控制货币供应量、着重扼制通货膨胀、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环境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控制物价、充分发挥货币金融这一杠杆的调节作用时参考和借鉴。

四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美国资本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强化所带来的矛盾逐渐尖锐，那种通过供求关系和利润规律起作用而自发形成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了扭曲，30年代的大危机就是对这种扭曲的清算。

新政以来政府调节产业结构的政策就是为了要解决其中的众多矛盾，书中把这些矛盾归结为：第一，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之间的矛盾；第二，垄断资本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第三，基础设施赶不上垄断资本扩张需求的矛盾；第四，国内市场不足以容纳垄断资本扩张的矛盾；第五，垄断资本为追求利润而造成新老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国民经济中三级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政府的干预是分不开的。农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公用事业、商业、服务业和小企业中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和规模结构都有很大变化。美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高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美国经济的作用表现为：第一，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二，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扩大了就业范围，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效益；第三，使新行业、新产品不断出现，使生产需要和消费需要得到了更好满足。

对美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演变以及政府的调节进行透彻的论述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研究一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以探索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而人是生产力中的主要要素，在阶级社会，人又是分为不同的阶级的。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美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构成了主要的阶级。“资本主义再生产既是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又是贫富悬殊和各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不仅要保证垄断资本的不断扩张，而且还要着重解决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如：两极分化、贫困、失业、保健、住房、种族歧视等等问题。

新政以来，美国政府利用税收、福利支出和信贷等政策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也缓和了财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促进因素。多年来，美国是一个政治上较为安定的避风港，世界各国的资本纷纷流入美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寻求这里较为安全的投资环境。

美国政府的福利政策只能缓和阶级矛盾，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前提以及发展的结果所带来的贫富之间的差异。书中分析了这种差异的现象和原因，提出各阶级之间

有生活水平差别、收入差别、财富持有量差别和资本持有量差别几个概念。表面上生活差别最小，它掩盖了不平等的实际差距，这是由于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消费信贷政策所致。而资本持有量的差别最大，它处于主导地位，是各种差别的根子。而正是这一差别决定了人们的阶级地位。这种分析方法为我们分析西方国家阶级的构成变化和矛盾以及政府干预收入分配政策的实质和结果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

50年来，美国垄断资本不断冲破民族国家界限向世界扩张，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对外投资政策促进了这种扩张。可以说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沉浮和变迁无不与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关，而且在当代，这种政策越来越与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了，当然这也是国际经济联系的不紧密以及矛盾的层出不穷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半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描写一个国家50年经济发展的书甚至算不上一部经济史著作。然而陈宝森同志的这部巨著概括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50年，这50年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经济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时期。它描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也为我们研究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的经济作用提供了一部最详尽的百科全书。在我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今天，认真学习和研究它是大有裨益的。

1987-1988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作者名之后为年份、期数)

政治·法律类

- “争取正义乐队的指挥”：小马丁·路德·金牧师（李道揆 87①）
里根上台执政的社会历史背景（刘绪贻 87②）
里根之后的美国政局（张毅 87③）
试论美国宪法的限权政府原则（李道揆 87④）
最高法院与美国宪法的发展（张毅 87④）
麦迪逊与美国宪法（曹德谦 87④）
美国政党制度缘起（师枫燕 88①）
简析美国联邦行政机构的政治地位（金灿荣 88②）
战后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李存训 88②）
美国新右派初探（刘绪贻 胡金平 88④）

外交·军事战略类

- 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王缉思 87①）
评八十年代美苏关系的发展（张也白 87①）
美苏在战略武器上的斗争（吴展 87①）
缓慢的解冻
——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资中筠 87②）

-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中文版序（〔美〕韩 德 87③）
 美国外交决策的特点（张也白 87④）
 略论美国战后外交的若干特点（资中筠 88①）
 核威慑（吴 展 88①）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美国的印支政策（陈开益 88②）
 从中导条约看美苏在军控方面的新变化（于智勇 88②）
 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邓又平 88③）
 “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何 迪 88③）
 “尘埃落定”话当年
 ——资中筠论杜鲁门对华政策新著读后（邓蜀生 88③）
 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
 ——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张静怡 宋久光 88④）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武装干涉苏俄中的作用（张镇强 88④）

经济类

- 论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陈宝森 87①）
 美国的短期经济预测（朱景尧 87③）
 美国城市经济及其面临的一些问题（郭吴新 87③）
 美国对亚太地区起飞的作用（李国友 87③）
 论八十年代美国对“企业文化”的探索（王大新 87④）
 美国——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最大债务国（郑伟民 黄尔勇 87④）
 美国人口的分布、流动和地区经济发展（茅于軾 88①）
 试析美国加速实现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樊 亢 贺力平 88①）
 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张小青 88①）
 八十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孙海顺 88①）
 美国营销学发展初探（周 南 88②）
 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美国对华投资（陈宝森 88③）
 论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与贸易变化的关系（贺力平 88③）
 八十年代美国外贸逆差剖析（孙海顺 88③）
 能源危机后的美国能源与经济（茅于軾 88④）
 美国跨州银行业的发展和前瞻（景学成 88④）

历史·社会·文化类

- 中国的美国研究（资中筠 87①）
 自然资源保护与西奥多·罗斯福（顾学稼 87①）
 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几个新趋势（施咸荣 87①）
 艾德蒙·威尔逊书信（王佐良 87①）
 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董乐山 87②）
 丁黉良的“孔子加耶稣”（赵 毅 87②）
 美国美术与“传统”（吴甲丰 87②）
 美国华人境况的变迁（陈尧光 87②）
 迷惘的一代文化背景透视（赵一凡 87②）

- 本刊访《美国文学简史》主要编写者董衡巽（87②）
- 美国的强制退休问题（朱传一 孙耀楣 87③）
-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辨析（严四光 87③）
- 美国环境史观的演变（侯文蕙 87③）
- 美国的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董乐山 87④）
- 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无关吗（张友伦 87④）
- 杰斐逊改造美国土地制度的宏图（刘祚昌 87④）
- 美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自我质疑
- 《美国人头脑的闭塞》评介（温 洋 87④）
- 艺术·历史·社会（朱世达 88①）
- 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涂纪亮 88②）
- 促进佛罗里达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朱传一 88②）
- 中美文学的交叉点（朱 虹 88②）
- 立新意，创新风
- 评新出版的《哥伦比亚版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施咸荣 88②）
- 美国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温 洋 88③）
- 海明威短篇创作模式探求（董衡巽 88③）
-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秦斌祥 朱传一 88③）
- 美国黑人的三次文艺复兴（施咸荣 88④）
- 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 薇拉·凯瑟的代表作《啊，拓荒者》中美的启示（资中筠 88④）
- 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嬉皮士（温 洋 88④）